

上海论坛动态

全 球 治 理 与 亚 洲

第11卷 第2期 (总第34期)

2018.09



新 闻

- > 上海论坛2018:
汇聚全球智慧 助力上海打响“四大品牌”

聚 焦

- > 上海论坛2018开幕式大会
主旨演讲
- > 上海论坛2018闭幕式大会
高端对话
圆桌总结

专 题

- > 嘉宾访谈
- > 嘉宾建言
- > 观点集萃

信 息

- > 上海论坛2019圆桌/子论坛
承办申请工作正式启动
- > 《中国观》长期征稿启事
- > 复旦发展研究院·博享访问学者项目
 > 复旦学者
- > 复旦发展研究院招聘博士后研究人员
- > 《复旦人文社会科学论丛》长期征稿启事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国际顾问团（以首字母为序）

- 1 **Abdullah Gül**
土耳其第 11 届总统（2007-2014）
- 2 **Adam Posen**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
- 3 **Arkebe Oqubay Metiku**
埃塞俄比亚总理特别顾问
- 4 **崔泰源 Chey Tae-won**
韩国 SK 株式会社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 5 **Christopher Pissarides**
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 6 **Dagfinn Høybråten**
北欧理事会秘书长
- 7 **Donald Kaberuka**
南桥（SouthBridge）公司主席兼执行合伙人
非洲发展银行名誉主席（2005-2015）
非盟和平基金会特使
卢旺达前财政部长
- 8 **Enrico Letta**
意大利前总理
- 9 **Fabrizio Saccomanni**
意大利前经济财政部长
- 10 **György H Matolcsy**
匈牙利央行行长、前经济部部长
- 11 **Joseph E. Stiglitz**
2001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 12 **龙永图 Long Yongtu**
博鳌亚洲论坛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
中国外经贸前首席谈判代表
- 13 **Robert Shiller**
2013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 14 **Robert Zoellick**
世界银行前行长
- 15 **Shamshad Akhtar**
联合国副秘书长（时任）
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
（时任）
- 16 **河村建夫 Takeo Kawamura**
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
- 17 **Temir Sariev**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
- 18 **朱民 Zhu Min**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副总裁



上海论坛动态

上海论坛是目前在上海举办的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论坛之一。论坛创始于2005年，由复旦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复旦发展研究院承办。每年5月，来自全球五十多个国家的六百余名嘉宾齐聚上海参加年会。

《上海论坛动态》是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的公开出版物。其目标是扩大上海论坛在学术界、政界和企业界的影响力，其内容涉及新闻发布、论坛专题、相关活动、重要事项和进程等，并对论坛的阶段性工作进行总结，以促进上海论坛的更好发展。

主办方

复旦大学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

编委会

主任

许宁生	复旦大学校长
焦扬	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
朴仁国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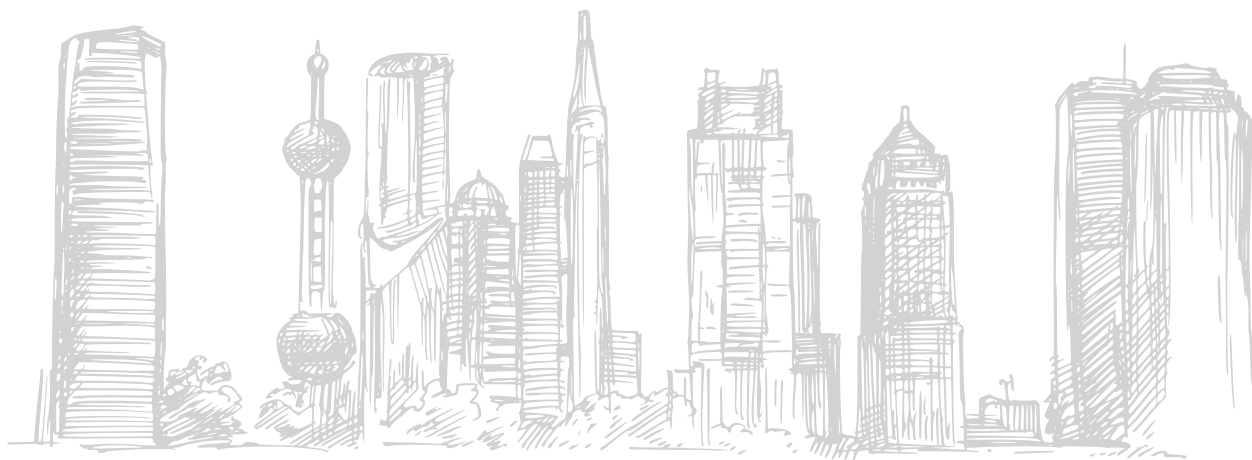
陈志敏	复旦大学副校长
-----	---------

执行副主编

张怡	复旦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陈寅章	复旦发展研究院秘书长

副主编（以姓氏字母为序）

Miriam Altman	南非国家计划委员会规划监测和评估司司长
陈诗一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
Jean-Marc Coicaud	美国罗格斯大学罗格斯法学院终身教授
丁纯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Andrew Greenshaw	艾伯塔大学精神病学和神经科学教授
Daniel Gros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Torbjørn Eltoft	特罗姆瑟大学—挪威北极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系教授
Arthur Gushchin	Akvaplan-Niva北极研究员
Dan Guttman	上海纽约大学环境研究教授
Lassi Heininen	拉普兰大学北极政治学教授
胡涛	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分会中国项目主任
Yury Kulintsev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丹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
李远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墨卡托管理学院与东亚研究所教授
刘春荣	复旦发展研究院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执行副主任
刘会洲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主任
罗长远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纳日碧力戈	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
Dániel Palotai	匈牙利中央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彭希哲	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沈逸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石源华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
Andris Spruds	拉脱维亚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



Sergio Suchodolski

Niklas Swanström

苏长和

孙立坚

Markus Taube

万广华

王永钦

吴心伯

许 闲

杨 青

张家栋

赵克斌

郑 宇

金砖银行战略合作局局长

瑞典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所长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执行院长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墨卡托管理学院教授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复旦发展研究院中国保险与社会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资产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罗 倩

张 圆

邓梦佳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副主任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主管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秘书处办公室项目主管

执行编辑（以姓氏字母为序）

丁常昕

黄 晨

黄 昊

姜华夏

焦露曦

靳 煜

康而力

钱斯蕴

邵夏怡

沈婵婧

沈 琛

盛 妍

吴 涛

辛艳艳

姚思文

姚 旭

于 杨

张 路

朱红蕊

复旦发展研究院院办项目主管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部项目主管

复旦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

复旦发展研究院全球事务部项目主管

复旦发展研究院全球事务部项目主管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部研究员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部研究员

复旦发展研究院全球事务部部长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部执行主任

复旦发展研究院院办主任

复旦发展研究院战略合作部执行部长

复旦发展研究院全球事务部项目主管

复旦发展研究院院办副主任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部研究员

复旦发展研究院院办项目主管

复旦发展研究院战略合作部部长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部研究员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部项目主管

复旦发展研究院研究部研究员

目 录

第11卷 第2期（总第34期）2018.09

01 新 闻

上海论坛2018：汇聚全球智慧 助力上海打响“四大品牌”

04 聚 焦

04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Shamshad Akhtar 联合国副秘书长（时任）、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时任）

河村建夫 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

Graham Tillett Allison, Jr.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

Luiz Carlos Bresser-Pereira 巴西财政部原部长

王新奎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

18 闭幕式大会高端对话

Peter Dayan 英国皇家学会院士、2017年大脑奖得主

李兆平 伦敦大学学院计算机系计算神经科学教授

施 郁 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

徐英瑾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朱频频 小i机器人创始人兼CEO

28 专 题

28 嘉宾访谈

智者对话

Shamshad Akhtar
-胡 涛 变化世界中的中国角色

河村建夫
-樊勇明 半岛问题与党政选举——日本的国际与国内关切

Graham Tillett Allison, Jr.
-吴心伯 变动中的中美关系

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
-Sergio Suchodolski 新发展理论和国际外汇

高端访谈

Naoyuki Yoshino 基础设施在地区发展和地区一体化的作用

Berhane Gebre-Christos 埃塞俄比亚与中国超越经济合作的关系

Rainer Klump 稳定始于国内：欧盟与中国的未来选择

张海冰 变动中的国际贸易格局与中国完善全球贸易治理的尝试

李明江 坚持互利互惠，切合实际需求，扩展多边合作

Eileen M Sullivan Marx 当LIFE走进现实生活：费城成功推行以社区为基础的老年人长期护理项目，我们能从中习得哪些经验？

Ruth Shapiro 社会企业在新经济时代的可持续发展：中国语境下的价值，挑战和回应

洪 农 油气之外：南海共同开发的其他领域和模式

达 巍 从特朗普和美国逻辑看中国对美政策

61 嘉宾建言

62 观点集萃

高端圆桌

高端圆桌01：特朗普与亚洲：美国政策与角色的变化

高端圆桌02：新时代、新金融、新经济

高端圆桌03：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共赢之路

高端圆桌04：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创新无极限

高端圆桌05：走向共同繁荣的中非关系

高端圆桌06：2008年危机后多边开发银行在亚洲和新兴国家中的角色

高端圆桌07：亚欧协同：共筑适应现状与包容的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

高端圆桌08：区域“去一体化”：现状、动因和出路

高端圆桌09：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高端圆桌10：深化绿色金融创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端圆桌11：欧洲与东亚合作中的跨国问题——跨越双边关系的面碗效应

子论坛

全球治理

社会治理

公共安全

科技创新

73 信 息

上海论坛2019圆桌/子论坛承办申请工作正式启动

《中国观》长期征稿启事

复旦发展研究院·博享访问学者项目

复旦学者

复旦发展研究院招聘博士后研究人员

《复旦人文社会科学论丛》长期征稿启事



上海论坛 2018：汇聚全球智慧 助力上海打响“四大品牌”

5月26日，“上海论坛2018”年会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开幕。本次论坛的主题为“变动世界中的亚洲责任”。中国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许涛、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韩国SK株式会社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崔泰源出席论坛并分别致辞。开幕式由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焦扬主持。来自全球五十多个国家的智库、高校、政府、企业、媒体等机构的嘉宾代表共500余人参加了开幕式。

许宁生校长在致辞中提到，在上海论坛步入第十三年之际，论坛总主题调整

为“全球治理与亚洲”。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回潮，逆全球化势头蔓延开来，大国之间贸易、外交冲突不断发生。而在大国关系走向迷离时，新兴市场国家却仍在为提升话语权而努力，通过区域一体化及“一带一路”等国际多边合作机制推动政治经济协同发展，新兴经济体崛起并开始对全球治理体系进行改革与完善。同时，全球治理的地理范畴已经悄然扩张，北极航线的贯通带来了极地开发与治理的新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将在论坛上听到世界知名专家的真知灼见。

崔泰源董事长在致辞中表示，传统上来讲，商业活动的首要目的是创造经济价值。数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的私有企业创造和提供最大经济效益的能力不断提高，他们也愈发精于此道。不过，当今社会期待企业在创造和分享社会价值中承担更重要的角色。2012年以来，关于企业社会价值创造的讨论已经成为上海论坛的重点议题之一。而这些意义重大的讨论也在学术和商业组织中不断得到回应。希望所有人能够继续和全社会分享财富、资源和经验。携手为人类构建更好的未来。这也是上海论坛的真正精神内核。

许涛司长在致辞中指出，中国高校具有学科齐全、人才密集、对外交流广泛的优势，是解决世界问题和挑战的重要智慧资源，担负着当代社会和未来培养人才的重要历史使命。他强调，要进一步扩大教育的对外开放，加强高校间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将“走出去”和“请进来”有机结合，增强国内外资源的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真正做到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上海论坛的举办也正是中国高校国际化发





展的成果。

开幕式后，时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沙姆沙德·阿赫塔尔（Shamshad Akhtar），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河村建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格雷厄姆·埃里森（Graham Tillet Allison, Jr.），巴西财政部原部长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拉·佩雷拉（Luiz Carlos Bresser-Pereira），上海 WTO 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王新奎分别发表主旨演讲。围绕此次论坛主题，嘉宾们从不同角度进行阐释。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主持了主旨演讲。

上海论坛 2018 为期三天，分为“全球治理”“生态治理”“公共安全”“社会治理”“科技创新”和“文化文明”六个板块，共有 13 场圆桌，14 场子论坛。与会代表从各自研究领域出发，以专业的视角就以上话题展开深入而热烈的交流与讨论从多角度、全方位来找寻亚洲在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中的新使命。

5 月 28 日，为期三天的“上海论坛 2018”年会在复旦大学闭幕。闭幕式上，各高端圆桌就会议举行情况和主要讨论成果进行了专题汇报。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事务总长朴仁国、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先后在闭幕式上致辞。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主持闭幕式。

朴仁国总长在致辞中说道，当今世界充满陷阱：修昔底德

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还有 Bresser-Pereira 博士所说的新兴发展宏观经济陷阱。当面对各式各样的陷阱和挑战时，我们绝不应该企图粉饰太平或逃避责任。我们应该直面这些陷阱，并给出解决方案。希望像上海论坛一样的平台能够成为促进团结和对话的重要角色。上海论坛每年有超过 300 个演讲，这意味着上海论坛即将成为重要学术智囊团。希望上海论坛能够像灯塔一样耸立，无论天空多么昏暗，水流多么湍急，它都能安全指出去到港口的路。

焦扬书记在致辞中表示，当前世界正在经历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动、大调整，人类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仍然很多。而亚洲作为世界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入新世纪以来，亚洲地区的整体性崛起，成为世人瞩目的世界潮流。亚洲是当今世界对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与此同时，亚洲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亚洲当下面临怎样的挑战，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如何成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倡导者、引领者，这些都是新时代对于亚洲提出的新的命题。

本次论坛年会，共有近千位来自世界各国的政界、商界、学界精英和媒体代表齐聚复旦，围绕“变动世界中的亚洲责任”这一主题，共同找寻亚洲在世界政治经济新格局中的新使命。通过各方承办的子论坛研讨、圆桌会议、高端对话等多元形式，

论坛分享了北美、北欧、中欧、中亚、东盟、非洲、“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地区的经验，探讨了大国关系、“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绿色治理、绿色金融创新、数字健康、老龄化应对、极地开发与治理等领域一系列重要问题，为上海、中国和亚洲应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亚洲如何能够在全球治理这一更宏大的格局中提供资源与智慧提供了政策建议和决策参考。

论坛认为，世界政治经济格局重组，现行碎片化和低效率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难以有效应对此起彼伏的全球性挑战，新的趋势和变化正在不断发生扩散。亚洲需要巩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挑战。亚洲地域广阔，文化多元，各国政治制度各不相同，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面对复杂的传统和非传统挑战，整个亚洲地区更需要紧密团结在一起，协同融合，深化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构建平等相待、守望相助、休戚与共、安危共担的命运共同体。亚洲需要坚持开放包容，深化务实合作。亚洲地区经济增长迅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高位，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当下，亚洲地区应该继续推进区域合作制度，抓住新一轮科技和工业革命的机遇，通过国家之间的对话协商，努力实现贸易、资金和基础设施三方面的互联互通，建设开放式经济合作关系，带动区域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闭幕式举行前，论坛组委会专门组织举办了一场主题为“脑科学与机器学习：敢问路在何方？（Brain Science and Machine Learning: What Next?）”的高端对话，邀请了英国皇家学会院士、2017 大脑奖得主彼得·达扬（Peter Dayan），伦敦大学学院计算机系计算神经科学教授李兆平，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施郁，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徐英瑾，小 i 机器人创始人兼 CEO 朱频

频，就相关领域的科学前沿话题开展交流对话和思想碰撞，并就瓶颈问题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本场高端对话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FT 中文网前总编辑张力奋主持。

来自国内外政商学界和媒体代表 400 余人出席了闭幕当天相关活动。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宣布上海论坛 2018 圆满落幕，并再次感谢全世界嘉宾的参与和志愿者的贡献。

上海论坛是由复旦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主办、复旦发展研究院承办的国际大型学术论坛，旨在搭建中外政商学界人士共同交流沟通的平台，为区域发展及国家大计建言献策。自 2005 年创办以来，出席论坛的国内外演讲嘉宾近 4000 人次。论坛始终坚持创新引领，以求更好地为人类进步、国家发展和民生改善服务，已逐渐成为国内外知名的论坛品牌，也为上海打响“四大品牌”汇聚来自全球的智慧。

随着国际力量对比和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正成为当务之急，论坛组委会决定从今年开始将论坛大主题由沿用了 12 年的“经济全球化与亚洲的选择”调整为“全球治理与亚洲”，期待亚洲能够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

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亚洲角色

■ Shamshad Akhtar

联合国副秘书长（时任）

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时任）



尊敬的各位来宾，今年的论坛主题是“变动世界中的亚洲责任”，我觉得这是一个恰如其分的主题。我们现在越来越多地谈到逆全球化趋势的出现，而逆全球化会导致支撑这一地区在过去几十年不断繁荣发展的基础变得支离破碎。随着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潜在生产力的下滑，以及危机和灾难发生的频率不断增加，现金流的不足以及相关的一些体制化的挑战，再加上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更大的挑战，我们现在面临非常多的困难和挑战。

但是不可否认亚太地区的贸易增长非常耀眼，从1990年到2008年，这一地区的GDP年增长率达到了6%。而GDP的增长主要得益于贸易增长，在亚太地区，出口贸易年均增长为13%，现在贸易已经占亚太地区GDP的50%，同时亚太地区对全球出口市场贡献了40%的份额。在过去的四年时间里面，亚太地区的韧性和活力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三分之二的地方经济体在2017年的增长速度超过了2016年的增长速度。全球经济复苏确实改善了这一地区在2018年和2019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当然最终结果还是取决于这些国家如何有效应对发达经济体的

压力，以及油价的不断上涨和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

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方面，亚太地区也已经推出了一系列的社会和环境方面的改革，尽管步伐不同，方式不同，但是这对于有效解决贫困问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最近几年时间里面，亚太地区绝对贫困数量已经从人口总量的30%降低到了现在的10%，地区人均寿命增长到了80岁，同时在社会发展其他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讲完了这些短期目标，我们还必须要谈一下，其实亚太地区也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中心，亚太地区的GDP已经增长到了27.5万亿美元，几乎已经和北美以及西欧的总体GDP水平相当，占世界GDP的36%。不同的政策情形下，我们发现亚太地区的GDP可以在2050年的时候达到全球GDP的50%。当然实现这样目标，需要该地区采取可持续、包容性以及平衡的增长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谈一谈未来我们需要做的几件事情。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地区的政治稳定、和谐。我们知道南北韩峰会的成功召开，为半岛以及半岛附近地区的合作打开了新的大门，与此同时我们需要采取一些集体行动，以便能够应对不同热点地区的问题，有些热点地区甚至已经出现了人道主义危机。

在上海，我当然会谈到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上合组织是一个地区性的政治组织，现在成员国已经增长到了18个，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多边机制，进一步强化发展了互相的联系。联合国亚太办公室一直在发展议题上与上合组织进行合作，我们相信这对于实现地区平稳发展是极其重要的。

第二点是大家可能都谈过的一个问题，如何解决不平等性。我们知道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会对经济的增长带

来负面影响，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紧张态势。一定程度的收入不平等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机会的不平等性则是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在过去三十年时间里面，本地区五个人口最多的国家当中有四个都有所增长，这几个国家的人口占整个地区人口的70%。

在中国，收入不平等性增长了10%，印度尼西亚的收入不平等性增长了8%，孟加拉以及印度分别增长了4%和5%。机会的不平等性，以及获得服务的不平等性也十分普遍。在本地区，教育、清洁能源、基本卫生、银行帐户是很多人都不能享受到的，在这个地区当中只有40%的人能够获得医疗健康方面的服务。除了全面提高收入之外，本地区也需要通过整体的财政政策来改变这种不公平现象的产生。我们需要通过更多的税收支持以及公共政策，加强可持续社会保护系统。

第三点，在我们这一地区的人口变化非常巨大。如今老龄化人口已经基本上达到了5.5亿，但是到2050年的时候，老龄化人口会不止翻一番，这将使得在60岁以及60岁以上的人口会达到13%—25%。简而言之，对于亚太地区来说，老龄化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但是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时间却非常有限。对于我们来说快速应对老龄化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在各方面采取行动。比如说我们应该有一些创新的解决方案，提供更多的资金，同时要提供长期的养老服务。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运用科技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品质。同广泛的非政府的民间组织一同努力，设计可持续的养老金体系仍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

接下来我要谈第四点，也是我们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对于亚太地区来说，也应该采取更积极的措施。

第四点就是能源问题，现在亚太地区有4.2亿人口没有办法获得电力，另外还有20亿人口没有办法使用清洁能源进行烹饪，相关产业也缺少能源。亚太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全球的一半，并还在不断增长，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地区不断增长，所以说我们有这样的忧虑，而且我们需要来考虑如何来优化能源密度，所以我们必须要进行考量。对于相互影响的亚太地区来说，油价的大幅度增长从两年前每桶三十美元，到现在八十美元一桶的油价，这对于亚太地区宏观经济增长也带来了新的挑战。这对于我们各个国家的财政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预计油价可能会继续增长。

各个经济体要考虑进行多元化，我们需要把整个产业，把整个经济进行更多的产业多元化，这样的话可以让各个国家的经济得到更好更健康的发展，这样的话可以更好应对价格波动。

能源转型是我们面对多重挑战的唯一可持续的路径。

变化不断涌现，我们也必须要加快我们应对的步伐，能源技术现在其实在不断发展，可再生能源获取的成本也在不断下降，这些技术的发展对于我们来说有助于我们降低能源赤字来改善能源结构，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更好的，特别是对于一些贫穷的地方，可以更好的获得能源。

亚太地区当然可以通过不同方式降低能源密度，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更加努力去提升能源效率。与此同时能源转型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优化能源供应，这样才能应对与日俱增的需求压力。亚太地区如果不做好能源转化工作的话，很有可能我们的GDP在2050年之前会下降3.3%，2100年之前可能要降低10%，这也是需要进行改善的。

另外一个方面，我们采用低碳方式所需的成本是相对较低的。如果说整个地区要采取更多的低碳措施的话，有可能在2050年之前我们要花费1.4%—1.8%的GDP金额来进行改善。在2100前我们要花费2%的GDP金额来进行改造。但是这些都是值得的，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项目，还有很多的资源来帮助我们优化能源结构，我们也相信对于我们的可再生能源来说，我们已经积极采取了这样的措施，来保障能源发展和能源安全。

《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现需要多边政府支持，需要全球治理进一步提升。多边架构和机制来说，我们应该进一步加强信任。对于亚太地区来说，在全球经济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也意味着我们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推进多边主义发展和全球治理提升。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不仅仅南北之间要进行合作，特别是贸易、金融以及气候变化方面，所以我要和大家谈谈如何进一步推动多边主义发展。

首先在贸易方面，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过去七十多年当中多边贸易进行了自由化多次谈判。在很多地区出现了逆全球化发展，因为现在很多国家采取了一些关税壁垒。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全球化的竞争当中，关税其实总体已经下降了，从七十年前的40%降低到4%，非常令人瞩目的进步！但是现在的问题并不是关税的问题，现在很多国家使用非关税的壁垒，从技术规范到程序壁垒。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很多政府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包括行业补贴、金融支持来促进贸易发展，特别是商品和服务以及投资方面的发展。综合来看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以来，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贸易保护主义的言论和威胁与日俱增，对于多边贸易来说，现在遇到了新的挑战，多哈谈判之后有很多国家逆流而上，阻止了自由化进一步发展，因为他们要保护既有的利益。

现在对于亚太地区，我们现在也在不断发展，特别是像 WTO 这样的一些贸易协议，我们需要不断加强这些协议的落实。我们要应对这些贸易保护主义，第一，我们必须保障要捍卫 WTO 争端争议机制，我们要更好建立起联盟，让 WTO 成员国齐心协力。第二，我们不应该在自由化的话题上做进一步的探讨，让我们改进规则的制定和规则的应用。第三，我们应该形成、加强地区和多边协议和机制，使得非歧视、透明和可预测性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另外减少两级分化，减少贸易方面的能力差异。

接下来我想谈谈全球经济体量不断增加给金融发展带来的新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的所有的资源加起来有 56 万亿美元体量，包括亚太地区的存款，外汇储备，以及投资等等，但是我们需要投入到环境友好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预计要达到 27 万亿美元的规模，而我们目前还远远没有开始达到这个标准。与此同时，每个国家仍有 6-16% 的潜力没有得到开发。亚太地区的资本市场现在缺乏深度、缺乏流动性，而且本地的债券市场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我们需要新的金融工具，更有效部署金融工具，使得我们整个地区可以更好应对发展。当然我们也需要一些新的活力增加金融实力。

我刚从美国纽约赶过来。（他们）现在有四亿美元来自于官方投资，用于改善金融机制和税收体系，更好应对国内的税收体制问题，通过更优惠的税收，使得国外公司也能够从利润转移方面能够更加合规。对于亚太地区国内的税务机构来说，我们也需要建立起一个发展合作机制，与此同时我们应该加强“南南合作”，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现在也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南南合作基金，以及包括相关的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如果要把所有的项目基金都罗列的话，可能还要再花十分钟。这些措施都是非常积极的。所有的这些方式，包括亚投行、金砖银行、丝绸之路基金，都可以推动我们多边的金融方案。

对于一些新的多边基金或者说资金的供应，可以动用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来投入到基础设施，投入到绿色融资，能够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话语权，在这个方面我们应该要继续加强，使得我们新兴市场在全球金融体系当中能够得到更好的发展，这样可以使得我们 2030、2040 年的规划可以更好得到实施。

最后，我们也可以看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影响已经非常显而易见了。海平面、洪水，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的自然灾害也是越来越多。全球的温室问题，还有不断上升的海平面，也意味着我们面临严重的环境风险。2017 年南亚地区的季风导致了 1200 人丧生，而且导致 4000 万人口受到了影响，损失达到了 12 亿美元。到 2030 年，洪水的

灾害很有可能每年导致 2150 亿美元的损失。空气污染、水质问题也非常严重，每年导致很多人丧生。

《巴黎协定》是一个新的动力，便于我们应对气候变化，我们必须不断定期加强承诺，我们应该提升透明度，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运用全球金融技术，还有其他方式来实现这一目标，而且我们要加强合规，对于那些无法实现承诺的国家和地区，应该对他们进行惩罚。还要建立起更好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氛围，这样的话才能更好落实《巴黎协定》，需要更多的国家献计献策，让公众让企业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加入其中。

我们应该建立起相关的指标，来监测排放的指数，另外对于亚太地区来说，其他地区也应该建立起相应的平台，这样的话才可以更好让多边政策落实，我们也希望不断制定解决方案，推动开放性的贸易机制，调动更多的民间资源来共同解决这些问题。我刚才讲了很多政策，还应调用民间的非政府组织来共同应对挑战。

在今天讲话的结尾，我认为在全球范围内，亚洲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与此同时我们要让其他地区听到我们的声音。在全球的经济和金融架构当中，我们应该要在全球经济金融建构中表达出自己的观点，建立与我们经济份额相匹配的话语权。

对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来说，我们希望支持所有的联合国机构以及我们的成员国，希望各成员国在全球的治理架构当中提升自己的角色。希望有更多的政府之间的协调平台，这些平台还有解决方案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确实希望齐心协力来实现《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不仅仅亚洲要承担责任，我期待我们今天所有的在座各位都做出自己的贡献。谢谢聆听！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变动世界中的中日合作关系

■ 河村建夫

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



今天非常荣幸得到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在上海论坛这一高规格国际论坛发表演讲。首先，请允许我向本次上海论坛的主办方——复旦大学、韩国高等教育财团，以及所有协助承办本次论坛的相关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年上海论坛的主题是“变动世界中的亚洲责任”，今天我的演讲的题目则是——“变动世界中的中日合作关系”。

1. 国际形势激烈变动

(1) 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不断涌现

放眼今日的国际形势，我们可以看到一下三个特征。

首先，在强大而稳定的国内政治基础的支撑下，许多国家出现了强人政治领导下的长期化政权。在欧洲，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开启她的第四个任期，俄罗斯普京政权进入第4任期，在日本，安倍内阁也将进入第6个年头。强大的国力，加上政权长期化所带来的放大效应，使得这些领导人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美国的特朗普政权虽然才进入第2个年头，表现也十分强势，在外交、贸易、安全等领域打破了传统的建制派

体制，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2) 恐怖主义、局部冲突再起

第二点是全球各地恐怖袭击频发。尤其是欧洲首当其冲，深受其害。对于这样的恐怖主义行径我们义愤填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伊斯兰国家日益弱化的大背景下，恐怖主义还在不断蔓延，恐怖袭击还在世界各地继续发生。

此外，一直以来被视为国际形势不安定要素的地区冲突，也有复燃的趋势。特别是中东地区受到持续紧张的叙利亚内战，以及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的影响，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不安。而朝鲜半岛问题方面，尽管暂定于6月12日的美朝领导人会晤可能会使形势得到很大程度上的缓和，然而是否能够实现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的无核化依然未知。朝鲜半岛的局势依然变幻莫测，不可掉以轻心。所以在当下，还有很多未知数，很多情况无法分析和预判。

(3) 战后国际秩序的重构

第三点是战后的世界秩序面临重构。首先，就像之前提到过的，特朗普政权高举“美国第一”的大旗，先是宣布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巴黎协定，接着又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对钢铝产品加征高额关税，实行单边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

在中东，美国不仅宣布退出伊核协议，还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放弃扮演中东和平进程中“调停人”的角色，极大地动摇了美国自己缔造的战后国际秩序。

以上三个特征表明，当今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激烈变动，我们或许正在迈向一个新的时代。

2. 中日合作的必要性

(1) 中日和平友好的重要性



在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动的情况下，中日两国之间和平友好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两国自邦交正常化以来，在各领域建立起了友好互惠的合作关系，对彼此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伙伴。毫无疑问，作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安定的中日关系必将成为变动国际环境中的稳定之“锚”，为国际局势稳定做出巨大贡献。

中日两国是近邻，也正因为离得太近，也会面临一定的问题和困扰。但是，我坚信：只要两国能携手共进，持续努力，这些问题和烦恼是能够得到解决的。

中日两国民众中有超过七成的人认为中日关系非常重要。不管是追溯历史，着眼当下，还是展望未来，中日两国的和平友好都是必要，而且是必然的。

(2) 作为东亚大国的责任

另外，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地区的大国，共同肩负着维持本地区和国际社会和平和繁荣的重要使命。从这样的立场出发，两国必须携手合作，共同设计、倡导并实施东亚地区和平发展的蓝图。

为此，在5月9日召开的中日韩峰会中，三国领导人确认了实现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这一共同目标，并且商定将继续开展紧密合作以实现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不断推进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

(3) 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责任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作为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也想“入常”。中日两国应该积极合作，成为推动实现人类社会和平、稳定和发展的牵引车。

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之下，三国首脑在第7次中日韩峰会中就全球性课题互相交换意见，在推动可持续发展，加强医疗保健、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等问题上达成一致。

中日不仅同为经济大国，而且互为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中国一直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而日本是中国第二大贸易对象国。日本是第三大对华投资国，在华日资企业数量位居第一。这些都反映了中日两国之间密不可分、互相依存的经济关系。由于经济合作的规模大、紧密度高，中日经济合作的好坏，影响到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大力发展两国经济合作，必将能促进世界经济走向新的繁荣。

从上述的“中日和平友好的重要性”、“作为东亚大国的责任”、“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责任”等三个方面来看，中日合作在当下尤其不可或缺，其重要性在不断提升。

3. 新世界秩序中中日两国的作用

(1) 新世界秩序诞生的可能性

那么两国又该在哪些领域合作，在国际社会中担当起怎样的作用呢？

在现存的国际社会的规范和秩序下，中日两国实现了长期的稳定和发展，取得了现有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就像我开头所说的，在变动激烈的国际形势下，战后建立起来的世界秩序似乎已经开始瓦解。如果说，现存规则中存在与当下国际现状由不相适应的地方，那么明智的做法应当是：加强多边合作，通过真诚的讨论与和平的对话，共同描绘新的世界秩序。

(2) 新世界秩序的主题

关于新的世界秩序的构建，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非常恰切的。为了进一步促进世界人民的和平、友好，谋求稳定的经济发展，各国应该如何承担各自的责任、做出怎样的贡献，这才是我们所面临的共同课题。

不揣冒昧，我本人其实也把人类的互利共生作为自己的政治理念之一。我主张：中日两国应该率先在节能、粮食安全、地球环境污染等全球性问题上采取行动。

我个人认为，东亚地区未来的发展要靠年青一代。因此，从2002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开展“中日韩儿童的童话交流项目”。

每年，100多位来自日本、中国和韩国的小朋友欢聚一堂，同吃同住一个星期，共同享受读书的乐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交流，共同创作出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绘本。

孩子们一开始因为言语不通而显得有些不安，但是随着交流深入，最后告别的时候孩子们抱在一起，流着眼泪依依惜别。

这个交流项目已经举办了 14 次，超过 1000 名儿童参与其中。初期的参与者们有的已经成为大学生，有的已经踏上了社会。他们成立了校友会，对东亚地区的未来展开了认真严肃的讨论。

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他们超越了国籍，并肩前行。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东亚地区崭新而光明的未来。

(3) 新世界秩序和中日两国的作用

今年五月，中国总理时隔八年再次访日。在双方的首脑会谈中，李克强总理把中日关系比喻为一条航船，指出“要推动中日两国和平友好合作的航船再次启航，而且行稳致远”。安倍首相也在欢迎李克强总理访日招待会中表示，基于中日友好和平条约的精神，要在战略互惠的大框架下，使中日关系由“竞争”步入“协调”的新时代。

李总理访日期间，中日两国围绕经济、民间交流、海洋安全等领域展开磋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4) 加强经济合作

就像之前所说的，中日两大经济体规模分别位列世界第二、第三。因此两国在经贸关系上取得的进展、经济合作的加强，对于今后亚洲局势的安定、亚洲各国的共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另外，今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在现有基础上构建新的经济合作关系成为关键。为进一步深化两国经济联系，李总理访日期间，中日双方还就设立着眼于第三方合作的官民联合委员会达成一致。该委员会将负责讨论推进具体的经济产业项目，提供民营企业的对话平台，在安倍首相访华期间筹备召开具体的“论坛”。这将成为现有中日经济高层对话的一个补充。

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十分迫切，中日双方若能加强合作满足亚洲各国的需求，不仅能为两国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更能促进亚洲各国的经济繁荣与人民福祉。中国政府所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包括亚洲在内的广大地区完善基础设施建设。而日本则一直以来都致力于构建“高质量基础设施合作伙伴关系”，积极推动“高质量基础设施”在亚洲的建设实施。日本愿意与中方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之内，就具体项目展开有条件合作的可能性。

在基础设施领域，中日双方存在很强的互补性。日本企业可以在保证价格竞争力的前提下开拓新的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则可借鉴日本开拓海外市场的经验，降低风险。而对于第三方国家来说，中日合作的模式可以在保证项目

质量的前提下，减少对特定国家的依赖。这样的“三赢”局面有望达成。

当然，中日双方在经贸关系之外，在其他领域也有广阔的合作前景。而且我相信，两国人民所热切期盼的安倍首相访华、习近平主席访日也将在不久的未来成为现实。

(5)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之际

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第 40 个年头。传承老一辈领导人缔结条约、构建两国长期友好关系的精神，开拓更加成熟的中日关系，这不正是我们应当肩负起的责任么？

这次以李克强总理访日为契机，中日两国友好关系重回正轨。从“竞争”到“协调”，我期待着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加速发展。而其中的第一步，便是安倍首相所说的“先要将中日两国的战略互惠关系落到实处”。

针对中日合作的具体形式，我期待今天到场的各位都能积极地发表真知灼见。各位的宝贵意见必将推动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

中日两国关系的基石，在于民众相互信任的形成。因此，民间交流和相互理解至关重要。今天出席论坛的各位都是活跃在中日交往第一线的，民间交流的深入正需要借助你们的力量。增进两国民众的沟通与交流，深化双方的理解与信任，必定能促进两国的发展，实现地区乃至世界的繁荣与安定。

我的演讲到此为止，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美国和中国能够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吗？

■ Graham Tillett Allison, Jr.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



非常感谢你们慷慨的介绍。很荣幸今天我能够来到这里，并和其他嘉宾一道，向举办如此盛大活动的复旦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表示祝贺。昨天的这个时候，我在马萨诸塞州主持了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我五十年来的恩师亨利·基辛格也在场，庆祝他的孙女索菲从哈佛毕业。本周日（27日）是亨利的95岁生日，所以昨天也提前为他庆祝了生日。在此，谨让我代表哈佛大学和亨利·基辛格教授向复旦的各位同僚们致以问候。

能够得到邀请是我的荣幸，不过我来到这里不仅是因为得到了参与的机会。我更是来学习的，请允许我说明我希望学到什么。事实上，我想的内容呼应了朴总长刚刚提出的问题。我想要知道的是美国和中国应该如何避开修昔底德陷阱。过去一年中，我一直在观察之前提到的那些结构性变化，也一直在努力想要得到答案。希望在接下来的两天内我们能听到更多的看法。

按照会议主题——“变动世界中的亚洲责任”，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在这个中美关系趋于紧张乃至危险的时代，美国、中国还有其他亚洲国家该如何看待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看他们如何相互联系，以维持一个延续七十年，诞生了令我们惊叹的亚洲奇迹的国际秩序。那么，美国政府、美国的意见领袖、中国政府、中国的意见领袖，以及其他亚洲参与者究竟能够怎样帮助我们逃脱修昔底德陷阱？

我不仅希望分享我的想法，更希望在接下来的两天听到更多其他声音。

我在接下来的演讲中要做的就是介绍这本书和书中思

路，希望它能启发各位思考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代美国和中国该如何摆脱修昔底德陷阱。

我大体上要做三件事。首先，我想向在座各位介绍，或者说是重新介绍，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其次，我将提出一个很宏大的想法。第三，我将提出一个非常重要 consequential 的问题。

那么，让我开始吧。既然我们在中国，就不得不提到习近平主席，和2017年1月他在在达沃斯发表的一份声明。他说，大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只要坚持沟通、真诚相处，“修昔底德陷阱”就可以避免。

我非常喜欢这份声明。我很欣赏这种关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它可以扩展运用到现在关于国际关系新模式的对话上。我也很想知道如今它是如何发展成为习近平主席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但是，我认为所有这些都只是在试图概念化这个问题。到底我们怎样才能逃脱修昔底德陷阱。事实上，一位直接为习近平工作的官员在去年十二月在北京的一次谈话中告诉我，他说：“格雷厄姆，你认为习主席为什么一直在谈论一种新型大国关系？”他说这是因为我们认识到旧有的国家关系形式使我们之前的大国不断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陷入灾难性的冲突，所以我们必须发明一种新形式。然后我说，“好，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现在我们需要的是对构思内容，或者如何把它变成可以实行的东西。”

那么首先，谁是我想要介绍的一位大思想家呢？我知道我们现在在中国，但我想说的不是习近平主席，尽管我认为他也是一位深刻的思想家。我要介绍的是一位名叫修昔底德的人。学者们对于修昔底德应该已经很熟悉了。不过，在座的学生们对他可能还比较陌生。修昔底德与孔子大概可以算是同一时代的人。孔子去世仅仅几年后，修昔底德在希腊出生。修昔底德是历史学科的创始人。他写了一本著名的书，名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讲述古典希腊两个伟大的城邦国家之间的冲突如何导致了古希腊文明的崩溃。这本书可以在 Kindle 或者类似平台上免费下载。我想建议所有人，特别是学生，去下载它，从只有一百页的第一卷读起。相信每一页都会让各位感到震撼。

所以，修昔底德是一个几乎在书中每一页都有着伟大见解的严肃思想家。事实上，在我的书中，每一章我都放了一句修昔底德的话作为题词，就是为了提醒读者们他们有多少有趣和重要的想法。

那么，修昔底德的伟大思考是什么呢？就是“修昔底德陷阱”。这是我在2010年或2011年开始这项研究时创造的一个术语，旨在更生动形象地描述修昔底德给予我们的洞察力。下面就是为什么他称它为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陷阱是指当一个崛起的大国威胁取代既有的强国时造成的危险动态。修昔底德在2500年前的古希腊写过非常著名的一段话，这也可能是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被引用次数最多的一行文字。他写道“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和斯巴达造成的恐惧，是让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实际上，他所说的“不可避免的”指非常可能，而不是百分之百会发生。

斯巴达是希腊一百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城邦。公元前五世纪初，雅典在波斯人战败后崛起，并定义了一切。他们定义了戏剧表达，在这方面有索福克勒斯和阿里斯托芬。他们正在创造历史学科，这方面有修昔底德。他们定义了哲学，这方面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他们正在发明建筑，看看帕台农神庙，你能找到比它更精致的建筑吗？他们还定义了民主，比如伯里克利。当时所有这一切都在发生。斯巴达人看到了，于是他们想，“等一下，这些雅典人会破坏掉一百年来我们处于希腊世界金字塔顶端而其他人处于我们之下的秩序。”

让我们回想一下一百多年前德国的崛起及其对英国的影响。我有一本书，《注定一战？中美两国能否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其中有一个章节“在通往1914的道路上”的篇章。英国已经习惯于作为这个世界的百年霸主。这就是日不落帝国。一个区区小岛有一个统治印度，加拿大和南非的帝国，这便是当时世界百年来的秩序。但是，德国在统一之后，特别是在工业化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壮大，到了1900年，已经超过了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到1914年增加了四分之一，并且它正在建立一支海军。再一次，用修昔底德的话来讲，你可以说德国的日益壮大和这种迅猛发展在英国造成的恐惧，是当时战况最为惨烈的一战爆发的主要结构性原因。

而且，我会特别对中国人说，你们再多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也不为过。如果你还没有读过并思考过它，你就错过了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课。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德国没有正确对形势作出判断，“我们越来越强大，与英国的战争将是一个好主意”。不，德国没有人想和英国打仗。英国也没有认为，“等一下，德国变得如此之大，我们需要和德国打仗”。不，他们相信他们不需要与德国开战。他们试图避免与德国的战争，但发生了什么？导火索是一场意外事故，一场公开的挑衅。一名大公在萨拉热窝被暗杀。一件事接着引发另一件事，奥匈帝国觉得他们有必要惩罚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害怕奥地利人会做得过分，德国人支持奥地利人，法国人与俄罗斯人结盟，英国人与法国人

纠缠在一起，在一切结束之前，他们都处于战争中。这是一场每个人都输了的战争。如果跳到战争结束的1918年，如果给当时任何一位执政者再来一次的机会，那么他们中没有人会选择他之前选择的（战争）。但是他们都做了（糟糕）选择，战争发生了。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教训。

今天，修昔底德图景可以通过中国的崛起来说明。这个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在更多方面发展得更快、更深远。你尤其可以看到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对现在的华盛顿的影响——人们渐渐发现，一个巨大的崛起中的中国在正在和美国较量，他甚至在很多方面都超过了美国。中国的崛起好像一直隐藏在暗处，但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留意。

因此，在我的书里，我回顾了过去五百年的历史，并且发现16个崛起势力威胁现有霸权的案例。其中12起以战争告终，4起双方没有打仗。所以，说“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的”是不对的，但是说这一切发生的可能性不小，那是正确的。所以最终的问题是，美国和中国可以逃脱修昔底德陷阱吗？

在这里，我要引用习近平主席在十九大进一步讨论这个话题时的一番话，他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的大国关系，新型的国际关系，或者说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以接下来的问题，这也是我这本书的副标题，美国和中国能过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吗？

在书里，我从学术角度出发给出了一个否定和肯定回答。否定就是，如果美国和中国照常进行贸易，照常外交，一切如往，那么我们可以预计到历史将像往常一样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历史轨迹可能意味着一场战争。这场灾难性的战争将破坏我们所有的希望和梦想，亚洲其他人民的希望和梦想，并且会被后世盖棺定论为一场愚蠢、疯狂的战争。这场战争可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疯狂，也许比它更为疯狂。所以不行，如果我们像往常一样经营两国关系，我们就无法逃脱修昔底德陷阱。

但从另一方面讲，答案也是肯定的。只有那些拒绝研究历史的人才会重复过去的错误。因此，习近平主席或特朗普总统或他们的继任者没有道理犯下威廉二世，或者伯里克利，或者其他人的同样错误。因此，本书的目标不是想要去论证宿命论或者故意悲观，而是想要提醒大家，我们正面临着严重的、危险的结构性国际关系危机。这是目前美国和中国面临的情况。关键在于，我们能否发挥创造力找到逃避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我对此报以希望。同时，我非常期待从别人那里听到更多关于如何逃脱修昔底德陷阱的思考。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从拉美与亚洲比较看发展新思路

■ Luiz Carlos Bresser-Pereira

巴西财政部原部长



谢谢大家，我很荣幸能来到这里。感谢复旦发展研究院的邀请。我演讲的主题是为什么拉丁美洲发展滞后于东亚。事实上，二战后，拉丁美洲实现独立。自 19 世纪初开始，拉丁美洲有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比亚洲更发达。那个时候，亚洲一直是欧洲帝国主义的受害者。举个例子，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被欧洲高度支配。到了后来，作为帝国主义经典范式的美国也加入支配者行列。但随后出现了战争，战后东亚国家开始独立，并开始发展。

现在我们遇到了一个问题。世界银行，还有几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发现了中等收入陷阱。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简单地说，当国家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即中等收入水平时，其经济就会停止增长。起初经济增速快，但突然间，增长速度开始变得非常缓慢。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转折处的增长速度应该在 1000 美元左右。实证数据似乎证实了这一观点，但在我看来，有三个问题与中等收入陷阱有关。

首先，相关研究定义的中等收入区间上限和下限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这里的中等收入说的并不是 10,000 美金，而是一个区间。其次，学者们无法找到影响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的新（历史）因素。当我们解释一些历史事件时，比如

国家发展速度突然放缓，我必须找到能够解释这一事实的新历史依据。我不能用旧依据解释一个新事实。第三，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东亚地区没有掉进中等收入陷阱。所以这个理论并没有那么强的普适性。让我再对这三个问题做一些更多的阐述。首先，这个相当大的收入间隔，我在这里列出了四位作者以及他们各自的论文，从图 1，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迈克尔斯宾塞给出的收入区间是 5,000 至 10,000 美元。另一项研究给出的是 2,000 至 7,500 美元。这里还有 1,000 美元至 12,000 美元。正因为各研究对中等收入所属的区间没有统一意见，“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叙述也就没那么让人信服。

1. Large bands of income levels

- ▶ **Michael Spence** (2011) – Book Farrar Straus Giroux. Between \$5,000 and \$10,000.
- ▶ **Jesus Felipe** (2012) –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306, Asian Development Bank, Washington DC. Two bands: i) \$2,000 to \$7,500 and ii) \$7,500 to \$11,500 (1990 PPPs).
- ▶ **Eichengreen, Barry, Donghyun Park and Kwanho Shin** (2013) – NBER Working Paper No. 18673. Two bands: i) \$10,000 and \$11,000 and ii) \$15,000 and \$16,000.
- ▶ **Aiyar, Shekhar, Romain Duval, Damien Puy D, Yiqun Wu and Longmei Zhang** (2013) – IMF Working Paper WP/13/71. Between \$1,000 and \$12,000

第二个被用于解释拉丁美洲和亚洲发展差异的原因是无法适应发展状况的制度。这是非常切中肯綮的。人们说，制度很重要。制度的确重要，因为我们从出生起就是在遵循制度。但没有新的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拉丁美洲会停止发展而东亚没有。的确，有足够的经验证据可以证明东亚人比拉丁美洲人更关注教育。但这是 1950 年而不是 1980 年的情况。在 80 年代，举巴西为例，巴西从 80 年代中期开始大力投资教育领域，以弥补之前它落下的差距。同样的，缺乏创新也不是新的原因。在加大基础设施投资方面，问题始终存在。我们从未停止投资，但投资总是不足。还有

人口统计学的数字等等，这些都不是新的历史事实，并不能解释为什么拉丁美洲的经济停止发展了，而东亚没有。在 90 年代是中等收入国家的韩国和新加坡如今是富裕国家。1990 年人均收入更低的中国自 1980 年以来持续快速增长。尽管最近其经济增速略有放缓，但仍然很高。所以，东亚国家肯定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那么，真的有中等收入陷阱吗？如果不称呼这种现象为中等收入陷阱，我提议我们称它为 20 世纪 90 年代发展陷阱。那么这又是什么？国家经济停止高速增长，不是因为他们已达到一定的人均收入，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是因为一个发生在 80 年代的与之相关的历史事实。这一事实改变了拉丁美洲的一切。

发生变化的是什么呢？是美国的政策体系。在 80 年代，我们有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在拉丁美洲，有着“华盛顿共识”，这是一种对拉丁美洲影响甚于东亚的改革，一种改变发展中国家政策体系的神奇口号。在 1997 经济危机之后，它也使东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不过这一政策体系带给拉丁美洲的变化更大。在拉丁美洲，我们有一个相对应于欧美自由政策体制的发展决策体制，而这些变化正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和欧洲。这些变化是由 1985 年美国的贝克计划定义的。贝克是当时美国里根政府的财政部秘书。这个计划的构想是各国应该进行财政改革，实现私有化，放松管制，自由化，并且它们应该增加外国储蓄，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就会实现经济增长。但我认为这些改革结果相恰恰相反。在拉丁美洲，它们并没有促进增长，反而阻碍和破坏经济增长。

首先，让我们看几个数字，这是 1960 年到 1980 年间拉丁美洲和东亚的经济增长率。东亚的增长速度已经比拉丁美洲更快，但两者之间的差距不大。我们再来看看之后发生什么。从图 2 可以看到，自 1991 年以来，1.2 对 5.3，这绝对是一个巨大的差异。而图 3 中显示的情况相同，红线代表东亚，蓝线代表拉丁美洲。两个地区的不同命运让人惊异。当然，各地区内的各国肯定存在差异，比如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极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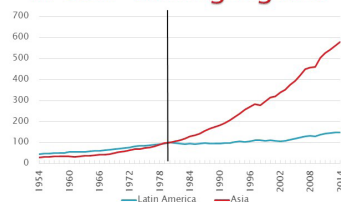
First, were, really, the 1980s a turning point?

Average income per person growth rates

	1960 -1980	1991- 2014
Latin-America	3.0	1.2
East Asia	4.7	5.3

Source: Pen World Tables. Latin America: Brazil, Mexico, Argentina and Colombia
East Asia: China, South Korea, Taiwan, Singapore (1954-60 not included).

A self-telling figure



Per person income of Brazil, Mexico, Colombia, Argentina and East Asia. Index 100 for 1980.

但为什么改革在拉丁美洲会产生相反的后果呢？它不仅没有促进经济增长，而是让各国停止运转；不是像以前一样促进工业化，而是让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业化程度急剧倒退，尤其是巴西和阿根廷；尽管墨西哥倒退得不多，但它的经济无论如何也趋于停滞。这并不是因为不平等现象增加了，尽管不平等一直是拉丁美洲的一个大问题。东亚在这一方面情况稍好，但不平等不是原因。

没有配合改革的财政调整也不是改革产生反效果的原因。财政调整非常重要，但它们不能解释拉美国家的经济衰退。我的看法是，这是因为改革使拉美国家陷入新宏观经济发展陷阱。什么是新发展陷阱？新宏观经济发展陷阱是利率的长期增长水平高于国际利率水平，其中最主要的是长期的汇率高估。

在 80 年代之后，或在 80 年代到 90 年代初期，拉丁美洲利率周期性大幅上升，而且汇率被长期高估。之所以出现周期循环状态，是因为有了一次金融危机，一场大萧条，货币大幅贬值，而后升值，几年稳定在一个高估的底线。然后再一次，国家陷入经常项目赤字，外债增加，几年之后，由于本国货币失去信用度而出现新的金融危机。

两件重要的事情导致了对汇率的高估：对利率的利用和滥用，以及体现在该国贸易体系中的抵消荷兰病的直观机制的消解。在 1989 年，我被发展中经济研究所邀请参加一场在日本举行的会议，该会议比较了当时的拉丁美洲和东亚。在 1989 年，拉丁美洲的经济停止了增长，而东亚继续增长。为什么？当时我们没有找到根本原因，也就是荷兰病，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差不多是那个时候，荷兰病的第一个模型刚刚发展出来。我稍后搭建了荷兰病的第二个模型。

什么是荷兰病？下面我将要展开讨论。一个国家要投资，必须正确地把握五个宏观经济价格。哪五大宏观经济价格呢？利率，汇率，工资率，通货膨胀率和利润率。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所依据的利率应该较低，而汇率应具有竞争力。也就是说，制造业有能力、可交易、非商品化的公司应



该使用已有的最好技术以实现竞争力。工资水平应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而增长，而不能超过生产力，因此利润率应满足包括制造业企业在内的大企业的需求。这就是该理论所要说的。

该理论还表明，增长取决于投资而投资取决于汇率。这些知识不在教科书中。在关于发展经济学的书籍或教科书中，没有一章关于汇率。为什么？因为这个理论没有假设汇率可能会在几年内保持过高估值。但是，一旦放弃汇率仅仅会波动的假设，而是假设汇率不仅仅是波动的，而且处在长期来看会有高估值的波动趋势中。那么当商人作出他的商业决策时，他考会虑到货币的过高估值，然后就不投资。因为使用最好的技术的公司没有竞争力。

那么，为什么拉丁美洲的利率变得如此之高呢？首先，是为了吸引资本。在拉丁美洲，人们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经济增长的最佳方法是引进外国资本。这是一个大错误。其次，他们利用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但用高利率来控制通货膨胀是没有道理的。当通货膨胀率上升时，的确需要更多的利率，但实际上不需要高达5%，6%，7%的利率。第三，因为利率对风险资本家非常有利，而资本家不仅仅是商人、企业家。今天，在所有国家，以利益，股息，房地产租金为生的风险资本家非常重要，他们喜欢高利率；而当他们在政府中执掌权力时，就会使利率维持较高水平，这也可以解释利率高的原因。当然，利率会抑制投资，使国家货币升值，并不必要地壮大风险资本家。所以这是利率高估值的一个代价。

其次是荷兰病。荷兰病就是对出口商品的国家的汇率进行长期高估值。为了通过出口商品获利，这些国家需要比使用最新技术的生产国更具竞争力的汇率。这就是荷兰病。因此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患有荷兰病，它就不会实现工业化。以巴西为例，就1930年至1990年间的情况而言，巴西的经济增长非常快，特别是在1930年至1980年之间，因为它抵消

了荷兰病。不仅巴西，其他几个国家也这样做了。它们直观地抵消了，而这基本上意味着征收非常高的进口关税，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的是，高进口关税并不总是意味着贸易保护主义。以幼稚产业为例，进口关税在工业化初期并不意味着贸易保护主义。但对于那些脱离幼稚产业行列却患有荷兰病，并正在用进口税来抵消荷兰病的国家，进口关税中荷兰病的抵消只与国内市场有关。这样做并非使公司能出口产品，而是为了使它们能够与国内市场上的外国公司竞争——我们不能说这是保护主义。这只是一次抵消荷兰病并确保公司公平竞争的方式。这就是在1930年到1980年之间的拉丁美洲，尤其是巴西发生的情况。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这种事情已经停止。为什么？因为经济开放。当经济对外开放时，抵消荷兰病的系统被解除了。当这种情况发生在1990年时，制造业开始落后其他产业约20%。这是灾难性的。其结果是整个经济、制造业陷入了一场大危机，然后我们对经济进行了大规模去工业化。这种情况几乎在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以不同程度发生，但它没有在东亚发生。这是由于改革和利率的改变。为什么利率增长如此之多？因为有金融自由化，正如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曾经说过的那样，70年代的东亚和拉丁美洲经历着经济危机，因为利率非常低。因此，为了压抑财政，必须提高利率，这从而导致了非常高的利率和非常高的货币升值。这就是80年代的经济发展陷阱。

综合来看，当汇率在东亚国家没有像在拉丁美洲一样被管控时，（当然在中国，国家经常账户赤字，增长外国储蓄），就会非常糟糕，因为它陷入了金融危机。荷兰病（如果存在的话）将汇率拉升至目前的均衡状态，高利率将汇率拉低至经常账户赤字。因此，低增长，去工业化和落后变得不可避免。

我的发言结束了。我认为我已经传达出了我最想表达的，而对这些想法我用几篇论文和三本书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总结。这些思想被称为新发展主义，我希望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两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谢谢大家！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开幕式大会主旨演讲



从全球价值链看亚洲经济合作

■ 王新奎

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理事长
上海市政协原副主席



众所周知，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标志着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以制造业全球分层式生产和任务贸易为基本特征的全球价值链革命告一段落，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已进入重大的转折阶段。在这个转折阶段，我们将面对来自三个方面的重大挑战，即，如何解决前30年经济全球化急速推进所带来的全球经济“再平衡”问题、如何摆脱迅猛的创新知识全球化浪潮给我们带来的知识、理论、政策储备严重匮乏的困境、以及，如何选择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的方向和路径。

毫无疑问，在解决上述三大挑战的过程中，亚洲作为一个巨大的贸易区域将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我的演讲将通过分析研究北美（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欧洲（欧盟28国）、亚洲（中国、日本、韩国、印度、东盟）三大贸易区域间货物贸易海关数据和服务贸易增加值数据，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阐述亚洲贸易区域内部加强经济合作的必要性。

一、全球经济“再平衡”进程中的亚洲

如表1所示，2017年，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贸易区域合计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约占全球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81.6%，其中，北美和欧洲约占52.0%，亚洲约占29.2%。以上统计说明，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贸易区域是过去近20年全球价值链革命的主要覆盖区域，并且，北美和欧洲

区域至今仍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有主导地位。

如果我们做进一步分析就可以发现，这三大贸易区域之间的货物贸易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如表2所示，2017年，北美和欧洲对亚洲的货物贸易逆差高达10160.9亿美元，其中，北美对亚洲的逆差为7499.9亿美元，约占73.8%，欧洲对亚洲的贸易逆差为2661.0亿美元，约占26.2%。这说明，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亚洲将是全球经济“再平衡”压力的主要承载区域。如此大的贸易不平衡是很多问题的根源，这一数据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表1. 北美、欧洲和亚洲货物贸易进出口额

区域	2017年进出口全球金额（百万美元）	占2017年全球进出口总额比重（%）
北美	5,573,124.4	16.8%
欧洲	11,708,342.4	35.2%
亚洲	9,697,967.8	29.2%
合计	26,979,434.6	81.2%

数据来源：Global Trade Atlas 数据库

表2. 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贸易区域间货物贸易平衡（2017）

区域	2017年贸易平衡（百万美元）
北美对欧洲贸易平衡	-196,164.1
北美对亚洲贸易平衡	-749,989.6
欧洲对亚洲贸易平衡	-266,096.2

数据来源：Global Trade Atlas 数据库

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这一轮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过程不仅仅是贸易流量的“再平衡”过程，而且是生产布局的“再平衡”过程。因此，这一“再平衡”过程必然对亚洲整体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带来重大的影响。

二、创新知识全球化趋势中的亚洲

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看，上述亚洲贸易区域在经济全球化“再平衡”进程中所承载的压力，只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亚洲作为全球价值链工厂端的地位。这一情况，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没有变化。众多的研究证明，

在创新知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当前知识服务产品的生产和贸易有越来越明显的向类似制造业全球分层式生产和任务贸易的方向发展的趋势。目前，尚无全球知识服务产品贸易的统计数据，但可以从服务贸易增加值的数据来间接地观察全球知识服务产品贸易的趋势。下面，本文通过对全球服务贸易增加值统计数据的研究，来分析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贸易区域在创新知识全球化中的地位和相互贸易平衡关系。

表 3. 北美、欧洲和亚洲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及其占全球进出口总额的比重（2014）

区域	2014 年进出口全球金额（百万美元）	占 2014 年全球进出口总额比重
北美	1,440,199.1	13.3%
欧洲	4,162,270.5	38.3%
亚洲	1,230,150.7	11.3%
合计	5,725,485.3	62.7%

数据来源：WIOD 数据库

如表 3 所示，2014 年，按增加值计算，北美、欧洲和亚洲在全球服务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为 62.7%，其中，北美和欧洲约 51.6%，亚洲约占 11.3%。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三大贸易区域之间的服务贸易平衡就可以发现，如表 4 所示，2014 年，北美和欧洲对亚洲的服务贸易顺差高达 631.1 亿美元。特别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北美对欧洲的服务贸易顺差高达 868.9 亿美元，约为其对亚洲贸易顺差的 3.18 倍。

表 4. 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区域间服务贸易平衡（2014）

区域	2014 年贸易平衡（百万美元）
北美对欧洲贸易平衡	86,886.4
北美对亚洲贸易平衡	27,316.8
欧洲对亚洲贸易平衡	35,786.0

数据来源：WIOD 数据库

上述服务业增加值贸易统计分析这说明，与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革命不同，在以知识服务产品贸易为代表的创新知识全球化的领域，北美现在处于绝对的引领地位，知识服务产品生产的全球价值链目前主要覆盖欧洲和北美区域，亚洲贸易区域在创新知识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尚不明确。

三、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进程中的亚洲

从可预见的发展趋势来看，区域超级 FTA，以及区域超级 FTA 之间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协调可能是重构全球多边

贸易规则体系的主要途径。如果我们把各贸易区域内部有次区域超级 FTA 安排的内部进出口贸易额占该区域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作为衡量该区域内部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水平的指标，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领域，相对与北美和欧洲贸易区域，亚洲贸易区域内部的制度性经济一体化水平都是最低的。如表 5 所示，2017 年，欧洲 EU 内部货物进出口贸易额占欧洲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为 31.4%，北美 NAFTA 内部货物进出口贸易额占北美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19.2%，而亚洲东盟内部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占亚洲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仅为 2.7%。又如表 6 所示，2014 年，欧洲 EU 内部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欧洲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25.1%，北美 NAFTA 内部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北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为 6.0%。但是，即便用亚洲贸易区域整体的统计数据计算，亚洲内部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亚洲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仅为 3.4%。我们大部分的服务贸易进出口主要是与欧洲各国发生的。

表 5. 北美、欧洲和亚洲各区域内部超级区域 FTA 次区域内部货物贸易进出口额占该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重（2017）

区域	2017 年金额（百万美元）	占 2017 年该区域进出口总额的比重
北美 NAFTA 次区域	1,067,600.1	19.2%
欧洲 EU 次区域	3,675,335.0	31.4%
亚洲东盟次区域	262,546.4	2.7%

数据来源：Global Trade Atlas 数据库

注：东盟国家中，文莱、柬埔寨、缅甸和越南采用 2016 年数据替代 2017 年数据，未获得老挝贸易数据。

表 6. 北美、欧洲和亚洲各区域内部超级区域 FTA 次区域内部服务贸易进出口贸易占该区域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比（2014）

区域	2014 年金额（百万美元）	占 2014 年该区域进出口总额的比重
北美 NAFTA 次区域	86,347.6	6.0%
欧洲 EU 次区域	1,044,302.4	25.1%
亚洲区域内部	41,788.6	3.4%

数据来源：WIOD 数据库

注：WIOD 数据没有东盟内部服务贸易的数据，本表使用的是亚洲内部服务贸易数据。



四、为什么亚洲必须加快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分析结论

1. 如上文所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不可能通过边境上的贸易措施来解决，而只能通过生产布局和相应的供给/需求结构的调整来解决。其中，调整供给/需求结构的关键不是减少出口，而是扩大内部市场的进口需求。尤其是19日中美联合申明发表后，出现了许多议论和猜测。可以确定的是，中美之间有三点内容是达成共识的。第一，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是一个问题，而且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进展。第二，这种贸易不平衡，单单通过边境上的贸易措施是解决不了的。它必须要通过结构的调整 and 市场的调整来解决。这也是一个共识。第三，因为两个国家的制度框架不同，在这里需要一个缓冲地带。因此短期之内，主要还是调整边境措施。但长期来看，是要通过内部结构调整来解决的。这三点是共识。所以我认为，中美之间这次的贸易碰撞，可能会维持较长的一段时间，但也会有一个审慎乐观的结果。

现在中国方面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从边境措施来讲，我们已经降低了汽车的进口关税，主动、单方面降低了。在内部结构调节过程中，有关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发布的文件当中明确规定，海南自贸试验区不准搞加工贸易。因为加工贸易是造成中国大量海关统计的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这些都是我们主动的调整。所以既有边境上的措施，也有境内的措施，包括更长远的措施。实际上，一带一路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我们中国周边的发展中经济体，能够通过一带一路的战略，通过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完善，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当中去。从而来解决整体上的不平衡的问题。这是一个更长远的战略。当然，美国也在采取一些结构性调整的战略。只不过双方的制度框架不同，互相要协调、理解、沟通。上文的分析已经证明，这种巨大的贸易平衡压力，不单单是中国一家，亚洲作为一个整体的贸易区域，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里也将承担巨大的在调整压力。比如中美之间调整了，这一调整压力就会转移到印度或者越南。而且因为全球价值链的关系都是相连的，中国从美国的出口减少了，我

们从日本的进口就会减少。所以这是一个整体问题，不是两国之间关系的问题。而且在10160亿的逆差中，中国占50%不到，还有5000亿是亚洲其他区域的。因此如何扩大亚洲贸易区域内部市场的进口需求将成为能否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关键。

2. 亚洲贸易区域通过融入创新知识全球化，加快提升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增加值层级中的位置，是扩大亚洲贸易区域内部市场需求的前提条件。在创新知识全球化过程中，我们极其缺乏理论知识。最近TPP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框架，但很不完整。最近77个国家，包括欧盟28国，在WTO启动了一个诸边的关于电子商务的谈判，去勾勒了一个创新知识全球化下数字贸易和投资的大致规则框架。这一框架能否解决问题呢？目前看来，路途非常遥远。有可能形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在创新知识全球化领域下没有全球规则，那就各自为政，变成一种分割的状态。还有一种，也可能重蹈贸易不平衡的覆辙。如果在知识贸易的领域出现亚洲大幅度的逆差，和欧美对我们的大幅度的货物贸易差一样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问题。

3. 无论是扩大亚洲贸易区域的内部市场需求，还是加快提升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增加值层级中的位置，我们均需要有一个好的、亚洲内部的、制度性的FTA的安排。我们现有“东盟+x”、“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展协定）、以及谈判中的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和中日韩FTA谈判。这些名目繁多、互相重叠、碎片化的FTA机制，是很难解决亚洲作为一个整体所面临的经济全球化重大转折的挑战。所以，在这些谈判的基础上构建一个包括亚洲贸易区域主要国家在内的区域超级FTA机制，我认为应该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亚洲贸易区域加强内部经济合作的主要努力方向。而且，从目前情况来看，已经到了非常紧迫、关键的阶段。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闭幕式大会高端对话



脑科学与机器学习：敢问路在何方



■ 主持：张力奋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FT中文网创始总编

张力奋：今天我们打算谈论的话题是关于脑科学，以及机器学习或者说人工智能是如何塑造人的存在，以及人类社会在技术不断发展，甚至出现颠覆性技术的情况下会如何进一步向前演化。对于脑科学的研究会不会推动我们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呢？人类的大脑如何和超级机器来竞争呢？我们能不能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共存？人类会不会最终被这些技术所奴役呢？人类会不会误用或者说滥用这些技术呢？这些问题都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现实。



大脑是一个输入输出装置

■ 李兆平

伦敦大学学院计算机系计算神经科学教授

首先我简单介绍一下脑科学和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脑科学就是去发现和理解自然，而人工智能是发明出来的。所以说脑科学是一项科学，而人工智能属于工程学范畴。科学和工程学其实是相互交织的。

理论工作是比较新的一门学科，我们比较熟悉的是生理学、心理学、医学，以及解剖学，这些学科是脑科学中的各个实验学科，从各自的角度和技术去观察大脑、理解大脑。现在，理论工作的作用越来越大，理论和模型让我们从各个实验观察的结果出发，升华到自然规律和定理，从而理解大脑。彼德·达扬获得了2017年的大脑奖，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理论学家获得大脑奖，之前都是实验科学家获得大脑奖。这是目前的新趋势，说明理论工作可以带动实验探索。

其实大脑是一个输入输出装置，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粗略的描述。如“视”是接受视觉信号，然后识别事项，“听”是收入声波，识别听觉信息，输出言语。感官系统的输出可以作为输入给负责运动或决策的系统做出视听言动的决策等等。视觉系统是人的大脑中最大的感官系统，如果说

整个大脑是个输入输出设备，那么视觉就是人的一个主要输入端。所以，研究大脑如果从视觉系统开始，可能进展会快点。在视觉系统里，视觉信息从视网膜到达脑后部的初级视觉皮层，然后到更高级的视觉皮层，最后通向大脑前额区。如果你仔细研究人的大脑的视觉系统的话，会发现不同的视觉区域之间有这么复杂的链接。每个区域里还有一个复杂线路，这个线路里面有很多的组件，称之为细胞或者说神经元。你可以把这些神经元想象成是大规模集成电路当中的一个晶体管。区域内的线路将这些晶体管连接起来。做生理学实验中，你可以用电极插入某个脑区域，比如视网膜或大脑其他区域，在屏幕上给动物看视觉输入。用电极去观察这些类似晶体管的神经元是如何对视觉输入做出反应的。也就能洞窥到大脑是如何工作的。

我们真正看到的并不是我们视网膜上的图像。我们的视网膜仅仅起到摄像机或者说是带有微处理器的照相机的作用。真正让你看到东西的是你的大脑，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想象到的。你的想象被周围情境引导，使你看到一些很生动的但其实不一定在视觉输入里存在的东西。



机器人也应该有环境适应的智能机制

■ 彼德·达扬

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2017大脑奖得主

我是理论学家，刚才兆平也说了理论科学在脑科学中的独特之处。神经科学研究的确是需要理论方法的，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我们可以对复杂的信号进行解读。现在我们可以同时记录下成百上千的神经细胞的信号，我们就需要理论思维来理解这当中发生的细节，从许多不同的时空尺度来看大脑里如此多个部件的相互作用。我们需要量的方法去解释这当中的复杂性，从而预测实验结果，像做一般的自然科学一样。

最关键的是，面对在残酷、糟糕的环境中的生存问题，大脑要解复杂的计算问题。人工智能需要面对同样的问题。李世石大脑在做走棋决策的过程，和一台 DeepMind 设计的计算机做走棋决策的过程，都同样是个计算过程。在做决策的计算过程中，大脑中用了很多不同的机制。

Daniel Kahneman 的《思考，快与慢》中，认为大脑在做决策时有多项机制同时进行，这些不同机制互相竞争、合作，背后是有理由的，因为它们占据着不同的最有效点，不同的机制需要不同程度的数据和学习，它们在统计和计算之间进行权衡。Kahneman 认为，这些不同机制的竞争会引起问题，从而导致有问题的决策。我的观点是，人工智能要应对同样的问题。经过多年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

做出好的决策是怎么回事，于是我们可以推出，大脑做出错误的决策将会怎么样，我们将看见什么环境适应错乱的情况 (maladaptivity)。这在心理和神经疾病领域尤其重要，我们可以用我们对决策制定的理解来区分不同的心理疾病，这种方式有别于传统的心理疾病诊断方式。我们会发现，有时候人们是在用正确的机制解决错误的问题，一个不幸的例子是快感缺失抑郁症。这些患者的奖赏回报函数有错，也就是说他们对什么是奖赏的认知有别于其他人，于是他们不再有理由去探索和开发这个世界。有些情况下，人们解决的是正确的问题，但采用的是不良的机制，典型的例子是冲动 (impulsivity)。你可能用不正确的方式来解错误的问题，比如英国的脱欧。或者你可能用正确的方式来解决正确的问题，但你曾处的环境和你正处的环境之间存在错误匹配。我们需要我们的智能系统能很好地适应环境，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贫瘠而没有机会的环境，不去开发和探索是一个正确的决策；但如果环境突然不贫瘠了，而我们因为不探索而不知道环境已变而继续不开发不探索的决策，就有问题了。机器人也应该有环境适应的智能机制。





人工智能能否具有创造性

■ 施 郁

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

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机器学习方面的应用，我尤其关注在科学研究方面的一些应用，希望能够举一些例子给大家有点感觉。我们都知道机器学习是基于数据的驱动，或者说从数据中学习，循序渐进地改善执行情况，并能对数据进行预测，而不是执行一个静态的程序。这是从模式识别发展而来。所以说机器学习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很多应用是属于模式的识别和分类。例如，机器学习已经用于对系外行星的识别和分类。

凝聚态物理和材料科学对于物质的相很感兴趣，比如冰、水、水汽是同一种物质水的三个不同的相。机器学习可以帮助我们确定同样的一团原子或者分子，在一定的条件下究竟处于什么相。再比如，机器学习也可应用于研究基本粒子的高能物理学。高能物理研究用到一些大型的加速器，最大的就是日内瓦的大型强子对撞机。现在物理学家正在这个对撞机的探测器中配置机器学习技术，从而能够迅速地决定高能粒子碰撞的产物，以便更好地研究组成世界的最微观的粒子。反过来物理学也可以为机器学习的发展作出贡献。现在量子物理学家已经提出一些方案，用量子计算指数级地提高机器学习的速度。

由于我们现在要讲未来，所以我想拓展一下想象或者猜想。我最感兴趣的是人工智能是否具有创造性，从而能够做科学研究，发现基本的自然定律，我们科学家是否会失业。

机器并没有人类的价值观，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所以他们本身不会对我们产生任何威胁，除非赋予他们人类的价值观。威胁来自于一部分人类，这与核武器的情况不无相似。当我们能够团结起来，建立人工智能发展的国际规则，我觉得乐观地来看，这些问题应该能够解决。

原则上来说，大脑最终无非是由一堆原子电子组成，

大脑的智能是相互作用的多体系统的涌现现象。因此原则上应该没有障碍最终实现具有创造性的人工智能，这些机器具备发现物理规律的能力。那个时候，人类科学家依然在工作，虽然这些工作可能差不多只是试图理解机器发现的规律。

大约十亿年以后，我们的地球就不再适合我们居住。而且整个宇宙也终究会到达一个境地，没有任何生命可以存在。所以作为生物体，人类总归会灭绝。我想，到那个时候，可以让智能机器继续我们探索宇宙的使命，这使得宇宙更有意义。



哲学与人工智能的关系

■ 徐英瑾

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说到哲学与人工智能的关系，必须要提到美国著名的哲学家 Hubert Dreyfus，在他看来，问题在于人工智能的运作方式与无人类的思维方式真的有很大区别。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也就是 AI 和 AGI 的区别。AI 当然就是人工智能，而 AGI 指的是通用人工智能。AGI 可以像人类一样从事各个领域的工作，可以灵活地处理各种领域内的问题。这样问题就来了：当霍金教授说什么“人工智能最终可能奴役人类社会”的时候，他说的“人工智能”到底是什么？从语境上看，他指的是 AGI，因为只有 AGI 才能够真正取代人类。但全世界真正研究 AGI 的圈子是非常小的，这么小的研究团队是否能够将霍金的担忧变成现实，便成了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事情。

不过，有人会问：从哲学角度来说，有没有可能将现有的人工智能研究一步步地演变成通用人工智能研究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关注主流人工智能研究的两大流派。第一个流派是符号人工智能。根据此进路，研究者要用公理化方式对人类常识进行编写，然后使用逻辑推理机制来使得机器能够自动地推演出一些在特定语境中有用的知识。但这是一个非常不灵活的做法，因为我们预先要将人类各个领域内的常识加以公理化，这个工作量太大，不太可能实现。另外一种人工智能是联接主义（connectionism），它发展成了深度学习，也就是现有的主流的人工智能技术。这种技术与符号人工智能一样，只能在特定领域内发挥作用，比如说 AlphaGo 可以在围棋世界里面所向披靡，如果不对 AlphaGo 进行重新编程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应用到其他的领域。不过，如果你全面地改写了 AlphaGo，它就不是 AlphaGo 了，就是另外一个软件了。因此，如何从这样的进路达到 AGI，我觉得是一个大问题。我觉得类脑的人工智能可能是模拟人类大脑的一种方式，

但困难也很多。比如，人类大脑研究起来就非常困难，我们知道大脑的一些大脑皮层结构，这只是表层，但是我们对皮层下结构的知识就要相对少得多。而且我们知道人类大脑非常复杂，即便在人类大脑皮层的表面就有太多的计算进程被牵涉到。所以有一些神经学家谈到，如果有人想用数学的方法表述一个神经元里面发生的微观事件，那么，该模型的数学复杂度就堪比整个大脑的神经元系统的宏观复杂性。



大家好，我昨天晚上刚从贵阳数博会回来，数博会上我们的虚拟机器人在做志愿者。这个虚拟机器人，平时就是一个大屏幕，里面放很多数博会的信息，但是只要人站在前面，立马做人脸识别。这个虚拟机器人就会弹出来和你对话，可以用语音方式直接交互，可以回答很多关于数博会的问题。这种自然交互的模式已经在很多商业里面得到了产业化的落地，目前已经为上千家大型企业提供了包括客户服务、内部服务在内的很多自然语言、自然交互的能力。

今天讨论人工智能以及人脑的话题，因为我是做公司的，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人工智能如何商业化，如何落地，如何真正的产生价值。

我简单说一下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人工智能到现在发展有 62 年的历史，我认为大概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其实是做逻辑推理，做这种逻辑推理可能会有非常复杂的模型，非常复杂的符号，这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非常厉害的计算机表现，比如说各种软件，可以做数学公式推导。

讨论：人工智能可以走多远

张力奋：非常感谢朱博士的精彩点评。我们现在应该进入大家感兴趣的环节，大家都喜欢争论，尤其是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人的争论。首先问一下彼德，你作为理论学家研究大脑和人工智能应该有差不多二十年的时间了，这二十年的时间当中，对于人工智能的态度和观点有没有发生过改变？

彼德·达扬：有一些改变。刚才朱总说的螺旋型的发展，我也非常同意这种说法。八十年代我读博士的时候，这是

人工智能的发展， 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 朱频频

小机器人创始人、CEO

第二个阶段我认为是专家系统，可以把我们人类的很多的生产生活当中的经验用知识的形式表示下来，并且让机器可以模拟这样一个过程，让机器可以掌握这样一些知识，可以做很多专业的工作。

因为人类的经验和知识有时候很难表示出来，我没有办法形成非常明确的规则来表述这个系统，后面的机器学习就应运而生，机器学习的任务就是在数据当中用数学模型把规律回归出来。现在随着深度学习的发展，我们的目标是，可以用一类模型的计算，利用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再确定我们应该用哪个模型来计算，这就降低了人类专家选取模型上碰到的一些瓶颈和困难。随着下一步的发展，我认为可能会有更好的机器学习的算法会出现。

但是我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是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因为现在我们又在做逻辑推理和专家系统了，但是方法和以前不一样，我们更多用计算机用大量的数据支撑，让机器能够掌握更多的背景知识和常识再做逻辑推理，而不是简单推理，这是下一步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

上一次人们对类似的深度学习有兴趣，但是那个时候没有强大的计算能力或数据来实现类似今天的进展。这些快的进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海量的数据和 GPU 技术的提高。

至于你问的根本问题，人工智能可以走多远，AGI 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实现。我认为有些怀疑可能过多了一点，也许（怀疑者）不容易想象技术会发展到如何程度。如果真有极限，就最好去理解这些极限是什么。

张力奋：兆平教授同意彼德的说法吗？刚才谈到了人

人工智能可能会在研究上遇到极限，你是怎么理解这些极限。

李兆平：现在在整个社会和更多的研究人员在拥抱深度学习，可能会加速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对于脑科学的理解。我很期待真正的突破发生。

我们要做的就是大数据和决策进行对应，当我们的数据是在多维的，映射的数量就会随维度数指数级增加，我们不可能做到所有的点对点的一一对应。可能有些空间的一些点，如果没有被照顾到的话，自动驾驶的车辆就会出现事故。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

徐英瑾：我想对这个问题做个快速的回应。电脑和人类决策的进程是否完全对称？人类的大脑的决策机制可以容忍小规模的数据输入，或者说有限的数据输入。我知道德国的心理学家吉仁泽（Gerd Gigerenzer）专门研究了人类的理性是如何以节俭的方式处理小数据的。

彼德·达扬：的确像您刚刚说的，根据小数据人们可以进行决策，但是并不是这类决策和以前其他的数据及决策无关。如你所知，如今在此领域里人们在研究 metalearning，即学会如何学，也就是说，从大量数据里学会如何用少量的数据来做决策。

朱频频：我补充几个我的想法。前两天有一位同事问我一个问题，他说谷歌用大量的视频去训练深度学习模型，让机器可以看得懂什么是猫，做了大量的训练，为什么一个小孩第一次见到猫和狗的时候看了几眼就能够认出这是猫这是狗。是因为这个小孩在前面的生活经验当中，已经看过了大量的事物，有了自己的基础认知，也就是说有了自己的基础模型，并且叠加了新的数据，才会产生新的认知，这并不是小数据决策的问题，反而是以大数据为基础的模型再加上小数据的叠加，这也是现在人工智能研究里面非常重要的领域，迁移学习，怎么样把这个领域的学习迁移到另外一个领域去，用少量的数据完成这个领域的认知。

张力奋：你是一个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个商业公司的创始人，你希望把你的商业利益进行最大的优化。你是否认为由于我们有巨大的商业利益和商业诉求，可能会威胁或者说使我们的人类智能或者说人工智能或者说机器学习走到一个一开始没有设定好的方向呢？

朱频频：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考虑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人工智能系统本身安全性和可靠性的问题。现在人工智能很多时候编程者不一定完全了解最后质量的反馈是什么样，这种系统安全性更加堪忧。

第二个观点更关心的不是机器怎么取代人这个话题，而是说如果这种能力被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第三个阶段是我们考虑的计算机智能不断发展，如果超越了人类，如果要控制人类我们该怎么办。第三个阶段离我们时代实在是太远了。

张力奋：谢谢朱博士，我想请施教授也发表一下你的观点。刚才已经两次谈到了基础的界限。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无人驾驶也不是你想要的，刚才朱博士也表达了对 AI 研究的一个担忧，施教授看来您觉得两者之间是否有界限呢？

施郁：当然，就伦理道德方面来讲，的确需要有限制。这就类似在核科技或者生物学方面，有国际伦理道德的基本规则。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大脑这么有限的体积，却如此发达，还有很多值得 AI 学习的地方，也值得去研究与现有的人工智能不同的其他人工智能方案。

彼德·达扬：让我在伦理问题上说一句，在英国，我们有一个粗鲁的说法，我们将死于阴谋还是死于事故？L5 级的自动驾驶的担忧是预计我们将死于事故。死于阴谋是 Elon Musk 所担心的。我认为危险更有可能来自事故，我们可能依赖于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的技术。这是人类经常做的事。

畅想：两年后，人工智能会发生什么？

张力奋：在我们结束这一节关于脑科学和机器学习或者人工智能主题讨论之前，我想问每位对话嘉宾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

两年对于人工智能来说是个相当长的时间。大家觉得 2020 年，也就是两年以后，人工智能会发生一些什么？会有更多令人兴奋的事情出现，还是令人担心的事情会出现。彼德提到有一天汽车会自己开进公司，无人驾驶汽车是个很好的隐喻，如果我们真正进入无人驾驶社会，这是不是你非常担心的一个现象。

彼德·达扬：我们可能对无人驾驶有两个担忧。一个是将有很多人失业。还有就是什么时候能是真正的“无人”，但 2020 不会有真正的“无人”。我兴奋的是，在神经科学，我们有很好的新方法，基因方法和别的方法，它们正在使我们能问崭新的科学问题。我们将能回答我们很想有答案的问题。

朱频频: 我都是从比较正面的角度看待这些事情。从技术的角度来看,我认为大概两三年的时间,能够让让机器和人的交互变得更加自然,更加高效和有用。从几个方面的技术可以来推动成长:第一个就是领域的知识模型这种快速学习和建设方面,第二个就是多通道自然融合交互体验,从语音、图像、文字,多通道融合交互体验,还有一件事情非常重要,就是情感。怎么样让机器很有效模拟人类情感,能够让机器和人进行更有效更舒服的沟通。

徐英瑾: 我觉得在人工智能体的道德编码以及立法的领域,可能会有一些令人兴奋的事情出现。不同的国家意识形态可能不一样,由此会导致不同的道德编码结果,做成不同道德品性的人工智能产品。换言之,各个文化主体只是希望能把人工智能作为一个工具,能够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出去。所以,我认为当我们谈论人与人工智能之间问题的时候,我们真正触及的乃是不同文化之间或不同国家之间的关系。

施 郁: 两年以后也许会有一些初步的人工智能的平台或者软件帮助我们的科学研究,我会很高兴地使用它们。

李兆平: 我希望在两年时间里面,会有更多的人工智能的产品研发出来为老年人提供服务。与此同时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在教育系统和科学实践方面能有更多的改革,我们希望看到更多的人进入神经科学,希望理论方法被加到生物学的教学内容里,把理论和实验整合在一起来进行脑

科学研究。

张力奋: 非常感谢大家。脑科学和人工智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它们会重新定义人类存在,以及在人类社会前进的过程中未其提供支持,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在台上有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在台上有非常多的学术讨论,也许在 90 分钟时间里边让各位专家达成共识,做出一个结论不太容易,这也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只是觉得这个主题会持续给我们提供兴趣来源,也会持续提供焦虑来源。这也是过去几千年来人类发展的方式。

(本文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演讲者审阅)



闭幕式大会圆桌 / 子论坛总结



特朗普与亚洲：美国政策与角色的变化



■ 承办单位:

复旦大学亚太区域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唐纳德·特朗普特殊的、侵略性的外交风格给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秩序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新重心，特朗普政府提出了美国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的发展纲要并推进了中国的发展。此外，特朗普政府认为中国是一个战略竞争者，但中美关系或它们之间的竞争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的规则，这需要两国的谨慎经营以避免可能的修昔底德陷阱。至于特金会，很可能会举行，并可能启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进程。

另一方面，日本对唐纳德·特朗普的外交政策理念和风格感到担忧，并正在考虑改变其对中国的政策，从竞争转向协调。特朗普的南亚政策旨在利用印度帮助稳定阿富汗，并在对巴基斯坦产生负面影响的同时平衡中国。最后，特朗普的政策对中东是有害的，会破坏现有秩序或给该地区带来巨大风险。最后一个观点是，由于特朗普的政策有失偏颇，中东的未来会更加暗淡。

全球绿色治理：一带一路的环境挑战与机遇



■ 承办单位:

世界自然基金会

上海纽约大学

生态环境部- 深圳“一带一路”

环境技术交流与转让中心

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信息中心

众所周知，“一带一路”沿线存在许多与贸易和投资联系的环境问题。中国政府已经启动了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并发布了指导方针。问题是如何解决环境问题。我们发现，如果我们能够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的绿色产品，贸易和投资，就可以解决与贸易和投资相关的所有环境问题。除

此之外，我们需要政策，区域或全球合作以及 WTO 来支持此类产品，贸易和投资。根据我们在“一带一路”分论坛上的讨论，我们希望能够准备一份今年年底推出的现实报告。

走向共同繁荣的中非关系



中非经济关系面临挑战，但机遇更大。由于中国的低成本制造商正在寻求迁出中国，中非关系正处于关键时刻。非洲正处于结构转型的边缘，因此他们试图吸引一些迁出中国的制造商。中国企业需要加强对国际市场的和非洲伙伴需求的了解，非洲国家也需要改善投资环境，以吸

■ 承办单位: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南非国家计划委员会

引更多的中国投资者。今天非洲和 1970 年改革开始时的中国一样承担着许多责任。最后一点是“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连接非洲市场和促进非洲工业化的重要机会，反之这些变化亦有助于实现更大的互惠互利、共同繁荣的目标。

欧洲与东亚合作中的跨国问题——跨越双边关系的面碗效应



本场讨论重点关注了东亚在全球事务中的非凡活力和独特作用，以及东亚和欧洲之间相互作用的动态。如何建立一个众多不同的信仰和思维模式碰撞并各自追求他们特殊的生活方式的共同的全球体系，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紧迫话题。我们发现，东亚新的区域合作机制，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筑、绿色金融和货币合作领域，可以补充现有的国际制度。东亚区域规则和关系规范的出现超越了它们

■ 承办单位:

杜伊斯堡大学东亚研究所

的地理区域，因此，合作和冲突可能同时发生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互动的不同领域。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随着数字信息处理容量的爆炸式增长，个别国家的努力已不再足够。民族国家之间需要协调和促进彼此的强有力的联系，以提高创新能力，并为迎接全球挑战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新时代、新金融、新经济



■ 承办单位: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
复旦绿庭新兴金融业态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对于中美贸易摩擦，两个大国要进行换位思考。首先，美国的制造业回归与许多因素高度关联，并非通过中国减少贸易顺差规模就可轻易解决。其次，仅仅用关税来刺激一个国家的贸易顺差实际上对于正确解决结构性贸易失衡问题效果是有限的。此次大会还谈及修昔底德陷阱，我们

不能让贸易承担调整中美关系的重任。尽管贸易摩擦是人为造成的，但本质上反映了全球化只解决如何把蛋糕做大而未解决分配问题。因此，我们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还要建立合作共赢共享机制解决收入分配问题。

2008 年危机后多边开发银行在亚洲和新兴国家中的角色



■ 承办单位:

金砖银行

首先，为了避免国内产业竞争力的丧失并且鼓励投资，这些多边开发银行必须用当地货币提供贷款。其中一个要点是，我们不仅需要从发达国家吸收经验，还需要从发展中国家吸取教训。确实，在进行基础设施融资时，存在一些复杂性，而这些复杂性主要与寻找可融资项目有关。多边开发银行必须能够创建大量项目，否则它将无法运作。因此，这种绿色领域的投资非常重要，多边开发银行可以发挥其作用，在开始阶段负担约5%的总成本来启动项目。

一旦投资者进入，这些资金就可以得到偿还。更重要的是，非洲在需求上差距最大，特别是治理方面的挑战，非洲的开发银行确实必须进行创新并且从私营部门吸取大量尤其在重组贷款方面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是，在多边开发银行之间进行合作至关重要。多边开发银行或区域开发银行也应该国有化，应该重点关注作为现代基础设施，而不仅仅是传统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连接。

嘉宾访谈

上海论坛 2018 期间，组委会邀请复旦大学知名教授以及学生记者对论坛嘉宾进行专访，听取他们对于相关研究领域的洞见，及对亚洲发展的思考

智者对话

变化世界中的中国角色

编辑：黄昕蒙

「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等一系列举措，中国正努力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中国将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 Shamshad Akhtar

联合国副秘书长（时任）
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时任）



采访者：胡涛

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分会中国项目主任

胡涛：阿赫塔尔博士，当今世界瞬息万变，您在主旨演讲中提到了亚洲在其中的责任。您认为中国又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Shamshad Akhtar：中国在亚太乃至全球经济中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经济政策不仅对国内产生影响，也会波及世界各国。因此，我们首先要理清当今世界经济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当前，世界经济走向堪忧。全球金融危机导致经济衰退以及大量失业，而许多因素延缓了经济复苏。一些发展中国家被边缘化，经济也备受打击。要想使他们摆脱困境，就必须由国际社会提供支持，这是至关重要的。在此背景下，我认为中国拉动内需可以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均衡。另外，在过去几年里，中国经济迅速从投资驱动转变为消费驱动，完成了复杂全面的结构改革，可以照顾更多社会群体的利益，兼顾环境保护，形成了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态势，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简而言之，我认为中国将引领各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因此，中国的地位十分重要，对地区和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也是一些国家效仿的榜样。

胡涛：您认为中国对亚洲地区有何影响？

Shamshad Akhtar：我认为中国的重要角色在于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中。过去四十年间，中国一直通过亚洲发展银行、世界银行等促进多边共同发展。中国也一直为维护多边主义发声。在世界经济格局多变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显然，中国正尝试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获得更多话语权。中国也需要从世界银行中借款，但他一直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保持联系，支持多边治理机制。如今，中国负责管理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一系列地区内的多边融资机构，设立了特殊扶持资金，并将这些与一带一路倡议挂钩，推动地区合作与融合，使亚洲市场更加多元化。中国在亚洲的大量投入有目共睹，也将带动贸易的增长——这是非常重要的趋势，可以打开更多新兴市场，为贫困地区创造财富。因此，中国推动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是卓越的成就。我希望其他一些国家在理顺国内经济后可以重新加入谈判。

胡涛：今年将在上海举办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借此吸引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出口。您对此有何看法？

Shamshad Akhtar：中国必须扩大进口市场。一个国家不能只出不进，因为双边贸易必须是双向的，不从别国进口将会打破贸易的平衡。这是中国经济存在的一个问题。习近平主席一直秉承共同繁荣的理念，中国也正成为世界上重要的消费市场。维持国家间的贸易平衡是明智之举。

胡涛：中国正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您对此有何看法？这是沿线国家的机遇还是挑战？

Shamshad Akhtar：首先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机遇。亚洲地区税收占GDP比重很低，因此国内资金较为匮乏，发展中国家过去必须依靠多边开发银行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当然，仅靠外部支持是不够的，但在调动国内资源之前需要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填补空缺，为融资提供支持。一些国家担心中国会过多干涉其他国家，但每个国家都可以独立思考自己想要从一带一路中获利多少。没有哪个国家会被强迫加入基础设施开发项目。

但是有两个关键问题亟需解决。其一是劳动力市场带来的政治问题。如果一带一路倡议意味着必须使用中国劳动力，一些国家就会产生顾虑。我在家乡巴基斯坦采访了一些商人，问他们对中国管理者和劳工的到来有何看法。他们认为巴基斯坦确实需要技术，但对中国劳动力较为抵触。

其二是资金的稳定性。一些国家对清偿各国债务的能力十分担忧。并非每个国家都是如此，因为各国情况不同。但对许多国家而言，其进口大于出口，因此清还债务并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这并不是中国造成的，但作为理智的贷款人必须有所考虑。

胡涛：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对一带一路倡议持怎样的态度？委员会与倡议中的项目有没有合作？

Shamshad Akhtar：亚太经社会一直以来十分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但我们并不是其中成员，因此不做代言。我们在技术层面上为各国服务，通过开展研究为中国提出建议。我们还要确保一带一路项目遵守社会准则、环保标准和融资规定。亚太经社会联通了多国政府以及一带一路项目成员，与沿线国家就倡议展开了多次对话和讨论。通过政府间的努力，一些市场准则得以改进，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我们一直推动交通、能源、信息通讯技术、市场整合和贸易的发展，鼓励国家降低关税，这些都对一带一路倡议有所帮助。这些措施无需从头再来，只要将原先亚太经社会主导制定的规划改由沿线国家主导即可，这样就不会因个别国家而受阻。我们也有能力组织各国政府讨论一带一路倡议的福利，他们是否有更多需求或者他们遇到了哪些问题。这个机制可以高效地给中国提供反馈。

胡涛：感谢您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巴基斯坦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中巴人民之间友谊深厚。2015年，中巴经济走廊正式启动，请问您对其前景有何看法？

Shamshad Akhtar：确实如你所说，中巴经济走廊是两国长期互信和合作的体现，也是两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促成的。中方不干涉别国内政的举措也深受巴政府尊重。同时，巴基斯坦发展受到若干问题限制，需要外部帮助。

其一是巴缺少基础设施所需的资金。一些建设工程十分复杂，比如今年通车的“苏木段”高速公路，没有中国的帮助是无法完成的。如今经济走廊的项目更为广泛，从陆地交通发展到港口联通。瓜达尔港的建设就受到了一带一路的大力支持。巴基斯坦政府希望将瓜达尔市发展成经济枢纽，当地的优良港口可以提高交通效率。因此瓜达尔港项目对中巴都有重要意义。瓜达尔市位于俾路支省，是巴基斯坦最欠发达的省份之一，急需发展动力。中巴经济走廊建成后将带来旅馆、商业和工业需求，使瓜达尔市迅速发展。

另一个问题是巴基斯坦缺少能源。现如今，巴基斯坦投资了许多可再生能源和热电厂项目。我们拥有这些资源，但过去从未得到开发。中国投资的清洁能源技术将成为巴国内改革的一部分。这是非常理想的状况，巴基斯坦必须抓住良机，发展经济的同时进行改革。

胡涛：您曾任巴基斯坦中央银行行长、世界银行中东和北非地区副行长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等职，现在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作为一名成功的女性，能向其他年轻女性提供一些建议或者分享一些经验吗？

Shamshad Akhtar：我认为女性的成功之路大都十分艰辛。我的家庭十分看重教育，因此我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大多数女性却并非如此。即便受过教育，女性也面临许多挑战，尤其是进入职场之后。当我在多边开发银行工作时，我意识到女性的玻璃天花板。突破这个天花板并不容易，你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对自己有信心，并且专注于所做的工作。不要失去希望，但也不要以为你已通晓一切。一直以来，我的原则都是我还有不明白的东西，我需要学得更多。我之所以攻读博士后，是因为除了在博士阶段学到的经济知识之外，我感觉自己还需要更多经济领域的知识，想要探索经济学的前沿。另外，你必须在工作中学习。学校的教育方式是可替代的，但工作中学到的是独一无二的，你能够了解一手的、真实的市场知识。我一直十分渴求新知，我认为这是我成功的第一要素。

但女性常受到巨大的社会、文化阻碍。女性的社会化是一大问题。当今的女性拥有开放的媒体和计算机技术，可以轻松获取知识，但当我完成博士学位踏入职场时并非如此。过去，女性进入职场都很困难，而如今女性对职业可以精心谋划。她们发现社会化是获得关注的重要途径。在我过去的职业生涯中，我并没有这样做，但如今在联合国我必须社会化，我必须表现得像一个外交官。我的同事可以告诉你我对此并不支持，人们需要实打实的技能来谋求发展。

同时，好的导师也非常重要。我在职业生涯中并没有导师，但有很棒的上司，他们对我的技术水平十分信任，也常常鼓励我。如今我常常指导同业的其他女性。我希望我可以任命更多女性，鼓励他们进入我的行业。

半岛问题与党政选举 ——日本的国际与国内关切

编辑：俞臻



■ 河村建夫

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



采访者：樊勇明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理事长

樊勇明：今天如此紧张繁忙的行程，真是辛苦您了。我们接下来聊些什么呢？关于日中关系我们已经聊的够多的了，要不就来轻松地聊聊别人的话题吧。另外，这次我们的采访将全程采取视频录像的形式。最近中日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打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则显得尤为重要。不知道先生对于现在朝鲜半岛的局势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河村建夫：原定在6月12日举行的美朝会晤，现在已经被特朗普总统取消或者说是暂时推迟。全世界都非常关心美朝峰会什么时候能够重回正轨。中国今后要如何斡旋于美朝之间，以及对于北朝鲜的现在的状态，会给金正恩什么样的建议，这些都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金正恩在近期两度访问中国，这也是因为局势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对中国各方面的依赖就变得更加强烈了。中国一直以来都是朝鲜的伙伴，从这个层面来看，我们可以感受到今后中国的存在也将继续对美国，朝鲜以及韩国产生重大的影响。

樊勇明：也就是说您认为，中国在美朝之间如何扮演中间人、调停人的角色，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对么？

河村建夫：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樊勇明：在这之前我们曾试图通过六方会谈这样一种

机制来力促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但是现如今朝鲜退出之后六方会谈迟迟没有复会，只有南北朝鲜、美朝、美韩、美中朝韩这样的对话机制存在。虽然日本与朝鲜半岛的关系也非常紧密，但总觉得日本似乎已经被排除在外，先生对这种情况有什么看法么？

河村建夫：从现在的形势来看，我认为有必要推动重启曾经的六方会谈，使朝鲜参与进来，俄罗斯也包括在内，与会各国在相互协调的前提下探讨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一点非常重要。再一次重启六方会谈，让各国在互相沟通的前提下制定规则。确实像您所说的日本现在有种边缘化的感觉，也有一些声音指出日本不该完全依靠美国。

樊勇明：您认为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

河村建夫：我认为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最近李克强总理已经访问了日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安倍首相和习近平主席的会晤更显得尤为重要。

樊勇明：那么也就是说，朝鲜半岛的形势今后也将是中日韩三国所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安倍首相的访中和习近平主席的访日势必将成为下一个热点话题。日本方面必须更多的释放一些积极的信号。下一步，河野外相就该采取主动重启六方会谈了吧？

河村建夫：能采取主动，我认为也应该采取主动。河野外相正在积极地开展外交活动，安倍首相也正在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那么主动推动六方会谈的重启自然也是在下一步计划范围内的。

樊勇明：如果日本下一步能够掌握主动权的话，才能渐渐地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中国也乐于看到日本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要是过于强势，行动可能就有不受控制的风险，那样的情况对我们来说也不甚理想。而在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和稳定这一点上，美国、日本和中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说日美是同盟，但是美国为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牺牲了日本的情况也不少见，尤其是在特朗普当选之后。先生对这件事有什么样的看法？

河村建夫：对于日本来说，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背后，还有着绑架问题。民众非常关注事态的发展，并期待着横田惠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因此安倍首相在国内发表公众演说的时候一定会涉及绑架、核武器、导弹这三个话题。日本对于美朝会谈的期待也正在于此。特朗普总理也是能够理解日本的立场，并且对安倍首相的重要诉求有一定认识的，因此这些问题的协商解决是值得期待的。但是美朝会晤也存在交涉和利益角力，因此时机也显得非常关键，现在正是处在一个暂时搁浅的阶段。另一方面，日本的想法与其他国家又有所不同，因此在采取行动时也不得不慎重。作为日本来说，我们非常期待在“特金会”之后，也能实现日朝首脑会谈。

樊勇明：确实就像您所说的，绑架问题是一个国内问题，但一旦牵扯到导弹就变成了国际问题了。日本在这些问题上也将采取更加强势的态度吧。外交就像是一场纸牌游戏，双方各自手持一副牌。那么关于您刚才提到的日朝首脑会谈，可以想见的是日本将向朝鲜提供经济支援，通过日元贷款清算历史，那么除了“经济牌”之外，日本还打算对朝鲜打什么“牌”呢？

河村建夫：朝鲜的民众同韩国一样，都是非常敬业勤勉的。日本的民众受益于社会保障等制度才能够过富足的生活，那么对于朝鲜来说，除了金钱援助，完善社会的制度法规等方面的协助也很必要。我们希望朝鲜能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政府权力受到约束的国家。虽然说日本还没有采取这方面的行动，但是确实是有这样的计划和考虑的。另外，还有农业技术和渔业技术。

樊勇明：朝鲜长期以来都深陷粮食短缺的危机当中，如果日本的大米生产加工技术能够用来解决缺粮的问题的话，那对于朝鲜人民来说再好不过了。

河村建夫：渔业方面也大有可为。最近由于粮食短缺有不少朝鲜的海难船只渡航到日本。另外，渔船方面也确实是日本的优势领域。

樊勇明：我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曾经在日本农林水产省下的海外渔业协力财团担任过翻译一职，朝鲜一定也乐于见到日本海水养殖技术的引进吧。在渔业这方面，韩国的实力又怎么样呢？

河村建夫：最近有许多的韩国渔船进入日本专属经济海域捕捞，甚至影响到了日本渔船的正常生产作业。由此可见韩国应该也是具备这方面的实力的吧。虽然不好说日本在这方面给予了韩国多少援助指导，但是渔网编制之类的不少技术确实都是从日本引进的。渔业确实是日本的优势领域。

樊勇明：韩国和日本既是近邻，又有非常密切的人员往来。在经济方面也随处可见韩国元素的影响，比如软银。那么韩国和日本在对朝鲜政策上会有相互竞争么？

河村建夫：可能会有有的。这还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韩关系，以及日本愿意接受哪些条件吧。日本应该认识到，朝鲜半岛今后必将会朝着统一的方向发展。东德和西德的统一成就了现在的德国，这对于朝鲜半岛未来的发展道路也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日本不可能撇开韩国来发展与朝鲜的友好关系。日本还是会在维护好日韩关系的前提下，与朝鲜进行国家间的合作。

樊勇明：似乎还有点时间剩余，我能向先生请教一下日本国内的问题么？

河村建夫：请讲。

樊勇明：由于我自己本人是做日本研究的，因此对于日本的政局变化比较关心。按当下的局势来看，安倍首相再次参选是不是比较危险了？

河村建夫：如果只看媒体报道的话，确实容易产生这样的印象，民众对于整个政治体系的信赖被动摇了。有人说安倍首相仿佛在遮遮掩掩着什么，在对民众说谎。在野党在这个问题上也是穷追不舍，安倍自己口口声声说要整治积弊沉疴，改善政治生态，结果这积弊反倒出在自己身上。按照现在的情况看的话，确实首相夫人与森友学园的交情深厚，但是从刚刚出狱的笼池夫妇的言行来看，怎么都不像是正派人。天真单纯的首相夫人大概只是被无辜卷入其中的，而不是真的做了什么事。不过安倍首相也不至于完全不知道这件事。

樊勇明：还是知道的吧。“忖度”这个词听起来就很意味深长啊。

河村建夫：财务省相关官员“忖度”安倍意向应该是确有其事，但是反过来说，官员也该有自己的操守，永远清楚地知道这块土地是怎么回事、又该按什么规矩出售。现在这种局面恐怕是相关官员根据氛围擅自解读和判断的结果。我觉得安倍首相应该并没有特别介入其中。另外，加计学园的问题也是，碰巧加计学园的理事长与安倍首相从一块儿在美国的时候就是好友，这件事情才变得复杂起来的。四国地区的四个县中没有任何一个大学拥有兽医学部，我认为这恰恰暴露了文部省行政的弊端。而在这种情况下，设立兽医学部本来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在考虑地方发展与活力创造的时候，（采取这样的政策也不足为奇）。只是碰巧加计学园理事长与安倍首相交情深厚，才有了官员自发地“忖度”安倍首相的意图，这样事情就说不清了。我觉得这本不是什么大问题。

樊勇明：那么这样说来，安倍首相还是有可能再度参选的…

河村建夫：我是这样认为的。

樊勇明：那么也就是说岸田内阁的诞生就是明年或者后年的事儿了？

河村建夫：如果安倍首相再次当选，那么可以想见的是岸田应当会成为下一任首相的有力候选人。我们也非常关注岸田在安倍竞选中会出什么力，现在正想进行这方面的讨论呢。

樊勇明：另一方面，岸田本人则表现得相当谨慎，静观局势变化伺机而动。

河村建夫：现在从自民党内部的人数来看，势力最广的还是安倍派…

樊勇明：以前的福田派成了现在的安倍派，然后现在在人数上是最多的？

河村建夫：对的。是毫无争议的领先。

樊勇明：那么接下来是…

河村建夫：麻生在第三位。

樊勇明：麻生在第三位，岸田占第二？

河村建夫：岸田应该在更加靠后的位置。

樊勇明：那么第二位是？

河村建夫：第二位是竹下派，也就是原先的田中派演变而来的。二阶派则是差不多在第五位。第一位和第三位、第五位联起手来，国会中的半数议席就能得到保证了。

樊勇明：那么二阶派在当下有与麻生派联手的可能性么？

河村建夫：当然，现在麻生派和二阶派正展开紧密的合作。我曾经担任过麻生内阁的官房长官，因此也算是加入了麻生派的。现在整体的走向就是如此，二阶理事长正在访问大连，他不管去到哪里都必定公开表明支持安倍首相。

樊勇明：麻生在财政等方面还是很有一手的，但是国会答辩的时候…

河村建夫：确实有点口无遮拦…我在做麻生内阁的官房长官的时候，也数次碰到过这种情况，所以也不足为奇了。但是要是完整地听完整段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他讲的还是符合道理的。但是要是断章取义的话就…我做官房长官的时候，差不多也有两三次这样的情况，不过都不是什么举足轻重的国家大事，也不至于发展成国际问题。

樊勇明：另外我还感觉现在日本的政局，仿佛像是回到了70年代末那个阶段。那个时候实力最强的是社会党，大约有百来个人，跟在它后面的则是公明党等一些小的政党。现在在野党当中立宪民主党风头正健，不知道民众对于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河村建夫：（公明党）虽然召集了几十个人，但是在国民中的支持率却仅有1%。这也可以看出，国民对于在野党其实是不抱什么期待的。尽管发表的言论乍听起来气势十足，但事实上在野党内部也是零零散散的。一些比较有实力的议员以无党派身份参选，总体来看在野党内部并没有实现有效的团结。

樊勇明：那么也就是说自民党现在依然是政权无虞的状态？

河村建夫：不过政权内部曾经已经有过交替了。结果可能还是要看总裁选举吧。

樊勇明：只是自民党内部谁当选的问题。

河村建夫：在当选者确定之后再团结统一起来，这也是自民党的传统了。内部竞争的时候毫不退缩，等选举结果出来了之后便重新团结起来。

樊勇明：小泉进次郎作为下一任自民党总裁的呼声很高，您对他有什么看法呢？

河村建夫：在民众当中人气非常高。国民舆论调查当中支持率仅次于石破位列第二，甚至一部分的统计当中小泉的支持率还超过了石破。

樊勇明：但是在我看来，如果小泉当选自民党党首，恐怕失言、胡言的问题不会少吧。

河村建夫：他毕竟还年轻，也没有担任大臣的经验。自民党有意让他进入内阁，在逐渐积累政治经验的过程中，将他培养成下一位党首。不过在我看来他倒是很好的继承了父亲小泉纯一郎的优点，发言也很恰当，虽然有一些年轻冲动之处，但总体来说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樊勇明：我冒昧地问一句，您的前任——石破怎么样呢？他还年轻，是否有做首相的想法呢？

河村建夫：他确实有这样的想法，这一点我们也都清楚。但是他在党内只有一个小团体，人数和实力也止步不前，这可能是他目前所面临的一个困境。不过只要慢慢积累政治经验，想必知名度也迟早会上升的。不过现在看来的话，小泉的人气要更高一些。如果小泉进次郎与他联手，认真谋求参选的话，那么形势可能又会发生一些变化了。

樊勇明：我曾经一度以为现任东京都知事的小池百合子，会与自民党合作成为日本的首位女性首相的，现在这种可能性还存在么？

河村建夫：完全没有了。之前小池百合子牵头建立的政党现在分崩离析，在那之后她几乎就已经被排除在了角逐名单之外。现在小池百合子主要专心于东京都的政务，而不太过问国政了。

樊勇明：立宪民主党中有不少原先都是自民党的领袖，那么它将来再次被自民党吞并好像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啊。

河村建夫：那倒还不至于。日本采取小选区制，初衷

正是为了避免像美国那样两大政党政权交替所引发的巨大政局动荡。国民能够根据各党的施政纲领，安心选择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家领导人。可惜在我从政的 28 年的经历中，政权就已经更迭了两次。

樊勇明：94 年宫泽和之后鸠山的时候对吧。

河村建夫：两次都是自民党内部分裂以及大选落败的时候。所以在野党要想获胜还是得在大选之前团结起来达成一致，这可能才是在野党的唯一出路。

樊勇明：按现在的情况看，联合一致可没那么容易啊。

（笑）今天感谢您在百忙之余接受采访，还陪我聊了这么久。先生对上海论坛有什么期待或者寄语么？

河村建夫：我第一次出席上海论坛，深深感受到论坛放眼全球的格局之大。（除了中日是世界第二、三大经济体之外，）韩国的经济实力也位列世界第 11 位，因此中日韩三国应当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做出更大的贡献。看到今天与会的各位代表、各种各样的地方机制，我觉得日本应该对上海论坛给予更多的重视。上海的日企有不少都出席了，那么日本的企业是否有可能成为论坛的赞助方？我觉得这样的模式值得期待。如果论坛能够发挥倡议、引导的作用，那么我想日本一定能够在论坛中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对于论坛与日本相关的举措我可能会做更加深入的了解，然后尽我所能地提供合作和协助。如果日本能更多地参与，那么我相信上海论坛的对话和交流一定也能够进行的更加热烈。

樊勇明：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扩大和日本交流合作的范围。今后也请多多关照。

变动中的中美关系

编辑：鄢宇濛



■ **Graham Tillett Allison, Jr.**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



采访者：**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兼行政所长

复旦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中心主管

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吴心伯：早上好，格雷厄姆·阿利森教授。欢迎来到复旦大学上海论坛。

Graham T. Allison：谢谢你的欢迎。

吴心伯：在过去几个月里，整个世界都在密切关注中美之间的贸易和经济摩擦。您可以从美国的角度解释一下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的所作所为背后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吗？

Graham T. Allison：如果有人确切知道，他们会得到一份奖品。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特朗普是个十分罕见的奇葩。因此，他让美国人和中国人一样困惑不解。但我认为，在此次贸易战实际上反映了一个事实——在过去 25 年里尤其是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大国。中国崛起的速度和以远超其他国家的速度、更全面的方式崛起。而美国人只是一点点缓慢地发觉这个事实。因此，当他们意识到这一事实时，他们发现已经有一个几乎在所有领域都可以与美国比肩甚至更加优秀的国家出现了。这对那些在美国这匹赛马上下注最多，并且理所当然认为是世界第一的人来说是一种威胁。然而中国的出现简直是当头一棒。也是对现今世界秩序的巨大冲击。特朗普感受到了这一点，并在竞选中利用了这一点。大部分美国公众都觉得中国一定是在作弊，而他第一个站了出来成为了这些有同样感觉的人的首领。否则，怎么才能解释他会如此成功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无论什么事都归咎于中国的原因。也许有些事真的应该中国负责，但大多都是莫

须有的指控。而中国的态度也并不激烈，只是当成小打小闹一样得过且过。但是现在它被夸大成一个无法原谅的错误。就我分析，所有这些反应的潜在动力是为了维护因为中国的迅速崛起而受到挑战的美国世界统治地位。

吴心伯：是的，我的第二个问题正与您的分析有关。在我最近访问美国期间，我还发现除了公共立场政策方面的贸易问题，美国社会还普遍存在对中国的崛起的焦虑，甚至是对中国崛起有如实质的抵触情绪。从冷战结束后至今，现在的美国让我感到非常的陌生。过去的美国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乐观和自信，一直倡导开放、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然而现在，似乎一切都在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这种对中国强烈的抵触情绪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

Graham T. Allison：你描述的这种情况完全正确。在如今的华盛顿执政和政策制定阶层普遍存在着一种焦虑情绪。修昔底德会说他已经写就了关于这些问题的书，书中的故事讲述了雅典崛起时的统治力量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我有一个非常合适的比喻来描述这种情况，如果我习惯于站在时代的顶峰，而在这个时空里，出现了一个可以与我竞争的人，这会让我感到不安全，我会害怕世界被改变。当然，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世界总是在改变。所以，现在在美国的这种情况有部分原因是外界的客观因素造成的。但更重要的是国内的原因，美国的自信是在二十世纪末建立起来的，并且在新世纪之初就认为世界正朝着它制定的方向发展。然而事实上，针对世界贸易中心的 9·11 恐怖袭击，

布什对伊拉克的冒险和政府原本认为可以推动利比亚解放结果却是一片混乱的“阿拉伯之春”，再加上巨大的金融危机和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的无力。这一切并不是美国自己所期待的那个美好世界。正相反，中国的表现则总是打击美国人的信心。现在，你大概已经明白了这种现象如何产生的。正是因此，民粹主义开始在大多数感到被甩在后面的民主国家兴起。

吴心伯：您可能与媒体、政策制定者们交谈过。我认为外界对于今天的中国的评述有时是有选择性的，甚至是扭曲的，他们没有以正确的方式解释中国。尤其是中国过去几年的经济增长，其唯一的并且最终的目的是让8亿人摆脱贫困。这对世界有很大的贡献，不应被视为对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的重大威胁。在美国对中国的解读中，我认为，其对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长期战略意图也有某种夸张和歪曲。那么请问您现在对中国有什么看法，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您如何预测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上的未来发展？

Graham T. Allison：让我先从你的前一个问题答起。因为我认为你一如既往的敏锐地观察到了美国所发生的事情，并且我认为你的解释是正确的。“修昔底德陷阱”现在正在我们面前发生，我们随后也感受到了它的存在。修昔底德谈到了这给斯巴达带来的恐惧，也谈到了这种恐惧对人们心理感知的影响。对斯巴达城来说，人们的错误的感知被放大，误判也被放大，因此，受到外界行动影响的风险被放大。现在，我知道中国在成长，我预测未来10到20年，或者30年，这个数字会成倍增长。而到那时候，我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将是美国的两倍。但是中国会在未来的10年、20年或30年内继续保持这样奇迹般的增长率吗？没人知道。即使它做到了，我也同样是夸大了对中国的解读。有人认为，事实上，七八亿人口脱贫值得全人类庆贺，尤其是现在变得更有尊严的穷人。而我认为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每天都感到自豪。这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如果有人把他解读为，等一下，8亿可培养的潜在士兵。中国人不赞同这种说法，只是因为它只会站在中国的立场思考中国，而同样的，美国人也只会考虑美国。我们将习惯于一个强大的中国，一个世界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没人会对此有所反对。所以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千万或一亿，而是十亿多的人口。怎么可能一个国家有超过10亿的人口？这简直颠覆了他们的世界观。因此，如果处于恐惧的状态中的你，很容易把问题夸大。我认为交流的一大难点就是要尽量保持客观。这就是为什么人与人之间和领导者之间的大量交流是非常必要的。

吴心伯：这就引出了一个涉及到你和我，作为一名学者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在这种关系的困难时期更好地教育公众，并告知政策制定者们更准确地解读这种关系。我们能做什么？

Graham T. Allison：这是个很好的问题。我认为有三件事情需要我们去。首先，我认为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试图围绕这个问题找到自己的思路，并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所以我试图用一本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书来证明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你不能否认中国正在崛起，并将继续崛起。这将会对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美国，你不能否认美国已经统治了世界一百年，事实上，主要由美国负责提供的世界秩序已经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中国能够不断地创造奇迹，并让所有的代理人都能够参与进来。正是这些事实所带来的压力造成了现在这样的危险情况。而这同样是事实。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看到了这些事实，而这些事实是否意味着它一定会变成灾难性的？不，我这里有16个案例，其中12个结果不尽人意，但还有四个成功摆脱了这种危机。让我们来看看这四个案例有什么值得我们学习的。首先，必须提供真实的情况。其次，我认为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政策制定者要像对他们的政治议程一样保持对客观世界的敏感。有学问的优点之一，就是你可以有更多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我理解你的政治议程，但是我只是告诉你真相，就像每个政府的情报机构在总统使用完情报之前都负有主要责任一样。他们不喜欢听取意见。告诉执政者客观的事实，这是情报官员工作中应该具备的专业素养，但有时我们做得并没有我们应该做的那样好。然后我认为对公众来说，需要我们提醒他们这些情况是如何助长误解、脸谱化和夸张的。因此，在今天的美国，中国虽然还没有被妖魔化，但它肯定在被妖魔化的路上了。如果你看一下美国人对俄罗斯的评论，我相信一定有人会说俄罗斯已经和美国一条心这种不切实际的话。有人会说你必须同情俄罗斯人。我拒绝，我是一个资深冷战专家，并且认为苏联的失败是咎由自取。有人说俄罗斯是最主要的接近美国民主的国家。他搞错了。我认为美国民主本身就有很深的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就很可能被有心人利用并煽动，引起前文所提到的误解和夸大。最后，其实最主要的是我们自己怎么做，而不是别人。

吴心伯：我想，我们已经谈过中国了。接下来让我们来谈谈美国自身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对中国的强烈情绪和特朗普对经济民族主义的偏好以及贸易保护主义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一些重大变化。在你看来，这是一种暂时现象，还是长期变化的开始？

Graham T. Allison：我希望这种现象只是特朗普本人，或者只是特朗普政府暂时造成的。但我认为这更有可能是一个长期的、根深蒂固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从美国人的种种经历来看，他们都是当第一。因此，当意识到他们可能竞争不过其他政党时，他们心理上很不舒服并且这使得他们没有安全感。这就是事实，和其它因素没有任何关系。这就像当有一家公司崛起时，两家公司之间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样。甚至孩子的家庭也会比父亲的更大。这可能会很复杂。这是我的观点。其次，另一项事实是，

美国的民主就如她表现的那样，并没有真正起到民主效果。现在所有人都认识到，为此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是件好事。这就是为什么普京实际上很招人喜欢的原因。因为你可以说，普京正在使坏。美国人在提出民主之前就要求民主。所以，正如我写的一篇关于华盛顿特区文章，华盛顿是功能失调资本的首字母缩略词。因此，正如他们所说，美国人看到的是，是谁给我们带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无休止的战争，是谁给我们带来了中东和利比亚的战争，是谁给我们带来了金融危机和大衰退。我认为美国政府阶层似乎不懂得如何治理。特朗普就是这么说的。他表达了这种观点，并且许多人对此做出了回应。对于超过总人口半数的人来说，他们的收入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没有真正增长，他们认为他们的生活没有变得更好。这是我们进入第三经济领域的一个大问题。但是美国梦告诉他们，如果你努力工作并遵守规则，你的孩子会比你更富裕。这些人认为有人在否认我的梦想。所以这些都是美国人必须自己解决的问题。如果你在自己的国家你有各种问题，就会有一种诱惑。想想看，也许把自己的问题归咎于别人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不幸的是在美国也是如此。

吴心伯：特朗普在竞选中甚至在入主白宫后都承诺，他将解决所有问题。如今他已经任职将近一年半了。您会如何评价他作为一个总统的表现呢？

Graham T. Allison：我相信我们以前从未见过像特朗普这样的人。我一直在研究历届总统。我们倾向于认为他是其中很不寻常的一位，但事实上没有人真的喜欢他。毫无疑问，他以一种业余的、局外人的身份上台，并基本上违反了所有规则。这就是他一直在做的。我想如果我放弃的话，我将不得不放弃那些不完整但很可能是低分的东西。我会说退出巴黎协议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退出伊朗核协议也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有一项事例我没有很在意。我认为这是特朗普对俄罗斯的本能，事实证明如果我们和俄罗斯有更好的关系，我们会过得更好是正确的。但是这一切都沦陷在“通俄门”的政治和他试图处理这一问题的本能里面，并且完全失灵了。因为这让他看起来好像在干一件激动人心的大事，并因此使得政治局势更加恶化，所以他只会让问题变得更糟。我更看好的是与朝鲜的外交，因为在那里我们将会举行一次峰会，并协商一项重大协议。这项协议原则上是在一段时间内实现核武器化和关系正常化，并就此进行谈判。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认为这对特朗普和金正恩来说将是双赢，同样对中国的习近平主席，尤其还有对韩国的文在寅总统来说也是双赢。

吴心伯：特朗普想召开一次峰会，并且通过连续召开峰会的方式来为自己邀功，甚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是没有问题的。但问题是，PRK（朝鲜）的新立场将持续很长的一段时期。所以，即使这件大交易（协议）达成了，你们仍然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来维持它。因此，人们担心特朗普可能没有合适的团队来实施它，或者

他可能没有这种资源来确保交易能够兑现。那你有什么想法？

Graham T. Allison：我想你是对的。我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认为我们必须把特朗普在这次峰会上可能完成的协议与现实的选择进行比较。2008年初，就在上一次之前，存在有三种可能性。第一种可能性是，金正恩继续试验核武器，并获得用核武器打击美国的可靠能力。这是最有可能的。第二，特朗普要求朝鲜停止第一项中行为。这也是很可能的。第三，（美朝双方达成）一个非常复杂的协议，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才能实施，这可能是一个小奇迹。因此，在选项一、二和三之间，三比二和一好得多。但是三必须非常优秀才能比选项二和一更好。所以现在如果他达成了一个总体框架协议，他将宣布我们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事实并非如此。但是我不应该从字面上理解他的话，像是生活在一个新世界里。这些更像是广告标语，只有各种各样的图像，这些不仅存在于他自己的生活中，如果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将会在我们的余生中陪伴我们。不仅对于美国、中国、韩国，还有对其他各方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什么将逐步成为复杂的问题呢？我认为中国参与进这项即将达成的协议非常重要，并且中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更为重要。因为中国的邻国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也是中国将要面临的一个大问题。对于中国的外交政策来说，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就像特朗普与习近平于2017年4月1日第一次在海湖庄园会晤时，他对习近平说，看看这个烂摊子。谁弄得这么乱？他说，奥巴马、布什和克林顿。他说，你呢？那你之前的那个人呢，你们什么都没做。现在你把这个烂摊子留给我。所以，我同意这一点。

吴心伯：朝鲜长期以来一直被美国妖魔化，但与朝鲜达成重大协议将需要美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和战略进行重大调整。美国准备好朝这个方向前进了吗？或者这只是特朗普一个人的功劳？

Graham T. Allison：这又回到了你关于特朗普的问题。总的来说，美国不会做好准备。美国就像一艘大型航空母舰，只是沿着之前的方向缓慢地移动，很难进行调整。但是特朗普像是一位朝着各个方向驾驶的驾驶员。不幸的是，如果他走这条路，他们也可以走那条路。但我认为，对于特朗普来说，他并没有准备好接受有关美国对朝鲜要求的全部正统观念。因此，如果他能够达成这一项要求令人难以置信的协议，朝鲜面临的威胁将会减少，那哪样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呢？特朗普准备好了。我认为他们做出了改变，包括裁减那里两个以上的美国军队。即使我认为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如果韩国人说你们该回家了，美军也非常乐意回家。你甚至可能想在韩国人想出并考虑他的决定之前就走。我们在限制中创造了群体，他们都很开心。我们同意他们说为了达成和平条约，他们必须听到军队离开的消息。

吴心伯：在这方面，特朗普可能比他的前任更有资格对美国传统政策做出重大改变。

Graham T. Allison：只要美国和中国联系在一起，就会时不时地发生奇怪的事情。因此，也许只有特朗普和他的管理班子能达成协议。

吴心伯：比方说，如果特朗普就他的中国政策征求你的意见？我希望他会这么做。你对他有什么建议？

Graham T. Allison：这是个好问题。因此，我当然要了解他的主要顾问，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我的老朋友。我对他们说，美国的头号问题，我认为同样的事情也是习近平最为困扰的，就是如何从陷阱中逃脱。我认为，如果你像往常管理生意一样来管理国家，你有可能领导一个政府经历一场灾难性战争中，在战争中，你的任期会取得成功，但这场战争将摧毁一切。和中国人很像，美国人关心我们所有的希望，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兴趣。所以当意识到你面临着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时，所以这也预示着反对。不要听天由命。许多案例是成功的，但不仅仅是放之任之，也不仅仅是随波逐流。你必须锻炼想象力、适应能力和调整能力。你不必像以前那样做事。你必须做不同的事情。你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思考，你可以有不同的想法。现在鼓励整个战略团体开始考虑一些这样的事情。我说，我会把这些东西给美国人吗？我想，对习近平来说，他能想到这个主意吗？他说，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新型大国关系。那么为什么称之为新型呢？在华盛顿工作的一个员工可能会说出答案。为什么我们称之为新的？我们称之为新的，因为我们知道所有形式都将遵循这两种文明模式进入战争。你不想战争。中国肯定也不想战争。所以我们需要新的形式。我觉得这很棒。这意味着我们之前说的几个观点我认为它们将是矛盾的，这将是相互尊重的双赢解决方案。我认为这很抽象。细节呢？他说，我们希望其他人能对这些事情有所帮助。如果我问特朗普，你为什么不说我对一种新的政策形式有想法？这里有六件事要做。一、二、三、四、五、六。让我们从这些着手。然后我想中国人可能会说，不，我们也不喜欢这些，我们不喜欢第五个，但是还有另外三个会在这里分类，我们还有三个想法。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积极做的事情。我认为与朝鲜，一个新形式大国的关系应该是危机预防类，而不是管理预防类。那么，我们如何预防将双方拖入我们不想要的战争的危机中。如果美国攻击朝鲜，朝鲜攻击韩国，那么我们就有了第二次朝鲜战争。我们可以让美国人和中国人在韩国互相争斗，就像1950年发生的那样。那会不会很疯狂？答案是肯定的。我们要阻止它。台湾是中美战争的另一个非常好的途径。美国会鼓励台湾独立吗？我认为每一个中国人，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说不，这是中国必须抗争的问题。哪怕和美国发生战争，他们也坚持这是对的。最好把这件事情解决掉。我们必须阻止争斗的发生。那么我们如何防止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应该在这方面努力，我认为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吴心伯：你对中国领导层如何应对特朗普有什么建议？

Graham T. Allison：我想说他们面临着一个困难的挑战。当然，我必须承认他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人。一位美国风险投资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试图重点理解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很随意地看待特朗普而非严肃认真地。这是一个很大的倒退，你应该认真对待他，而不是随便对待他。他像正常人一样思考。当他说出的话并不完全是字面意思时，这些是理解特朗普非常雄心勃勃地让美国重新变得伟大的重要的抓点。那么，中国是否不可能帮助美国再次变得伟大，或是美国的强大只需要削弱中国？在有些人看来，这是对的。因为如果你很强大，我等不及了。这都是真的吗？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想出如何帮助美国变得更伟大的办法。当我们这么说的时，朝鲜的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是否能够证明这一点，仅仅是因为他是分裂的。是的，没错。他能想到解决方案吗？这对双方来说都很容易双赢。在贸易方面，我也会有类似的想法。贸易方面将会有些重大调整。特朗普专注于双边贸易平衡。我认为这对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都不是一个好的目标。但是，如果这是中国非常关切的事情，并且对中国来说解决这个问题并不难，我认为中国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我猜测这方面会出现积极的进展。但是他们还应该寻求其他合作领域。不幸的是，在非常本质且至关重要的气候问题上，特朗普有一套奇怪的观点。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关系。但是我认为，例如，在伊朗的案例中，如果我们要想办法不让伊朗协议破裂，中国——一个离伊朗远得多的政党——也许很大可能会有所帮助。

吴心伯：这是你第一次被邀请参加上海论坛。昨天你发表了关于我们的一篇重要演讲。那么你对上海论坛的印象如何？

Graham T. Allison：我很荣幸能成为论坛其中的一员，对话的深度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也把我吸引进讨论中。我喜欢，尤其是你主持的圆桌会议，你可能需要对其他团体的所有文件发表评论。但是我认为我们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我见到了很多场外人员。我认为大家都玩得很开心，学到了很多。

吴心伯：谢谢你，欢迎回来。非常感谢。

Graham T. Allison：谢谢。

新发展理论和国际外汇

编辑：余慧艳



■ 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

巴西财政部前部长



采访者：Sergio Suchodolski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战略合作关系局局长

Sergio Suchodolski：欢迎来到上海论坛 2018。我是主持人 Sergio Suchodolski，是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战略合作部的总干事。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巴西前财政部长、联邦行政和国家改革部长以及科技部长 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 担任嘉宾。十分荣幸今日有机会与您共谈。

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我也十分高兴能在这里开展交流。谢谢。

Sergio Suchodolski：昨天我们已在论坛开幕式以及圆桌论坛上听取了您发表的两场演讲。您在演讲中强调重视本币贷款。您也是多边开发银行本币贷款的倡导者之一。根据您 20 世纪 80 年代担任财长的经验，拉丁美洲国家一般都会直接处理外债危机，或通过布雷迪债券和其它担保形式加以处理。您能同我们讲述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吗？以及您为何倡导这一调节工具？

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80 年代的这场金融危机十分严重，此后的十余年各国方从中恢复元气。也就是说在这十余年间，巴西的经济发展停滞。而在此前的 20 年，巴西的经济增速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当时能够赶超巴西的国家可能仅有日本。而这场金融危机打断了我们的增长。为什么说是这场金融危机呢？因为我们当时诉诸外资手段。在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大部分国家都在试图调整经济方针。但巴西政府没这么做，也认为在这样的增速下不会有何大问题。我们有模型做预测，所以我们诉诸外资来解决问题。当然结果不尽如人意。当时的争论主要集

中在投资的长线化和基准利率。哪种形式能让内部收益率超过利率？这个还可以，看起来很合理，但这是假的。因为其中包含宏观因素。对于企业来说，这其中只有汇率风险，是讲得通的。但是对于国家来说，情形截然不同。经济发展低迷是关键。汇率会发生何种变化？我们知道如果一个国家决定增加国外储蓄，如果他们不能像世界上除了东亚的绝大多数国家地区那样处理信贷，你应该考虑诉诸本币手段。因为你若要偿付债务，你就要顺应资本流动。而这种情况要求资本流入长期大于资本流出。而汇率也同样地要被高估，也即超额货币供给。这对国家来说并不好，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不再以竞争或者说技术进步推动自身发展。

Sergio Suchodolski：这十分有趣。要知道我们近几年见证了创造性的改变。首屈一指的就是创生，一系列中等收入国家的产生和类似金砖国家这样新兴市场的诞生。这些国家通过过去十年的努力在经济体量上远远超过了我们昨天圆桌上所讨论的一些国家。他们合力推动着国际秩序和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为代表的国际组织发生变革。这是为了让设计顺应他们自身经济体的发展，建设体现自身利益、符合自身需求的国家。他们决定成立新的机构，所以我们也看到了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和亚投行的出现。你如何看待这些机构的产生以及他们的未来发展？您可以结合自身的任职经验从财政、改革、科技三个视角谈谈吗？

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显见的是增长源于投资，而投资有赖融资。企业不会凭空有钱来投资，融资是

必要的环节。而对于这些银行，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际的，首先要做的还是融好资。若某个国家没有如期达到信用水平，可借本币贷款或外币贷款。但在某些情况下，一些国家由于政策没有信贷。如果真是这样，需求产生了，就会流向国家进行的海外直接投资或决定提高的准备金。这就是中国所做的，中国也由此收到了大量国外的直接投资，但这就造成了账户盈余。所有的钱又流出去了。上面提到是经济金融视角。而科技视角则更多关注制造业的生产力。而目前很多跨国公司的业态并不具有竞争力。他们不投资也算情有可原。因为他们面临的汇率也无法赋予他们竞争优势。我将之称为新发展陷阱。巴西经济正身陷其中。我已经预计到中国该怎么做。当然我知道巴西与中国不同，所以我们期待中国的做法，一个超脱信贷规则的东亚国家的做法。

Sergio Suchodolski: 我们恰好谈到新发展陷阱，也结合您昨天发言时谈到的经历，您被第一波发展中经济体大潮深刻影响，并受到他人的启发。您能同我们进一步谈谈新发展理论吗？

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 我就结合这点对之前的问题再作一些回应。与新发展理论相对的是经典发展理论。这个理论的主要论调是国家有赖工业化发展，而国家也须达到中等规模且运行有效才能推动工业化。这与新古典主义学说相悖。到了六七十年代，学说本身也不是什么新的贡献。但变化来了。欧美的自由主义兴起，而像世行这样的国际组织也不受理论的知道约束，不按套路出牌。发展几乎被遗忘。而时新的主流是众人所言的改革将带来增长，增进福祉。不过，这显然是假的。我们明显需要一个新的理论，因为当时的理论构建于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发展背景之下而非发展中国家。

另外的特别之处是在拉丁美洲、非洲、东亚投资都会面临荷兰病，汇率因某一初级商品出口而被高估。所以我们总结出几个原因并由此形成一些想法。我们重点关注的是宏观经济的五大指标，即汇率、利率、工资率、通货膨胀率和利润率。它们是对的，但市场扭曲了它们。所以你还是得调控它们。这个理论并未放弃传统的产业政策，但它更主张宏观经济本身比产业政策更重要。我们考察韩国或者中国就能认识到产业政策是一个重要的选择。在此之前，五项指标一般都是准确的，因为政府发展得很完备并有能力管控各项指标，特别是汇率。这会促进竞争，促使企业投身技术进步。若上述指标是自由浮动的，那将增加外汇储蓄。这对本币有利。

从行政管理学的角度，政府应如何管理此类政策？央行的存在是因为国家意识到他们需要管控利率和通货膨胀率，而工资率直接受到行政方管理的影响。国家真正需要的是管控利率。为此，你需要一个委员会负责此事，在政策和央行职能上做决策，并对之负责。这是一个与央行类似但独立的机构，来制定汇率政策。相关政策的制定有两个关键点。一是要中和荷兰病，可以通过出口税对该初级产品

的国际价格产生影响。第二，你要放弃两种错误的观点。增长并不与储蓄划上等号，增长更不是当前账户的赤字。因为赤字意味着潜在的通货膨胀。第三，你要管控好资本。资本管控虽不是首要的，但也是第三重要的，这是必要的。做到了这三件事，我认为国家就能管控好汇率，并形成良性态势。如此，投资于增长是相辅相成的。在这种情形下也可说增长和汇率是相辅相成的。

Sergio Suchodolski: 您会担心影子市场吗？我的这个问题与我们圆桌论坛的一位参与者的研究有关。他以中国为例研究了影子银行。您会担心自己的论调给外汇蒙上影子银行的色彩吗？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 我并不是主张固定汇率制。汇率仍将是浮动的。我更多主张是施加税收，这将对货币供给产生影响。黑市往往由于固定汇率产生，若失去了这个先决条件，它便没有理由产生。

Sergio Suchodolski: 我相信也有很多来自复旦大学的学生正观看着我们的视频。我们举办的是一场十分国际化的活动。我也知道有很多从世界各地来到复旦求学或者上海工作的国际人士。您有哪些创造性观点想要同他们分享？

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 我觉得他们都可以学习一下新发展理论。我将著述发布在了网上，它们绝大部分是用英语写成的。我非常欢迎学生朋友们来我的个人主页获取我著述的相关原文及信息。

Sergio Suchodolski: 对于这次中国行，您感觉如何？您有什么收获想要带回巴西吗？

Luiz Carlos Bresser- Pereira: 我在中国不会逗留太久。十分感谢主办方的款待。对我来说，复旦大学为中国和参加圆桌论坛的各国代表都呈现了一场圆满成功的大会。我十分高兴，我也将于明日启程。这对我来说是次难忘而愉快的经历。

Sergio Suchodolski: 再次感谢您接受采访！

基础设施在地区发展和地区一体化的作用

高端访谈

记者：钟雪莹



■ Naoyuki Yoshino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院长，
日本庆应大学名誉教授。

[良好的基础设施可以在项目周围形成巨大的溢出效应，促进区域合作和一体化。亚太地区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很大，为了更好地为基础设施融资，世界范围内的多边开发银行应共同努力，同时应通过和私人投资者明确公私部门之间的风险分担并返还部分溢出效应带来的税收来吸引更多私人投资。]

记者：在亚洲开发银行（以下简称亚开行）发布的《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 2017》中提出了六个评估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的指数，比如贸易与投资、基础设施与连通性、人员流动、金融和财政政策等。您认为其中哪个维度对区域合作和一体化最重要？

Naoyuki Yoshino：所有这些都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基础设施。基础设施落后会影响整体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限制了本来利于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相反，良好的基础设施会为项目周围的区域带来巨大的溢出效应。例如，铁路可以促进人员流动，也可使制造商和农民的产品运输更快捷。中小企业可以在该地区发展，进而创造就业机会、促进就业。最后，餐厅和酒店等服务性企业将建成以满足该地区日益增长的需求，资金流、地区税收都会增长。良好的基础设施还可以促进区域连通性，比如铁路特别是跨境铁路，联通的不仅是一个国家，而是在沿线的所有国家，这样可以促进区域合作和一体化。

记者：支持亚太地区的区域合作与一体化是亚开行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简而言之，亚开行采取了哪些行动？

Naoyuki Yoshino：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在加速经济增长、减少贫困和经济差距、提高生产力水平和就业水平以及加强制度建设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推进贸易一体化、跨区域供应链和更强大的金融联系，它能缩小各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各成员国的共同发展。通过促进区域合作和一体化的项目让亚太地区更紧密的聚集在一起

是亚开行创建以来的使命之一。

2006 年，亚开行公布了区域合作与一体化战略的四大支柱。其中最重要的是支持有关跨境基础设施和相关软件的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计划。首先，亚行在硬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比如道路，桥梁和发电厂。其次，软性基础设施的投资，例如教育。第三，我们向相关国家提供技术援助。除此之外，亚行另外三项区域合作与一体化战略还包括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合作与融合、货币金融领域的合作以及区域公共产品的整合与合作。

记者：中国建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和亚开行类似，它也是一个旨在支持亚太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多边发展银行。您如何看待亚开行与亚投行之间的关系，他们会成为竞争对手吗？

Naoyuki Yoshino：他们绝对不是竞争对手。亚洲在电力、运输、电信、水和卫生等方面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长期投资需求对于应对与人口老龄化和气候变化相关的挑战至关重要。东南亚地区每年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约为 400 亿美元，但目前的实际投资只有约 80 亿美元。亚开行无法支撑全部所需的资金，亚投行也是如此。

两家银行有很多机会互相合作，包括和其他多边开发银行包括世界银行和开展合作，特别是在运输和能源等部门。这不是竞争性的领域，两行可以共同努力，以更好地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现在亚投行和亚开行之间现在有四个共同融资项目：孟加拉国的天然气基础设施和效率改进项目、巴基斯坦的高速公路项目、格鲁吉亚的道路项目以及

印度的输电网络项目。例如，在巴基斯坦的国家高速公路 M-4 项目，该项目将建设 64 公里长的高速公路（绍尔果德与哈内瓦尔段）。这条连接南北的公路对巴基斯坦具有极高的战略价值，被预计能带来丰富的新的贸易和商业机会。项目总成本估计为 2.73 亿美元，由两行共同出资。

记者：您在演讲中提到，尽管有多边开发银行和政府的投资，但仍不足以满足亚洲基础设施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私人资金在基础设施融资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

Naoyuki Yoshino：在亚洲的许多发展中国家，高速公路、火车和各种公共交通工具仍然缺乏，很多基础设施项目面临公共资金短缺的问题。为了满足他们巨大的基础设施需求、缩小投资需求与实际政府可支出之间的差距，私人资金必须投入到基础设施中。

利用私人资金发展基础设施还有其他好处，比如如果对成本和效率更敏感的私人投资者加入，他们会努力督促建设方按期完成建设任务、以最小的建设成本完成项目，并在项目完成后以最低的成本经营。近年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正越来越受到强调。

记者：在现实中，吸引私人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并不顺利。在您看来，为什么私人投资者不愿意投资于基础设施？有没有什么措施能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Naoyuki Yoshino：私人资金不愿意投资基础设施主要有两个考虑因素。一方面，他们担心基础设施项目存在风险，包括（1）政治风险：项目完成前地方政府的政权更替可能导致停工；（2）施工风险：由于所有权结构复杂带来的土地获取困难或施工期延长可能产生额外费用；（3）汇率波动风险；（4）建成后可能效益不如预期导致带来的税收增长不如预期；（5）意外支出，例如环境政策变化导致其需要对噪音进行补偿

另一方面，尽管基础设施项目相关的项目风险很高，但预期收益率通常很低。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基础设施投资的溢出效应将增加来自企业、员工工资、销售和财产税的收入。但过去所有这些税收都是由归政府的，并不会作为基础设施的收益归还给投资者。事实上大多数 PPP 项目失败的原因都是因为基础设施的回报率最后只取决于用户收费，例如火车票价和高速公路收费，而这肯定低于总成本。

私人投资者希望避免可能的风险并获得收益。但是，风险和收益的现状和他们的偏好完全相反。为了吸引更多的私人资金，首先，必须事先明确政府部门与私营投资者之间的风险分担。否则，与基础设施相关的风险将使私人投资者不愿将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其次，溢出效应带来的税收增长应该部分返还给基础设施投资者。基础设施投资项目需要长期的投资者。如果通过返还基础设施投资领域产生的溢出税收收入来增加基础设施的回报率，那么基础设施投资可能会有更多的长期私人资本。

当前的公共资金不足以满足亚洲的基础设施需求，因此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率和明确公私部门之间的风险分担来吸引私人投资者进入基础设施非常重要。

记者：如果由公共基金投资，基础设施更像是一种公共物品，可以为所有人提供费用合理或免费的服务。但是当私人资金被引入时，这个特征会被改变吗？您如何看待公私资金的理想占比？

Naoyuki Yoshino：我所说的外溢效应的并不意味着向用户收的价格应该增加。相反，政府应该监管水电等重要基础设施价格，因为它们是使用费。用户使用的费用可能很低，但溢出效应带来的税收增加可以弥补这一点。例如，水电供应良好会使得整个区域发展加快，新的企业和部门会进入，经济增长速度会加快，生产力水平和就业率会提高，这将带来税收增加。私人投资的收益并不是来自于用户使用价格的提高，而是来自外溢效应带来的税收增加。

就公共和私人资金的比例而言，不同的部门会有所不同，并且随着时间的不同也会改变。当某一领域的预期利润不高或风险较大、私人投资者不愿意投资时，政府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例如，政府可以先投资 60%，私人投资方则可以提供 40%。但是，如果利润变得越来越好，更多的私人投资者愿意投入他们的资金，那么这个比例可能会改变。相反，对于那些人口稠密和发达的地区，很多公司有兴趣投资，那么私人比例可以达到 80%，政府比例可以达到 20%。所以没有确切的数字，都要取决于未来的期望。

记者：您的演讲主题是关于基础设施投资对连接东西方地区发展的作用。您能否再具体一点地说明基础设施投资如何促进东西方合作？

Naoyuki Yoshino：东西方的开发银行可以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进行合作。例如，欧洲复兴开发银行（EBRD）和

亚投行正在中亚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合作。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对基础设施资金的需求是巨大的,世界银行、亚开行、亚投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或者说任何多边开发银行、政府都无法单独承担,所以开展东西方合作是有巨大意义的。此外,东西方之间可以分享有关基础设施的经验。欧洲拥有良好的铁路系统,中国也致力于发展亚洲的高铁。对于中国来说,如果欧洲体系有一些优势,那就可以借鉴。同时,如果中国的技术和技术更好,欧洲也可以从中有所学习。

记者: 中日韩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现在已经相对较好。对于他们来说,基础设施是否还是它们合作和一体化的重要因素?

Naoyuki Yoshino: 当然,这三个国家还是有机会在三国或者其他亚洲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合作。但我认为东亚一体化最重要的是文化交流。过去,中国,日本和韩国分别把目光看向了不同的方向。即使我们都想与欧盟合作,情况是日本在与欧盟谈判,中国在与欧盟谈判,韩国在与欧盟谈判。欧盟始终是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对于东亚国家来说,我们应该像欧盟一样实现更大程度的合作与一体化,这样我们才会变得更强大。

我认为促进中日韩合作的一个重要途径是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比如高中生的交换项目,这样青年一代才能理解我们共同的文化。而且这个交流应该是持续的,交换结束后学生们还可以通过 Skype 或微信继续沟通,这将带来更好的思想交流。

记者: 2019 年将是中日韩合作启动 20 周年。在经贸方面,三边自由贸易协定(FTA)自 2012 年开始谈判,但进展仍然有限。您如何看待东亚经济合作的困难?

Naoyuki Yoshino: 自由贸易是对大家都有利的,但前提是人员流通自由、资金流动自由,一切经济活动之间都能流通自由,而事实并非如此。其次,各部门的发展速度各不相同。在金融领域,从一个产品转换到另一个产品很容易,并且可以进行快速调整。但在农业方面,农民不能立即改变产品,可能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开始自由贸易,所有的农民都会抱怨。

这两个维度解释了为什么理论说自由贸易是好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或者说需要时间。有赢家和输家,我们必须关注输家。如何弥补利益受损的一方对 FTA 来说非常重要。

记者: 如同分论坛主题阐释中所说,美国的战略收缩和保护主义经济政策的复兴给全球化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您是否觉得欧盟和东亚国家可能在全球治理形成一股合力?

Naoyuki Yoshino: 是的。美国过去是自由贸易的操纵者,但现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自由贸易是好的,但有输家。现在在美国,利益受损者占了很大一部分,所以特朗普已经改变了态度。但总的来说,自由贸易和自由贸易流动可以创造更好的局面,所以没有美国,东亚和欧盟国家应该继续努力。唯一我们必须记住的是,输家必须得到补偿。例如,如果几十年种水稻的农民发现米价突然下跌,他们会不满。所以市场的调整必须是渐进的,我们必须证明即使是输家,未来也有更好的机会,这非常重要。

埃塞俄比亚与中国超越经济合作的关系

高端访谈

记者：汤以诺



■ Berhane Gebre-Christos

中国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埃塞俄比亚国家馆驻中国特命全权大使。2010 至 2012 年间，他担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他也是 1979 至 1988 年间的格雷人民解放阵线外交发言人。

「埃塞俄比亚对基础设施的关注为中国建筑企业创造了许多机会。埃塞俄比亚也是中国出口的一个重要市场，随着埃塞俄比亚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出口将继续扩大。对埃塞俄比亚来说，中国金融为政府的合法性提供了重要支持，因为电力、运输和就业机会不断扩大，刺激了经济增长，有助于促进向其他国家的出口。与西方援助者相比，中国的“商业即商业”的做法受到欢迎，他们常常将自己的贡献与埃塞俄比亚法律和政治结构的变化联系起来。」

记者：对您来说，埃塞俄比亚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特殊之处？

Berhane Gebre-Christos：关于中国和非洲关系的问题很有趣。来自不同地方的人们对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记者：作为新任命的驻中国大使，您目前关注的重点是什么，以及您主要致力于哪些方面，来加强贵国与中国的战略关系？

Berhane Gebre-Christos：首先，我想强调的是“全面的关系”。在这一方面，即使有非常强烈的关系，我还是想强调对不同政府的理解。其次，更重要的是，我正试图在中国和非洲之间制造更多的经济利益，解释与那些在非洲和中国建立海外公司的关系，并告诉他们好处：所有有业务往来的公司都会得到良好的发展。第三，我也十分注重教育行业。

记者：您在关注金融和经济发展的同时，是否还关注教育？

Berhane Gebre-Christos：没错。我们一直在进行文化关系，组织并解释中国文化，并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国公众将对我们更加了解，并且我已经在多个领域尝试过了。

记者：从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来看，这其中有什么特殊之处吗？这为什么对彼此如此重要？

Berhane Gebre-Christos：这种关系真的很牢固。首先，中国的发展是封闭的，经济增长约为 10%。其次，通过合作，中国设计了可以帮助我们多次与工业进行合作的结构。战略关系在社会、经济、教育、和平与安全等方面都非常强大。这就是全面的合作。

记者：如今，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进一步推进两国双边合作的领域有哪些进步和成就，同时推进先进合作的过程中存在哪些障碍？

Berhane Gebre-Christos：首先，中国和埃塞俄比亚之间有很好的了解。其次，二者关系密切，合作将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我们已经定义形成战略关系，是一种全面的伙伴关系。这是一种可以进化和发展到更高的水平的强大关系。因为相互尊重，互相帮助，所以这真的是一种很好的关系。

记者：你认为中国私营部门在推动埃塞俄比亚地方工业化进程中，所起到什么作用，以及政府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帮助他们面对这些困难？

Berhane Gebre-Christos：中国企业在这里很受欢迎。人们都欢迎中国公司和旅游者参观。其次，埃塞俄比亚的

投资在不断增加。从过去几年来看，投资值从 22 亿美元增加到 44 亿美元，其中的 90% 来自制造业。这意味着埃塞俄比亚的情况确实适合投资。我相信政府也会支持我们，再加上一刻不停的改革，最终将会解决所有的困难。

记者：面对非洲发展诉求的呼声，中国改变我们对埃塞俄比亚与中国合作的看法的潜力是什么？

Berhane Gebre-Christos：现在有很多政治活动正在持续发生。在文化方面，中国通过社交媒体向埃塞俄比亚展示了文化，埃塞俄比亚也是如此。更好的理解为是一种政治的文化交流。

经济上，我们一直在共同努力创造更高的投资数额。埃塞俄比亚的航线已经建在了中国的 5 个城市中，中国也建立了到埃塞俄比亚的航线。因此，它们之间存在着大量的经济互动，我们之间的经济联系将会持续增长。在和平与安全方面，我们有和平卫士，并互相支持。这种关系是综合的，是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

记者：为了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请您与我们分享一下非洲其他国家是如何借鉴中国埃塞俄比亚模式的。

Berhane Gebre-Christos：关系是建立在相互尊重和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的。这是其一。第二点，埃塞俄比亚直接受益于合作。为经济提供了光明和道路。所以这是双赢的。

记者：您愿意根据非洲国家的实践来说明您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吗？

Berhane Gebre-Christos：我们已经点明了埃塞俄比亚需要如何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把经济、文化转化为工业。我们必须建立基础设施。我们有数百万学生和 50 多所私立大学，还有 100 多所公立大学。所以我们应该独立设计所有这些。

记者：你认为埃塞俄比亚在非洲联盟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Berhane Gebre-Christos：埃塞俄比亚在非洲联盟里是活跃的，非洲联盟总部在埃塞俄比亚，我们负责主办非洲联盟。埃塞俄比亚是一个尊贵的成员，不管非洲联盟是如何决定的，因此非洲联盟的决定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埃塞俄比亚在这个大陆上的安全和维和问题上非常活跃。埃塞俄比亚在非洲维和方面位列第一。对于非洲联盟，甚至是在世界上，埃塞俄比亚为联合国和非洲联盟贡献的维和人员是最多的，所以埃塞俄比亚正在为非洲的和平与安全披荆斩棘，履行其责任。埃塞俄比亚一直尽可能地贡献非洲大陆，并试图在全球问题上获得共同的声音和共同的理解。这样一来，非洲就有了相同的声音和立场。

记者：你认为埃塞俄比亚能做些什么，让更多的非洲人民熟知中国是他们的朋友并且总是愿意提供帮助？

Berhane Gebre-Christos：这种帮助并没有增加，中国和非洲的产业并不是新建立的。中非关系在上世纪 50 年代，非洲人民争取独立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中国作为非洲人民的朋友支持其独立。中国只需要维护这种关系即可。

记者：您对促进南南合作有何建议？

Berhane Gebre-Christos：可以说，论坛，中国与非洲之间的论坛一直是南南合作的关键。这些方案在非洲和中国的合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十计划行动必须在即将到来的论坛中得到升级。我认为，维系中非关系的主要工具是中国南南合作。

记者：请用三个词来描述有效的国际发展合作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的特征。

Berhane Gebre-Christos：我认为他们应该关注克服问题、缺点和非国家的发展。首先，他们必须关注数百万的结构体系。其次，他们必须注意生产能力。第三，他们必须关注神经农业。所以我会说基础设施、工业化和农业。我认为这就是三个关键的特征。

记者：请您谈谈我们对“中非关系走向共同繁荣”这一主题的认识。

Berhane Gebre-Christos：当他们不得不使世界繁荣，人们就会开始反对生活，于此同时，人们理应得到他们所拥有的，和离他们而去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掌握地球。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政府的社会世界有这个国际水平，气候变化，可持续 SDG，可持续发展。我认为中国和埃塞俄比亚、中国和非洲之间的合作就像是对这一点的不信任。我认为所有国家都应该为实现这个国际问题做出贡献。我认为这会让我们感受到世界的贫困，一个正在被遗弃的世界，但这个世界将为我们的子孙后代造福。因此，世界各国之间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埃塞俄比亚在为可持续发展目标争取 SDG 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Berhane Gebre-Christos：我们在埃塞俄比亚的问题是建立一个政策独立的国家，一个人民过着体面生活的国家，那就是可持续发展盛行的地方。所以所有的程序都被使用了，但是完成了所有的程序，所有的策略，所有的政策，并实施了我们五年前设定的世界。因此，开发这些项目、战略、所有的计划和政策，完全可以满足 SDG 计划的需要。因此，我们已经有效地实施了可持续发展计划。

稳定始于国内：欧盟与中国的未来选择

高端访谈

记者：向晨



■ Rainer Klump

雷纳·克拉姆教授现任法兰克福歌德大学应用经济学与国际经济政策系经济学、经济发展与一体化专业教授，欧洲一体化与国际经济学威廉·莫顿中心（Wilhelm Merton-Center for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联合主任。克拉姆博士也是卢森堡大学的前任校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无疑是国际货币关系领域的一个重要机构。但是，中国在IMF中的作用可能会有所增强。同时，尽管欧元在该机构中的份额下降，但欧洲仍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我认为，支持中国提出的提高其在IMF中的份额的要求甚至也是欧洲的利益所在。意大利的债务问题自然是一个国家内部问题，但这些问题需要加以解决，而欧元区并非成员国能够随心所欲的地方。德国深知自己从欧盟获得了巨大利润，因此也愿意付出一定代价，即使这种代价超出了所得。在中美贸易战方面，欧盟应当尽量避免沦为这场战争的牺牲品。欧洲有其自身的利益，这种利益应当与中国或美国的利益保持一致，但不应以此威胁任何一方，尤其是美国。人民币国际化符合形势的发展，如果世界各国希望实现货币多元化，欧洲和中国应当为此做好准备。」

记者：分论坛主题为“亚洲与欧洲的协同：建立适应而包容的全球经济体系”，那么亚洲和欧洲应当共同重视哪些贸易和金融措施或机构呢？

Rainer Klump：我会从两个角度考虑这一问题：现有机构和新的机构。首先，中国和欧洲应当进行合作，而且甚至有可能在现有的机构中进行合作，但这些现有的机构可能需要进行改革。因此，比如，我们在会上讨论得出，IMF自然是国际货币关系领域的一个重要机构。但是，中国在IMF中的作用可能会有所增强。同时，尽管欧元在该机构中的份额下降，但欧洲仍应在其中发挥积极作用。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欧洲能够得利于与中国在IMF和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合作安排——这是机构内的合作。

对于新的机构，我认为已经存在若干可供利用的对话和论坛机构，不需要再另行建立新的机构。因此，我的建

议是，更好、更合理地利用现有机构。

记者：我们该如何更切实地推动IMF改革，并取得更多方面的认可呢？

Rainer Klump：IMF内部合作可能比较实际。份额改革可能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我认为，支持中国提出的提高其在IMF中的份额的要求甚至也是欧洲的利益所在，从而在当前形势下调整该机构的规则。

记者：回到欧洲这一话题。意大利新上任的民粹主义政府可能确实会导致欧元的崩溃。有人认为，2015年希腊的欧元危机并未真正消除，而是稍事休息，这也是当前意大利所面临的局面。欧盟有哪些政策和机构可以应对上述挑战？

Rainer Klump: 意大利问题较为紧迫。我只希望欧元区的每一个成员国能够遵守欧元区规则。我们必须想办法让成员国们遵守规则。希腊说到底只是一个小国,但意大利不同,它是欧元区的主要参与者,如果意大利不能遵守规则,那么我们所面临的局面将会十分艰难。我认为,我们最终还是需要解决这一问题。但问题是意大利会否放弃欧元区。我认为,经过谈判,意大利将会了解到,失去其他成员国的支持意味着什么。这无疑是一个内部问题,但这个问题需要予以解决,而欧元区并非成员国能够随心所欲的地方。因此,必须遵守规则。

记者: 欧盟是否为欧元区制定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规则? 这些规则真的有效吗?

Rainer Klump: 当然。欧盟已经制定了规则。但问题是如何推行这些规则。我认为,随着规则的强制实施,意大利和其他国家最终将会获得来自欧盟的资金流。这是对 2021 年起实施的新金融框架的新一轮探讨,当然,成员国们必须找到遵守规则和参与该金融框架下的资金流动之间的联系。

记者: 您如何看待德国在欧盟经济一体化中的作用? 在欧盟的金融结构以及处理金融危机的方式方面,您是否赞同这体现了欧洲的德国,而非德国的欧洲?

Rainer Klump: 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以何种方式? 德国是欧洲面积最大的国家,也是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因此,德国的影响力显而易见。但如果你对欧洲中央银行(EBC)的政策稍有了解,你就不能再说这项政策实际上是由德国推动的了。德国人对 EBC 政策也是诸多不满。但他们仍然在当前的体系中遵守规则。我想,这就是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必须做出的妥协。在我看来,德国深知自己从欧盟获得了巨大利润,因此也愿意付出一定代价,即使这种代价超出了所得。因此,我认为,这体现了对未来欧盟改革的认识;此外,德国需要为英国脱欧付出更大代价。当然,欧洲的非议众多,但德国归根结底是亲欧的,也愿意为此买单。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我希望我们是欧洲的德国。德国是欧盟机构的主要支持者。

明年的欧洲选举也许会至关重要的考验。问题可能在于,法国总统马克龙(Macron)曾说自己是欧洲运动倾向者,相比之下,现如今的德国并不存在这种亲欧党。因此,我仍想知道,马克龙会否来德国,也许他能够在大选中得票。亲欧党得票,将会十分有趣。

记者: 面对美国对全球贸易的挑战,特别是“中美”贸易战,欧盟应该如何定位自己?

Rainer Klump: 欧盟应当尽量避免卷入这一对峙局面。欧洲有其自身的利益,这种利益应当与中国或美国的利益保持一致,但不应以此威胁任何一方,尤其是美国。

记者: 四年前,您曾到访北京并发表了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演讲。您曾提到欧洲将会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一个理想选择。四年过去了,这一进程中有哪些与欧洲有关的新措施,您对这些措施有何预期? 未来还会采取哪些措施?

Rainer Klump: 很好的问题。因为,事实上,这四年来并没有发生许多事情。我也很是诧异。我曾以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会走得远得多,可却看到了美元国际化这股新的力量,不过在我看来,这种力量不会继续壮大,因为特朗普政府充满了不可预见性。美国虽强大,但越来越多的国家会设法推动其外汇储备的多元化。这也是欧元和人民币的发展趋势。

我还注意到,中国并不愿意如此迅速地实现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可能担心会失去对货币的控制权。但我认为,如果全球市场力量希望进一步多元化,中国不应对人民币多元化怀有敌意。我想,如果世界各国希望实现货币多元化,希望使用欧元、人民币,那么这就是趋势。而欧洲和中国应当为此做好准备。

因此,我预计,我们将会,而且应该,对此采取更多行动。从历史观点上说,这也完全符合我们目前所掌握的知识,即货币组合始终发挥着国际性的角色。因此,美元主导是一种独特的历史现象。

记者: 在以人民币计价的投资基金、贷款和存款方面,卢森堡已成为主要的欧洲金融中心。您如何评价卢森堡作为欧洲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作用? 它有何比较优势?

Rainer Klump: 嗯,这是因为贸易关系和正在进行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也许还因为若干非常发达的金融地区和国家。对于卢森堡,我知道中国各大银行都在卢森堡设立了分行,政府对此也非常支持。

但我也注意到,匈牙利在这方面也表现积极,也许是因为匈牙利也与“一带一路”倡议(尤其是欧洲段)息息相关。这是顺理成章的。

变动中的国际贸易格局与中国完善全球贸易治理的尝试

高端访谈

记者：黄昕蒙



■ 张海冰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近二三十年来，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贸易格局也在发生着调整。面对变动中的国际贸易格局，传统的贸易体制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成员国之间也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并以中国的方式探索着如何完善全球贸易治理。」

记者：近年来，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反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多，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力量并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您认为中国为什么坚持“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张海冰：回顾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有一个非常鲜明的历史对比。改革开放到今年已经四十周年了，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证明了改革开放对中国的发展是有利的。从国家领导人和学者的判断和分析来看，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在国际贸易的带动下，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贸易有很大的“溢出”效应，最开始，我们是做来料加工，慢慢地，我们在“干中学”，逐步完善自己的产业体系，技术能力、管理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总之，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是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的受益者，这坚定了我们推进开放的态度。

同时，中国支持开放型世界经济，也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流。技术进步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加快了全球化推进的速度。贸易、劳动力、信息、服务等要素流动壁垒越来越低，要素的流动速度不断加快。区域性的贸易谈判协定不仅应对了全球化发展带来的新问题，也印证了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不可逆转。区域协定、贸易规则越来越向边境内渗透，这也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一个明显动向。其实，我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法也是基于经济全球化和地球村的基本考虑，也是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

记者：圆桌会议上，有学者指出，目前我国已是一个贸易大国，但还不是贸易强国。您认为这种角色会如何影响中国的国际贸易参与？

张海冰：贸易大国和贸易强国之间差别很多，不仅是

一个贸易量的概念，更涉及到参与世界贸易的商品和服务种类、技术含量以及交易货币和标准等，是一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和在全球贸易中综合影响力的集合。目前中国无疑是贸易大国，但是离贸易强国还有一定差距。但是，我们需要客观来看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总体上，我国和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存在着技术上的差距，但是我们在一些核心领域内也有优势，比如高铁等。我们需要分产品、分领域来看中国的贸易实力。也许有人会问，中国会不会由于在产业链里相对优势有限而赚的很少，但这个问题取决于你怎么看。我们最近去美国调研，美国人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看法。他们做了一些调研，以苹果手机为例，虽然中国赚的利润较少，但大多数归工人所有，美国赚的利润很多，但大部分都给了资本家。这里有一个社会分配的问题，中国虽然获得的绝对利润比美国少，但从分配角度看，中国社会比美国社会更有获得感，这延伸出来，就是一个社会包容度的问题。因此，贸易强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记者：那么，您如何看待特朗普发起的中美贸易战？

张海冰：特朗普是靠民粹力量、民间支持上台的，他十分敏锐地嗅到了美国的社会撕裂和全球化的冲击，所以他强调提供就业、关注失业者和底层人民。怎么解决呢，其中之一就是打贸易战，一方面是为了提供就业，另一方面是要塑造一个共同的敌人。为了促进内部团结、社会融合，一个很有效的手段就是寻找一个共同的敌人。自2010年以来，中国基本上成为了美国贸易赤字来源最大的国家，根据美国的统计，目前中美贸易赤字达到3750亿美元左右，根据我国统计是2700多亿。除此之外，美国朝野两党对中美关系的定位也达成了空前的共识，那就是战略竞争关系。以前，美国精英和建制派认为可以通过市场化和全球化等手段改变中国，但是伴随中国国力上升以及十九大报告中的相关

表述让他们改变了看法，建制派也开始把中国当作战略竞争者。再看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已经把中国排在了第一大威胁。当然，这种定位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我们很难改变。即使一个国家没有衰落，另一个国家的崛起也会使其显得相对衰落。国际权力结构的变更必然会带来动荡与冲击，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只是一种表象，根本上还是由于对中国“战略竞争”角色的界定。

记者：美国现在强调“贸易保护”，反对中国贸易，这会不会违背美国建立起来的自由贸易体系？

张海冰：大国从来都是什么对自己有利就坚持什么的。美国依然说它坚持自由贸易，但它说自由贸易要建立在平等和公平上，什么样的自由贸易、什么叫平等和公平，大家就要来谈谈。而且，美国已经不把中国当作发展中国家来看待了，以前的最惠国待遇、非歧视原则，是说你给别人怎么样也就对我怎么样，但是现在的对等贸易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给你的条件你也要给我，你不给我的话我也不给你，完全就是要求在同一个水平上。而且话说回来，所有的大国对于自由贸易的遵从，包括对于 WTO 的态度，都是因时、因事而变的。美国没有说不支持自由贸易了，特朗普贸易政策有“五大支柱”，第五条就是“加强多边贸易体制”“支持 WTO”，但是，他的第一条是捍卫美国国家安全。贸易问题政治化或者安全化，就很难用一个理性的规则或体系去衡量或者判断了。去年 G20 汉堡峰会上，美国也强调了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全球经济治理，但是这个规则是什么样的规则，就要由大国来博弈了，说到底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就是要美国说了算，是典型的霸权主义。

记者：您在发言中也提到了当今全球贸易治理体系的问题，包括 WTO 缺乏效率等，您能否详细谈谈造成这些困境的原因？

张海冰：二战以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组织中，WTO 是最公平的，另外的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是按照出资比例决定投票权，谁出资多谁话语权大，美国有一票否决权。但是 WTO 是一国一票、协商一致、投票表决的，WTO 的谈判需要一个个谈下来，跟大国谈，贸易量大，可能难度大，小国相对来说比较容易。WTO 最有争议的是它的“绿屋会议”，主要的贸易成员方先把规则谈了，谈完了再跟小国说，这样虽然更有助于推进进程，但是也遭到了很多的批评，几个大国就把事情说了，其他国家没有融入感。所以这是 WTO 面临的困难，要达到效率就没有公平，要公平就很难实现效率。

WTO 谈判的另一个难处就是各国互不让步，发展中国家内部也有很大的分歧。多哈回合谈了这么多年了，但是没有什么进展。这里有一个悖论，发达国家给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的发展援助，帮助它们发展农产品等初级产品，让它们出口农产品，实现产业升级，不要过度依赖

资源。但是发达国家国内的农产品保护措施又特别多，实际上让非洲这些国家根本无法进入它们的市场。也就是说，援助政策和贸易政策是对冲的，并不一致，所以我们要强调政策协调和一致性。此外，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也不统一，农业大国更看重农产品问题，非农业大国就不尽然了；而对于农业大国，重点也不一样，所以协调的难度是很大的。总之，WTO 只是提供了一个公共规则，就像“交通规则”一样，如果大家都遵守，那么贸易更便利一点，不遵守，就会发生“交通堵塞”。

记者：您在发言中重点讲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您认为与现有的机制相比，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国际进口博览会等，能为促进各国达成共识、完善全球贸易治理做出什么贡献？有何进步之处？

张海冰：中国是一个“do country”，是先做再说、边做边学、边做边看的实干国家，这是今年我们去尼泊尔调研时尼泊尔人给我们的评价。我们提出的“一带一路”在加强规则协调、战略对接，但是并没有把建立强加式的统一规则作为目标。我们在合作中以适应当地标准、标准对接为主，尊重其他国家的情况。当然我们也希望在合作当中，别人能更加认可中国的标准和技术，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和西方国家巨大的区别。他们的援助项目、经济合作项目都要做大量的前期准备和可行性调查，很多时间和经费都花在专家的前期调研和谈判中了，当然这么做也有好处，他们把所有的风险都考虑周全，而我们更多的是边建项目、边应对风险、边解决问题。这种方式，速度快、成本低，因为项目周期大大缩短，但是风险管控方面可能会遗留问题。中国在贸易政策的制定上，一直坚持平等、多边、灵活、协调，不会很激进地推进高标准的贸易协定。

我们建立国际进口博览会，把它放在去年一带一路峰会中宣布，也是有考虑的。别人说我们一带一路输出过剩产能，但其实我们不是，我们还是很注重向国外开放市场的。国际进口博览会以“开放”为目的，我们希望维护开放型的世界经济，展现中国开放形象。搭建这个平台就是主动对接国内国际市场，这也是中国对国际评价的一种回应，展现一种领导力和政治意愿。习总书记也说，欢迎大家搭中国便车，国际进口博览会就是一个很直接的例子。共建“一带一路”、投资走出去、建立进口博览会、把商品买进来，都是很“实”的中国方案、中国贡献，是中国提供的实实在在的好处。往更深一步讲，我们通过这些平台、通过这些很实在的方案，促进大家的沟通，也能起到一些协调作用。当然了，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还不好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刚满 5 年，下结论还太早，进口博览会也还没召开，让我们拭目以待。

坚持互利互惠，切合实际需求，扩展多边合作

高端访谈

记者：张贝璘



■ 李明江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 (RSIS) 副教授、中国项目主任

「中国从大国竞争这个角度来说需要更包容、更敞开心胸去鼓励、欢迎其他大国一起做“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各个项目，让其他国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完全中国主导、不是由中国一家做的事情、更不是中国的战略工具。」

记者：您之前在子论坛发言的时候也谈到地方政府在一带一路重要性，请问地方政府具体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请问地方政府的作用力？

李明江：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地方政府过去十几二十年和周边国家的交往，尤其是中国边疆地区，如新疆、云南、广西、黑龙江、内蒙古等等。其中，体现得更明显的是云南和广西。他们在过去十几二十年一直在推动跟周边国家的交通、基础设施、人员来往、投资贸易、非传统安全等方面的合作，不仅做了大量的事情，也提出了很多倡议。因此，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得益于这些沿边省区这些年所做的努力。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到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它的具体实施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沿边的省区去推动、落实。而且，“一带一路”倡议从中国中央政府的角度来说是一个框架，而这个框架要有实质性的东西也需要地方政府提出并落实具体项目。因此，地方政府另一个重要角色在于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具体项目。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中国二十多个省级地方政府都拿出自己的“一带一路”方案，而且也提出很多项目、拿出很多资源。从这个角度来说，地方政府是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一股很重要的力量。

记者：在您发言结束时，您也提到地方政府有助于缓解诸如主权问题的挑战与疑虑。请问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个观点吗？

李明江：中国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互利共赢的经济合作方案。然而，很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个大战略。他们认为中国除了经济之外，还有其他方面的利益诉求，如地缘政治、安全、政治等，所以对中国有些警惕。此外，这些国家也会担心“一带一路”倡议是否会使他们对中国形成经济、金融或债务上的依赖，

而中国是否会利用这种依赖对其他国家实施压力，要求他们在争端问题上对中国做出让步。因此，如果从中国中央政府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这些国家或多或少都会有些防范。

但如果这些具体项目是由地方政府提出，其他国家这方面的顾虑可能会少一些。因为地方政府基本上就谈合作、谈经济，所以会淡化“一带一路”倡议的地缘政治色彩。这虽然不能完全消除这些国家的担忧，但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这样的顾虑。

记者：您刚刚提到“一带一路”倡议应该是互利互惠的，请问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时应该如何保持更大的互惠性？

李明江：只要是合作，就必须照顾到对方的利益诉求。中国在这方面也确实比较注意，确保不是所有利益都由中国一家独揽。但从其他国家的角度来说，很多国家认为中国在这种合作中获得更多。当然，每个国家的都希望自己国家获得更多，这就存在公平性问题。

因此，首先要平衡利益分配。中国作为大国，是一个更大的经济体，也更有能力照顾别的国家。因此在项目设计、资源投入、利益分配等方面，中国或许可为其他国家考虑一点。比如中国在“一带一路”的一些基建项目中，中国的贷款利率，和日本主导的亚开行或是世界银行的优惠贷款相比，还是偏高。另外，涉及到中国的投资和基建项目时，中国公司承包的工程项目方面，中国企业过去总是喜欢从国内带员工、技术人员、劳工去。但对方国家希望中国的投资可为他们带来就业机会、技术转让、人力资源培训和某产业整体发展等更长远的利益。

总的来说，中国可对周边国家做出很大贡献。中国周边国家大部分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技术水平都比较落后。除了投资之外，中国现在有很多资金和产能需要走去，对周边国家都能产生各种很实在的好处和利益。技术方面，中国有些方面确实能和其他国家分享。这可通过

培训、技术转让、合资等方式实现。另外还有教育、扶贫、改善电力、生活用水、工程、制造、交通管理等方面，中国实际上已经非常成熟，可以帮助周边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在这些方面都可以做很多事情。

记者：如何确保这些项目切合实际情况，实现效益最大化？

李明江：这就需要中国各个层面的参与方和当地的政府机构、社区和社会团体多商量，多听取当地的诉求。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周边很多国家的社会政治体制不是很透明，法治不是很健全。如何使当地民众社区从中国的项目中得到实惠这方面，中国可能也需要借鉴很多国际惯例。过去，中国都只是和对方国家的政府大交道，相对来说比较少关注与民间组织、社会和民众的直接交流。现在，中国也许需要借助一些国际经验，直接深入到社区、深入到民间去，这有助于缓解对方国家法制不健全所引发的各种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现在基本上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产业合作，如果要使对方国家、企业、社会和民众利益最大化，那我们有几个问题需要谈。第一，从一开始就要把项目调研做好，把当地的实际需要、需求搞得清清楚楚。第二是规模，超前投资和过度投资会导致很多资源的浪费，所以要恰到好处，要注意到短期、中期和长期的需要。第三是要杜绝腐败，因为腐败会减少经济利益。第四是要平衡对方整个国家的利益和当地政府的具体利益。第五是如何让民众获得更多实际利益，包括就业、劳工标准、环保等。第六是要遵循市场规则。现在很多项目都是政府主导的，政府主导本身也是必要的，但是投资行为还是需要很大程度上遵从市场经济，按照市场规则办事。因为人为设计很多时候会出现偏差、失误，只有市场知道怎样才能达成效益最大化，因此由市场来决定会比较好。

记者：您去年在2017年1月“环球中国、环球效应”的论坛中提出观点，认为中国如果希望“一带一路”倡议带来更大的效益，必须以更开放的姿态容纳其他大国扮演积极角色，开拓多边合作。请问您为什么这样认为？请问您认为这应该如何具体落实？

李明江：第一，中国和其他大国的合作会使“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项目都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中国在基础设施等方面确实有很强的实力，其他大国可能都比不上中国，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但另一方面，中国并不是什么都可以大包大揽，不是什么东都有绝对优势。尤其是发达的大国，其他国家也有很多其他的优势，比如说技术方面、项目管理、发展援助管理等方面的经验。这些也是中国欠缺的。因此，客观来讲，中国和其他大国还是要合作才会使得“一带一路”倡议那么大范围内的项目都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第二，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一个大国提出一个宏大

的设想，其他大国总会担忧这是否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工具，帮助这个大国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因此其他大国可能会阻挠、不赞成或者是反对，甚至破坏、削弱“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这会增加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的成本。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印尼雅加达一万隆高铁项目。中国和日本出于地缘政治、战略方面的考虑，因此在这个高铁项目上进行竞争，增加了中国参加“一带一路”倡议的成本。

因此，中国从大国竞争这个角度来说需要更包容、更敞开胸怀去鼓励、欢迎其他大国一起做“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各个项目，让其他国家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完全中国主导、不是由中国一家做的事情、更不是中国的战略工具。过去几年，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少。中国没那么有兴趣鼓励其他大国来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希望自己能够占据主导权。那么现在其实大国之间在地缘政治上的较量已经很明显了。因此有很多“一带一路”上可以做、需要做的事情都做不起来，地区层面的多边机构也都无法利用起来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从这个角度来说，“一带一路”倡议会受到一定的阻力，而且这种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其他大国。所以，确实需要中国和其他大国有更好的协调，也要有其他大国更好的参与，使“一带一路”倡议施行得更好一些。

第三，从资金需求来说，尽管中国有很多资金，但由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资金需求庞大，中国仍无法独立解决。那么其他国家，尤其是大的经济体的参与会对资金问题的解决起到很大的作用。

具体实现方面，中国最近几年实际上已经下了很多功夫。中国希望争取美国的支持、美国的参与，对日本也做了一些工作。现在日本态度有一点点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愿意参与。日本官方没那么热情，比较倾向于鼓励日本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印度还是比较明确反对，欧盟负面态度越来越明显。俄罗斯表面上支持，但实际上在防范中国，比如说在中亚、西亚、东中欧，俄罗斯都有比较大的防范心态。因此，“一带一路”倡议要获得大国的支持还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一方面，中国可以继续对这些国家进行游说、进行解释，但另一方面也可以把“一带一路”倡议放到更高层次的国际多边场合，比如G20。中国或许可以把“一带一路”倡议上升到G20框架下的具体政治合作平台，不一定完全由中国主导。中国或许在某些方面能力较强，可发挥引领作用，但把“一带一路”倡议从一个中国发起、中国基本上绝对主导的东西发展成G20下面的多国协商合作，并由其他大国共同主导、共同推动的倡议也不失是一个选项。如果放在G20框架下去推，显然面对的阻力会更小，多方合作显然会更有前景。但是这同时意味着中国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一些绝对主导的地位，所以需要中国领导人衡量利弊，作出判断。但如果真的要让更多其他大国或者国际组织、机构更多的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内多边化是不可避免的，否则难以取得其他大国真心实意的参与和支持。

当 LIFE 走进现实生活：费城成功推行以社区为基础的老年人长期护理项目，我们能从中习得哪些经验？

高端访谈

记者：王子煊



■ Eileen M Sullivan Marx

纽约大学护理学院院长

Erlene Perkins McGriff 护理教授

记者：昨天几乎所有发言者都提到了老年人的一些特有思维。比如，他们可能极度怀疑高科技产品的有效性，或者，可能过着极为节俭的生活，尤其在中国。或者在印度，一些学者认为，进入老年，随着健康状况的恶化，一些人可能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因此，我们的科技创新如何应对这种思维，从而顺利实现其目的？您是否做过有关老年人消费或治疗心理的任何研究？

Eileen M Sullivan Marx：我认为，如今并不存在这些思维，实际上，这些只是我们对老年人的模式化观念。从昨天展示的论文来看，我们当中部分人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过多地评判老年人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应该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能够继续学习、继续改变，我们会变得愈加智慧，因为大脑和身体得到的锻炼越多，就越有利于改善健康。因此，我不赞同学海有涯的说法，事实上，我也不会这么说，而说老年人不想学习技术，也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我们做出的这些苛刻的评判，对老年人是一种极大的伤害。

年轻时生活节俭的人，老来也依然过不来奢靡的生活。这是性格问题，而不是年龄问题。有研究表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本身的特质只会变得愈加浓郁。因此，那些颇具幽默感、待人宽宏的人，会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保持这些特质。

「让老年人独立生活（LIFE）是一项针对老年人开设的以护理为主的全面护理项目。该项目由 Marx 教授在四十年前创设，已成为全球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最成功的模式之一。在本次采访中，Marx 教授受邀分享了她在为老年人提供全面护理方面的宝贵经验，其中充满了各种深刻的理念，使我们受益良多。」

那些所谓的思维只是人们对老年人的成见，对企业产品的开发毫无意义。如果你在开发企业产品，那么你面对的是所有客户，而如果你确实想要推出一种新产品，你就需要弄清、测试并关注客户群对销售运作方式和产品用途的看法。了解这些以后，你才能消除他们的顾虑，成功地把产品销售给客户。因此，如果公司对老年人存在诸多成见，在我看来，他们的做法是不对的。

记者：我记得昨天圆桌会议上的部分嘉宾谈到了缺乏老年消费者心理信息的问题。他们认为，政府和私营企业主有时无法获得充分的统计资料和数据，以便其做出正确的决定，因而无法保证其业务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产生利润。您是否认为这种信息的缺乏是一个大问题，是否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Eileen M Sullivan Marx：我认为，这种信息缺乏的存在恰恰解释了我们在关注大众群体的同时，有时候也需要关注小型区域群体的原因。

记者：我们刚刚谈到对获取小型区域群体数据的需要，那么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探讨技术创新过程中出现的区域差异问题。众所周知，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巨大。

比如,在高科技产品的可达性方面,上海并非中国的典型城市,通常的情况是,新技术永远掌握在城市富裕人群手中。因此,当您在费城推行 LIFE 项目时,您是否考虑过区域差异问题并做出一些改进?

Eileen M Sullivan Marx: 美国中部地区存在这类项目,因此你需要从某个地区的某部分人开始,运作这个项目。该项目围绕中心地区设立。美国各地都推行着不同的项目,但在费城,我们的项目能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就是费城西部房屋的建造方式。该地区的房屋面积很大,彼此紧挨,几代人同住在一所房屋中,因此许多人都与年长者居住在一起,而其他一些地区则相反,只有退休的老人,却不见年轻人。因此,在费城西部,人们倾向于几代人共同生活。此外,还存在经济诱因。这些大房屋的实际所有人是家中的长辈,因此老年人在几代人共同居住的房屋中享有足够的空间。

记者: 这种设计体现了 LIFE 项目的人文关怀。您能进一步说明你们是如何把家庭成员也放在项目中心位置的吗?能否介绍一些措施和示例?

Eileen M Sullivan Marx: 要帮助改善社区,你不仅要为老年人提供老年健康项目,还要为孩子们开设好的学校并为成人提供就业。这样,上班族可以去工作,老年人可以去中心;晚间时分,他们可以搭乘公车回家,而孩子们则由校车接送回家……这样就会形成一个顺畅的循环,从而真正改善整个社区。

记者: 此外,您能否举几个除棋牌等传统方式以外的具体示例,以展示 LIFE 为提高老年人社交能力而进行的创新。比如,提供一些工作机会。

Eileen M Sullivan Marx: 在大多数情况下,老年人所做的就是和同辈人打交道。而在中心,老年人想做的可能是工作和帮助他人。比如,一个人可以帮助另一个人填写表格,而另一个人或许多才多艺,就能为其他想要学习艺术的人教授艺术课程。有人或许擅长木工,而中心有男性,有时甚至有女性,想要学习木雕或木工手艺,那么“老师”就会教授老年人木工等技能,然后获得一小笔报酬。因此,人们常常会发现,他们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技能和经验传授给其他人。此外,在美国其他地方,老年人认为自己可以发挥作用的另一个领域是零售行业。当你需要买一些东西时,你会去市场,在那里,老年人非常熟练地和一大群人

打交道,他们很友好,会热情地为顾客展示产品,等等。如今,美国的许多老年人都在连锁超市 Home Dipo 中工作,因为他们有着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知道如何使用 IPAD,能在超市各处找到人们想买的东西。因此,我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依然能为社区做许多事,做对社区有帮助的人。

记者: 那么,老年人对上述各项措施有何反馈呢?我的意思是,他们愿意参加 LIFE 提供的课程和工作吗?是否有一些老年人更愿意独处?

Eileen M Sullivan Marx: 我认为,没有老年人更喜欢与社区隔离的生活方式。偶尔也会有人更喜欢过与世隔绝的生活,但这只是个人喜好,与年龄无关。年轻时喜欢独处的人,老来也是如此。我公公就是一个不喜被别人打扰的人。他三十岁时就是这样。不喜欢度假,只想一个人读读书,然后上床睡觉。这种喜好一直持续到了五十岁,甚至九十岁。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始终保持原来的喜好。但多数人是不同意离群索居的。若非性格使然,人类是不希望脱离群体而生活的。我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发现许多人会选择不同的社会化类型——一些人满足于使用电话和网络电话进行社交,每天与同龄人进行数次互动;而其他一些人可能会说“我只想每周进行一次互动”。这是因人而异的,但一般来说,人类不希望独自待在房间里,这跟监狱中的单独监禁有何异;被单独监禁的人,大脑会失常。

而在获得老年人的正确反馈方面,我们也需要定期而频繁地与老年人进行交流,让老年健康项目的组织者了解他们的想法。你必须询问他们想要什么,必须让他们发现和开发个人需求。

记者: 但在一些最不发达地区,那里并没有连栋房屋,也没有可供几代人共同居住的大房子,或者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到远离家乡数英里之外的地方谋生,造成了“空巢”现象的发生。这些老年人该如何获得我们的项目呢?

Eileen M Sullivan Marx: 有一些地方只有公寓楼和小群体,我们能为他们做的就是设立一家区域中心,提供娱乐和其他社会服务。我们也会提供必要的交通设施,让他们顺利到达提供这些服务或社会娱乐设施的场所,频率可能为两周一次。他们可以走出家门,进行锻炼。

农村地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美国的一些偏远农村地区,如何帮助人们脱离这种与世隔绝的状态呢?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利用技术提供健康监测和通信设施,让那些

地区的老年人觉得自己并不是孤立的个体。今天一些发言者讲到了“联网”技术，为人们提供一些技术网络，让他们相互认识；如果我们能够免费提供这些技术，也许会对那些落后地区的人们大有帮助。

记者：LIFE 和其他所有医疗保健项目需要各类高质量的护士。今天几乎所有嘉宾都提到了人才招聘和人才保留方面的挑战。此外，正如您在一篇题为“老龄化是人类对勇气和人类发展的体验”的论文中所提到的那样，到 2020 年，护理人力资源的缺口将达到 29%。美国的现状如何，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防止护理人力资源的减少？是否已经制定了任何激励措施？

Eileen M Sullivan Marx：总体来说，随着更多年轻人成为护士，美国护理人员短缺的局面正在改善。各地区的短缺情况各不相同。比如，城市地区基本没有护士短缺的现象，但许多农村地区则不然。

记者：当谈到 LIFE 的经费时，您用了“高度创新”一词。据我的理解，这种创新主要体现在该项目的覆盖面。您能否说明该项目是如何达到如此非凡的覆盖面的？早期 LIFE 是如何实现收支相抵的？赞助商是自然而然出现的吗？

Eileen M Sullivan Marx：我们的项目主要由政府资助，但现在我们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对我们项目感兴趣的私人赞助商的支持。在 PACE 项目启动之初，为了获得政府资助，我们必须提供超过二十年的成功证明。这二十年的成功数据向政府表明，这一项目是值得推行的，能提供优质的护理。并且，这一项目是经济的。今天，我们以同样的方式吸引私人赞助商。

事实上，四十年前，政府选择在无需提供任何成功证明的情况下帮助我们创建了这一项目。我们的项目起初就像社会项目，然后我们结合健康项目并把这两个项目组合起来，让其顺利运行；我们向政府展示了我们的项目及其运作方式。我们必须把社会项目和健康项目组合起来。回想起来，还是政府人员向政府论证了我们的项目是有潜力取得成功的。美国依靠人民崛起，并不奉行自上而下的统治。社区也是如此，人们说“看，这对我们有好处”，因此政府才会支持我们的项目。

记者：您是否考虑过扩大 LIFE 的范围？您对此类项目的发展蓝图是什么？

Eileen M Sullivan Marx：虽然我不再指导 LIFE 项目的实施，但 LIFE 项目确实在逐渐发展、壮大，尤其在宾夕法尼亚州，那里分布着美国大多数项目。区域领导人必定同意实施此类项目、提供资金并允许私人资金参与这些项目。这是项目发展的主要因素。尽管《平价医疗法案》提供了一些联邦激励措施，但只有地方州政府才能控制这些项目的多数财政拨款。

社会企业在新经济时代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语境下的价值，挑战和回应

高端访谈

记者：廖素安



■ Ruth Shapiro

亚洲慈善与社会中心首席
执行官与创始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社会企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地迅速发展。在新经济时代，社会企业同时面临着许多机遇与挑战。中国作为倡导大众创业与万众创新的国家之一，为社会企业在新经济时代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具有启发性的经验。」

记者：香港著名的社会企业家谢家驹指出，社会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吸收和动员受益者：他们不只是被动地接受帮助，而且在与社会企业的互动过程中不断改变自身。这个想法似乎与传统的慈善事业有很大的不同。您如何看待这个观点？社会企业和传统慈善事业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Ruth Shapiro：想想一个连续体。一边是传统的非营利慈善组织，它是受资助的，另一边是完全营利的公司。在三十年前，这个连续体上只有两端，没有中间。但是后来，一个叫 Bill Drayton 的人创造了“社会企业”这个词。他认为我们应该利用商业思维来解决社会问题。在过去三十年间，这个连续体的中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创新和实验。

所以，社会企业家精神是指将商业工具和商业的严谨性应用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中去。这和社会企业不一样。社会企业像公司一样运作，但它专注于解决社会问题，且它的盈利会回到公司用于继续解决社会问题，这样它就不必依赖补助金；而一个社会企业家可能在经营一家社会企业，也可能在以一种更具有战略意义的商业方式来运营一个非营利组织。

当今世界有各种不同的模式和策略，社会企业只是其中之一，它们中没有一个是那个“唯一的答案”。每一种类型都有不同策略，它们代表着不同的价值主张。对不同类型的选择，取决于你的问题和你想要的解决方案。

记者：中国总理李克强在 2014 年首次呼吁“大众创业

与万众创新”，你认为社会创新是什么，为什么它对于当下中国如此重要？

Ruth Shapiro：很多时候，创新只是一个名字。它是“不满足于事情既成情况，并试图想出一种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的另一种说法。所以当你想到那个营利 - 非营利连续体时，在其中发生的一切都是社会创新。社会创新是人们用不同的工具和战略来解决一些问题。你希望这些新的方法更加有效，但你不能保证它们是否真正奏效，你需要去尝试。这个尝试也许会失败，但是你会从中得到收获，这一点更加重要。

记者：众所周知，衡量商业企业价值的最重要标准是利润。然而，社会企业家的主要目标是创造社会价值，这似乎更主观、更灵活。我们如何评估社会企业？我们应该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

Ruth Shapiro：在社会意义上，人们谈论投资和回报的方式有很多。正如你在问题中指出的，当它是一家公司的时候，评估很容易。但在社会企业方面，情况却有所不同。有很多关于测量和评估的讨论，其中的一些讨论非常好。以教育为例：如果孩子的识字率很低，你的目标可能是让他们读更多的书，这样他们的读写能力就会提高。你可以通过考试来衡量这个能力，并下结论说，因为我们建立了这个图书馆，孩子们的阅读理解已经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但麻烦之处在于，许多时候这些好处是无法量化的。

阅读理解和他们在学校的天数是可以量化的，但是他们的态度和自尊是难以量化的。想想看，在你的一生中，也许会有两位深深激励过你的老师。他们是如此的好，但你无法量化它；你只知道它很有影响力，但你不能在它上面放一个数字。什么是伟大的老师？一个伟大的老师是一个能把考试成绩提高的人，但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启发和激励你的人，而这是难以评估的。所以我想说，没有确切的衡量答案。你必须承认，有些事情是可以衡量的，有些是无法衡量的，但那些无法衡量的事情也很重要。

记者：那么影响人数是衡量社会企业的参考标准吗？

Ruth Shapiro: 这取决于你想做什么。有时规模很重要，但有时则不那么重要。如果你是一位慈善家，你想把钱捐给那些正在寻找治疗癌症方法的科学家，你就不会把钱给一万名科学家，而是把经费给一小部分人让他们改进研究，但是这种治疗方法成功后，可以惠及成千上万的人。所以人数是否是衡量标准取决于你的目标。不同的项目，社会创新的目标也不同。

数量和质量是不一样的。我想现在很多人对规模存在误解。从一万双筷子到一百万双筷子，这是规模化。但对于社会来说，比规模化更重要的是系统的改变。提供十万份学校午餐的确有规模，但还是没有解决为什么这些孩子需要学校午餐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这是用商业术语来思考问题的坏处之一。因为在商业中，人们的目标是卖更多的东西，但是在社会变革中，人们要做的是改变这个系统，这样孩子们从一开始就不会挨饿。

记者：在你的书《真正的问题解决者：美国的社会企业家》中，你谈到了许多鼓舞人心的“英雄企业家”；但与此同时，要实现持续的社会变革，建立动态联盟也很重要。你如何看待不同社会企业家之间的联盟的重要性以及这些年来社会企业家之间的合作情况？

Ruth Shapiro: 我在书中说，仅仅指出超级明星英雄企业家没有太大帮助，因为没有人能自己做这件事。把它视作一人对抗全世界的想法是错误的。我认为这种想法也来自于商业。所以，虽然有像比尔盖茨和马克扎克伯格这样的明星企业家，但是要达成系统改变，还需要合作伙伴、政府和社区，只有协作起来才能改变系统。

所以我认为，识别出领导者、识别出那些有动力和激情的人是件好事，但说他们应该独自行动是不好的，也是不可能的。你的确需要那个有激情和动力的人，只不过这

个人也需要成为团队的一员。

记者：你如何看待社会企业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为促进社会企业家精神和创新采取了哪些政策或行动？

Ruth Shapiro: 我认为亚洲在这方面与美国和欧洲不同。在亚洲，人们更倾向于与政府合作，而政府也希望慈善机构、非营利组织和社会企业家与自己合作。我认为，说哪一方做得更好是不对的，因为不同的地方，最有效的模式不同，美国模式可能不是最适合中国的模式。

我所认识的成功中国企业家与政府有着合作。让我举两个例子。有一个非营利组织叫做“健康快车”，他们通过火车周游中国，帮助眼科医生和医院更好地进行眼科手术：火车停在医院，然后这个组织的医生和当地眼科医生一起工作。“健康快车”是与卫生部合作的，如果没有和卫生部合作，它也许不会那么成功。卫生部希望这个组织在各地走动。但“健康快车”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政府与它是一种伙伴关系，二者相互促进。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不仅给予他们许可，而且还给予他们信誉。健康快车自己筹措经费，而政府更多地是为它创造机会和合法性，就像在说“这个组织很好，我们鼓励你和他们一起工作”。

记者：那么在美国呢？

Ruth Shapiro: 通常情况下，在美国，你不必关心政府在做什么。若你想在学校里开展活动，你可能需要那所学校同意，但你不需要像在亚洲那样，让政府机构参与进来。并且在亚洲，与政府合作并不总是因为他们必须这么做，而是出自于特有的“和谐”和“关系”，与政府合作是自然而然的。但这很好，因为如果政府与你协作，你才更能带来系统的改变。

我再举一个例子。在北京，有一个学校叫“百年”，它提供职业培训服务。在中国，农民工的孩子难以在城市上学，因为他们没有当地户口。中国面临着这样的两难问题：要么把他们抛在身后，要么把他们带到城里，但很难把他们送进学校。

因此，“百年”创始人因为这些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创建了一所职业培训学校，培养管道工、电工或教授计算机修理技能。她的第一笔大额资助来自中国青年基金会，它认识到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的需要。此外，中国政府也已经意识到我们需要鼓励职业培训，因为现在在中国，很多人只是认为他们应该上大学，但并不是所有学校都像复旦大学那么好，所以他们没有技能就毕业了，很难找到

工作。但是，百年拥有 100% 的就业率，因为公司需要有职业技能的人。现在，中国有 12 所这样的学校，此外，中国政府还帮助国有企业到非洲去创建这些学校。这位创始人现在是政府的顾问，帮助制定职业培训政策。所以社会企业和政府之间是互惠的。

记者：在这些故事中，这些企业与政府有着良好的关系。但也有一些公司认为，有时候政府对他们限制过多。你怎么看？

Ruth Shapiro: 中国的一些政府机构弄混了“支持”和“控制”。例如，政府可能会问非营利组织，你需要什么？非营利组织说自己需要钱。政府说，好的，这是资助费，但你必须做某项研究。尽管这项研究并不是该组织想做的事情，但他们别无选择，因为这是政府的要求。因此，他们不是在做他们想做的工作，但政府却可能认为“我们在帮助他们”。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的确在努力思考如何更好地赋权，尤其是当新的慈善法出台以后。但是这部法律很新，要真正把握支持和控制之间的最佳平衡点还需要时间。

记者：在新经济时代，社会企业家正在通过新的渠道和方式逐步解决社会创新和融资问题。特别是在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的当今，您认为社会企业家可以如何与新兴互联网技术合作？您能举些例子吗？

Ruth Shapiro: 当然，有许多利用互联网和新技术来实现社会创新的好例子。我想阐述一下互联网可以提供帮助的三种方式。

一个是众筹。许多人的小笔钱，加起来会成为一大笔钱。在中国的众筹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出名的学校午餐计划中，每人只要在在网上捐赠 5 到 10 元钱，转眼间我们就能募集到数百万元。这是一个现在常发生的例子。

第二种互联网的帮助体现在郭美美事件中。互联网能让人们进行监督。网民可以看到人们是否腐败，因为一些非营利组织只是想要拿到钱，毕竟也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是好的，对吧？这是一个大国，有各种各样的人。而互联网的监督，让组织人员和政府官员的腐败变得更加困难。

第三种类型实际上是商业策略的一部分。我举个例子：在印尼有一个非营利组织，创办者意识到很多人想要学习，但并不一定想去学校上课，所以他们创造了一个叫做“Berbagi”的学院。在这里，有的人想了解市场营销，有的人想学习如何训练狗……然后他们用互联网找到一个人，

这个人会说，好吧，我不是老师，但是如果你安排一个地方，我可以去教你。教课者是没有报酬的志愿者，学生也无需为此付费，他们用互联网来寻找彼此。现在，这个学院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课程。大多数都只是一次性的，但它很有帮助，而且很有趣。这是一种利用互联网的社会创新，它以一种不那么正式的方式分享人们的技能。

油气之外：南海共同开发的其他领域和模式

高端访谈

记者：王 峥



■ 洪 农

中国南海研究院海洋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中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和资深研究员。

「通过南海共同开发推动区域发展，构建中国与东盟国家合作发展良好关系。正视东亚法律文化共同体中的各国差异，将挑战转变为机遇。培养了解国际形势、具有专业分析能力、能够在国际争端解决中发声的中国自己的国际司法人才。」

记者：您曾在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海洋法问题研究中提到“各国在确保海洋资源和海上通道得到持续有效利用方面均存在共同利益”，您认为中国和东盟十国的能源安全合作中，中国未来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如何进行有效的合作？

洪农：我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主要是从南海地区油气开发的角度着手。南海油气资源比较丰富，但是因为有涉及到主权和管辖权的争端，有些国家在有争议的地方进行独自油气开发势必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弹。因此，在南海有争议的部分进行共同开发，从促进各国合作的角度来看是一个好的方式，也是一个临时的解决方法。但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因为中国一直主张要共同开发，但是其他的周边国家的反应，向来是有些国家反应比较冷淡，有些国家赞同这个提法，但是他们有很多的顾虑。

比如说，有些国家会觉得我们中国主张的共同开发的前提是主权属我，所以他们很担心如果他们同意了共同开发的这个主张，那就是相当于变相地承认这些南海岛礁的主权是属于中国。这一点是这些国家一个很大的顾虑。另外一个顾虑是，有些国家担心在“有争议地方”进行共同开发，而他们认为这些地方可能是没有争议的，但是如果他们同意进行共同开发，那可能就会变成变相地承认中国的一些海洋主张。这些问题是其他国家一些主要的顾虑。所以，从其他国家角度来看，目前我们面临的挑战就是缺乏很大程度上的政治意愿。

当前最困难的是各国能够对共同开发的区域及地理位置达成共识。这点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如果共同开发做

好了，那对中国而言，很多南海问题的政策主张，包括与东盟其他国家关系来说，是个很好的切入点。现在的应对办法，像我在会议中谈到的，可能是要从简入繁，先选一个只涉及到两个国家的问题，比如中菲之间、中越之间或中马之间，然后形成一个很好的案例，希望这个成功的案例能推动更多类似问题的解决，由此对整个南海地区共同开发有个比较好的影响效益。这是目前中国从机会、机遇来看比较好的解决方式。

记者：从南海仲裁案的进程和后续来看，您认为目前在海洋法方面的国际争端解决方式，例如诉讼和仲裁，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洪农：我认为在海洋法的国际争端解决方面目前存在的问题是，因为实际上海洋法里面有四个机构，一个是国际海洋法法庭，一个是国际法院，然后是仲裁庭和特别仲裁庭。实际上当时机构设计的时候，对海洋方面的争端，实际上国际海洋法法庭应该是占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但是目前来讲，因为仲裁的门槛比较低，比如说管辖权和受理权的门槛比较低，很多国家可能会更倾向于选择仲裁，而不是把他们之间的这种争端提交到国际海洋法法庭或者国际法院去。

在南海仲裁案中，实际上我们国内很多学者对是否第一时间接受这个仲裁案是有争议的，案件里面有很多争议的地方。这个案件拖了三年时间，对中国来讲，结果毕竟不是很好，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的国家形象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但这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学习和教训的机会，好的方面表现在这几年，中国在海洋法方面的很多学者，

或者说是很多年轻一代的学者，选择了海洋法作为他们的研究领域。

虽然在商业仲裁方面可能我们国内已经有了很多经验，有自己的人才队伍。但是在这种国际诉讼中，特别是涉及到国家主权、划界这方面，我们是缺少人才的。那么通过这次仲裁案本身，中国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启发，所以会促进中国在这方面比较有条理、有计划地培养我们自己在司法和仲裁方面的人才。我觉得这是中国在这个案子中能够学到的一个很好的经验，会把挑战变成机遇。

记者：您曾发表论文探讨过东亚法律文化共同体的问题，认为南海仲裁案也引发了关于东亚地区法律文化、特别是海洋法律和文化的更深层次的思考。具体到海洋法方面，您认为东亚地区各个国家的法律文化的差异是什么？这些差异对于海洋法实践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洪农：谈到东亚法律共同文化基础的问题，因为很多人认为整个亚洲有一个文化体系，不太愿意把两国之间的差异或者争端诉诸于国际仲裁或者国际诉讼。但是现在慢慢有些变化，有其他的很多东南亚国家他们在这方面可能走得会比较早一点。比如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和印尼之间他们都有通过国际法院解决主权问题的先例。中国在这方面可能是跟这些国家还是存在很大的差异，包括东盟国家之间，他们自己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比较大，比如说，越南在这方面会跟中国的立场比较接近，会比较保守。所以中国跟这些国家之间，这些国家他们自己之间也存在一种法律文化方面的差异。

记者：您认为在现行的国际法框架下，中国在解决与东盟国家的领土、海洋权益争议问题时，在法律层面面临的挑战是什么？中国如何在国际舞台上争取话语权、维护国家利益？

洪农：这是个非常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我这几年也参加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国际会议。本身在南海问题上，在话语权方面我们国家是处于劣势的，因为谈到这些国家，都有种同情小国的心态。一方面是同情小国，另外一方面是有针对性地面对中国，不管说什么做什么，在法律上有多有理，在法庭上有多站得住脚，我们本身是处于一个很弱势的地位和情势。但是，也不能因为这种挑战而无所作为，所以以后我们自己要构建一种自己的话语体系。这方面要做的工作非常之多。

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多中国学者跟别人谈论的时候，就喜欢说一些有点像 statement 那样的东西，而不是进行专业性的分析。我觉得中国在教育这方面就有很多可以做。比如说我们国内有很多大学有专门的海洋法方面的教学，在培养学生方面，我觉得我们跟其它的国家相比还有很多需要提升的地方。比如越南，他们这几年输送了很多学者，包括他们政府官员到国外，到西方国家的相关院校去很系统地学习海洋法。然后这些人通过两三年的学习，结束后他们又回到了越南，又回到他们的外交部或者涉海的部门。这些人在很多的国际会议场合跟我们自己的学者经常有交锋，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也不妨多做努力吧。因为争取话语权，我觉得是一个有系统的、计划性的过程，有不同年代、不同层次的学者，包括很资深的学者，包括刚刚入门的学者或者是学生，不同的人都是能够有所作为的，而且有很大的作为空间。

从特朗普和美国逻辑看中国对美政策

高端访谈

记者：王悦馨



■ 达巍

国际关系学院校长助理、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美国外交及中美关系的研究，曾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所长。文学学士，法学硕士、博士，2006年至2009年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访问学者。

「当前中美矛盾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在同一个体系内部两个巨型的异质国家如何共存的问题。从大的趋势看，中美关系当中对抗性的、或者说竞争性的因素在上升，这个趋势是没有变的。我们一个核心挑战可能就是怎么管控这种竞争本身。竞争不可避免，也不一定是坏事，但是你管控它，就是不要让它变成恶性竞争。跟美国去争夺什么世界领导权，地区领导权，这个不应该是我们的目标。不要把我们宝贵的资源消耗在大国竞争的游戏里，争取不要让竞争面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

记者：能否请您谈谈您对现在国际形势下中美关系的理解？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现在的中美关系是怎样的？

达巍：当前中美矛盾背后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在同一个体系下两个巨型异质国家如何共存的问题。

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很不一样。我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差异都很大，并且我们两个国家都很大。这样的两个国家要如何在一个体系里生存，如何共存，如何去进行一个友善的、良性的竞争，是我们需要去探索的。

美国现在觉得由于中国的体制，在国际体系下跟中国竞争会吃亏，中国在占便宜。对美国来说，要改变这种状况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彻底地改变中国，改变中国运作的模式。这个想法中国不会接受；另一个办法是说，我不跟你玩了，我要把你赶出我领导的这个体系。所以美国其实在做一种“脱钩”的努力。美国最基本的想法就是：你不变，我就跟你脱钩。

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这种脱钩虽然是双输，但是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更大一点。那么我们希望的就是稳住，大致维持现状——如果你们有一些具体的要求，我们可以谈，可以妥协。在这个基础上看前一段时间比较热的经贸问题，经过短期的博弈之后，经贸关系似乎暂时稳定下来了，“贸易战”有一段时间似乎是不可能打起来了，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矛盾还在那。后来的发展当然也证明，那个短期的相对稳定的确没能维持多长时间，特朗普就又变卦了。

所以回到你的问题，现在中美关系正在发生一个质变。如果你对比奥巴马时期，或者那之前的时期，你会看到，现在有一个很深刻的变化，那就是，美国开始从大国竞争的角度看中国。这引起中美关系当中很多负面的，比较消极的发展。也许我们看（2018年）5月的最后两周，这种负向的发展暂时处在一种比较稳定和缓和的小阶段里，但是大的趋势中美关系里对抗性的，或者说竞争性的因素在上升，这个趋势是没有变的。

记者：美国担心中国想要“占便宜”，而中国想要从这个全球化体系当中获得发展，看起来这个矛盾似乎是不可调和的，是这样吗？

达巍：首先，我们跟美国的交往并不是一个单方面的、像美国人说的“美国一直在吃亏，中国一直在占便宜”的这么一个状况，这里面确实是双赢的。只不过这里有一个相对获益的问题。比如说可能中国人挣了80块钱，美国人挣了20块钱，但美国人也有收益。

过去美国长期比较关注绝对收益：只要我能挣钱，哪怕你比我多挣点，问题也不大。而特朗普政府比较强调相对收益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觉得如果要再这样下去，中国要追上他了。从特朗普的角度说，他就是要美国比中国挣得多。但如果美国要停掉这种关系，一方面美国人不但要少挣这20块钱，可能还要赔一些出去；另一方面，这么多年美国已经习惯了跟中国交往，平白失去本来的收益，

从美国百姓、美国利益集团、美国国内政治的角度也是件挺难受的事，所以这个婚如果要离，对双方来说都是很痛苦的。

记者：您去年六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美国对华战略逻辑的演进与“特朗普冲击”》中提到美国对华战略的制定包括一个假设，即“美国要做的是塑造中国发展的方向，而非阻挡中国体量的崛起”，这个假设今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体现在和将体现在哪些方面？

达巍：关于美国是不是要塑造中国，美国国内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没有办法下一个很准的定义说全体美国人希望中国怎么样，但是整体上美国希望中国往自由化的方向走。而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提到，“几十年来，美国的政策源于支持中国崛起和融入战后国际秩序的信念，将使中国自由化（liberalize）……这一信念是根本错误的”。美国官方明确了一个结论，即我们不能，也不想塑造中国了，过去的做法错了。这种看法在过去几年已经成为美国战略界的主流，只是现在正式进入了政府官方文件，等于进入官方正式认可的层面。

其实这个变化不仅是特朗普任期才发生的，或者说，特朗普上台以后表现得更清楚，但是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对华策略就已经有不小的变化了。很多事情现在如果是民主党当政，他们也许会做得更狠，因为他们可能组织得更好更有条理，会找到更多盟友，不会犯很多低级的错误。当然特朗普有他的不确定性，但是有些你在他上任之前大概就知道他肯定会做的事情。这一部分是出于他所处环境，美国国内对中国的普遍看法，不管是谁上台，都会产生作用。另外，他上台前的竞选承诺基本都兑现了。所谓不可预测的主要是他的个性、风格带来的。

记者：所以您认为我们现在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美政策？

达巍：我们对美政策比美国对华政策还要稳定。过去当然我们比较被动，但是中国的能力越来越强以后，中国也可以开始逐渐塑造美国的选择。就除了被动地应对以外，我们也可以考虑怎么塑造美国的选择。

比如说美国企业现在对中国很不满意。现在回过头去看，如果我们过去一段时间对外开放速度快一点，甚至在奥巴马任期把双边投资保护协定都谈掉，可能今天的经贸关系就不会这么走，情况可能就会不一样。这就是一种塑造了。再比方说我们一直在邀请美国的国会议员来中国访问，确实有些人来了以后被中国影响，他发现原来自己对中国不了解，中国也不是一个怪物，其实跟我们差不多，虽然有他自己的特点，那也是正常人。他对中国的观点就

变了。我们在朝核问题上，也是不断地在推我们的方案，希望美朝双暂停，虽然开始双方都没有接受，但是中国做的这些事还是有好处的，而且最后事实也是朝着中国所主张的那个方向去走的。

记者：虽然特朗普一直在变，但是也许中国可以有一个比较稳定的策略。可以请您大概预测一下中美关系可能出现的新的走向吗？

达巍：我觉得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第一是要黏住。美国现在威胁要脱钩、要增加壁垒，那我们要贴住他，因为在这个体系里对我们来说更符合我们的利益，这意味着可能有时候我们需要做点小妥协；

然后第二，我们一个核心挑战可能就是怎么管控这种竞争。竞争本身不可避免，也不一定是坏事，但是需要管控，不要让竞争变成恶性竞争，争取不要让竞争面成为中美关系的主要方面。中美关系里长期有竞争面，也有合作面。过去我们大家都一直认为合作面是大于竞争的，最近确实出现了竞争面超过合作面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我们可能没办法阻止，但是可以尽可能地去扩大合作面；

第三个是要管控竞争的成本。我们可以跟美国竞争，但是你准备付出多大的成本来竞争？这个竞争不会是像苏联和美国；我们中国还是一个国内问题很多的一个国家，或者说可能更大的问题还是在国内。我们不能太多的资源消耗着消耗在大国竞争的这个游戏当中。争夺世界领导权、地区领导权，这个对我们来说不是最急切的事情。所以这个其实也回答了我们在对美国，包括对之前差点形成的贸易战之类的问题上的策略——虽然坚持自己的底线，但是要稍微收着点。况且美国提的一些具体的战术层次的要求，其实跟我们自己的计划也没有太大的没有原则性的差别。除了他说要改变经济制度，这我们不可能去做；或者说说要完全平衡中美贸易，这个我们做不到。但是他说你应该给我降点关税，你应该保护一下我的知识产权等等，这些我们自己本来也准备要做的，只是速度、领域、节奏不一样，那我们可以做点妥协。这个不是原则问题，对吧？

美国对亚洲政策里包含很多长期存在的东西，所以与其说是特朗普的对亚洲政策，其实还是美国对亚洲政策。特朗普的个人风格让它看起来好像很激烈，或者好像很激进，但是其实它的大方向跟之前是相同的，只是做起来有时候不太一样。比方说朝核问题也是这样子。不管谁上来，朝核问题都很重要，但是特朗普说要极限施压，一下子就把朝核问题的热度拉高了。美国的基本战略目标上面，连贯性是很强的，但具体怎么操作层面，以及连带造成的局面，每个总统是不太一样。

嘉宾建言

上海论坛 2018 在与会代表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部分代表于会后致信组委会，表达对论坛组织工作的感谢、对相关议题的延伸思考，及对论坛未来发展的期望。

Shamshad Akhtar

联合国副秘书长（时任）
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执行秘书（时任）

作为我与上海论坛的第一次交流和互动，我想表达我对这个论坛在讨论全球和地区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赞赏。2018 是经济复苏的关键年，但出现了新的不确定性。在上海论坛的开幕式及其他会议期间，我们共同讨论了我国经济面临的所有相关问题，包括当前和未来的问题和情景。论坛是一个极好的平台，可以让国内外学者、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分享他们的知识，并为变革提供建议。

我感谢复旦大学校长和论坛主席以及其他参与组织对话的人。

Luiz Carlos Bresser-Pereira

巴西财政部原部长

致 2018 上海论坛组织者（特别是复旦发展学院常务副院长张怡）

作为一名发言人和多边发展银行圆桌会议的成员，参加上海论坛 2018 是一种荣誉和特权。

我遇到了非常有趣的人，也从论坛和圆桌会议上的精彩演讲中受益匪浅。当时的辩论热烈而刺激。

这个论坛赋予我了解中国这个伟大的国家的机会。

能获得与会者对我演讲的理论基础——发展主义的积极反应，我感到非常高兴。

我对论坛的组织者表示祝贺。

Peter Dayan

英国皇家学会院士、2017 年大脑奖得主

我非常感谢上海论坛给予我发言机会。拓展至科学与科技领域意识论坛的开阔性，这点令我非常钦佩，对未来而言也是个好兆头。

中国学术界的变化与进步不仅让人兴奋，更使我感到谦逊。

李兆平

伦敦大学学院计算机系计算神经科学教授

很高兴能参加上海论坛 2018
祝母校的论坛开花结果

观点集萃

圆桌

特朗普与亚洲：美国政策与角色变化

李根旭

韩国西江大学政治系教授

“火与怒”与首脑峰会：朝鲜半岛中的特朗普因素

1. 现阶段朝核问题非常严峻，特朗普政府为现有局势增加了不确定性，但当代信息的透明度可以规避一战时期危机管理失败的情况。

2. 南北朝鲜在“无核化”的重要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朝鲜强调整个半岛的无核化，即包括韩国现有的核设施与美国为韩国提供的核保护伞；而美韩则认为“无核化”应只限于朝鲜，与韩国无关。

3. 朝美双方对于“和平议程”的理解不同。朝鲜认为美国驻军撤出半

岛的和平协议才有效力，而非韩方认为的单纯签署文件。如果美国部分撤军，朝鲜也应裁军以保持韩朝实力平衡。

4. 朝鲜的承诺是否可信。信任不是国家合作的前提，重点是如何在交往的过程重新建立信任。

5. 在“核”之外的传统安全也应受到重视。美国可接受部分撤军，全部撤军的可能性较低。

沙姆沙德·汉

巴基斯坦前外交秘书、驻联合国大使

特朗普政府的南亚政策

1. 国家政策根植于国家利益之上。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在于世界强国、美国利益、美国责任。然而五十年代起美国一直面临责任心缺失的问题。

2. 地区局势是全球局势的延伸。美国的世界目标与野心决定它会不会

从南亚撤军，在中国崛起，美国需要制衡中国的背景下，美国对阿富汗、印度、巴基斯坦的需求上升了。

3. 特朗普对南亚并没有新政策，其外交行为是服从于美国利益需求的。



新时代、新金融、新经济

Randall Wright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

高成本信贷与粘性价格

1. 我们构建了一个模型，其中货币和信用支付是相互替代的支付工具。我们用它来分析粘性的名义价格，并使用数据来验证模型。

2. 市场均衡会导致价格离散。此时卖方设定名义条件，当总条件变化时它们可以保持条件固定。买家使用现金和信用支付，前者（后者）受通货膨胀（交易成本）的影响。

3. 经校准的版本很好地匹配了价格变动数据。这些版本的持续时间具有现实意义，有较大的平均值变化，很多小的和负值的变化，负值的危险以及随通货膨胀变化的行为，同时与货币和信贷的宏观数据保持一致。

Jonathan Chiu

加拿大银行高级研究顾问

数字货币的经济学：比特币及其未来

1. 我们研究数字货币的最优设计并定量评估这些加密货币对双边贸易的支持程度。

2. 数字货币的挑战是通过依靠竞争来更新区块链（昂贵的采矿过程）并推迟结算来克服双重支出。估计目前的比特币方案会产生达 1.4% 的福利损失。这种福利损失可以通过采用减少采矿行为并完全依赖货币增长而非交易费用来为采矿提供奖励资金的最优设计而大幅降至 0.08%。

3. 如果可以解决规模限制问题，数字货币可能会挑战零售支付系统。



新兴经济体的合作共赢之路

Piotr Szpunar

经济分析部门主任

中东欧国家视角探索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和贸易的重要性

1. 中欧有很多合作项目，这些项目可以一定程度地消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放缓，不过欧盟内部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仍不容忽视。

2. 贸易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包括对进出口、经济增长、国际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

3. 中国在双边投资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通过“16+1 合作”和“一带一路战略”等计划开展了一系列的共赢合作。现阶段，合作主要限于传统行业，在高新技术行业和新市场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Norbert Csizmadia

匈牙利央行 PAIGEO 基金会 理事会主席

新世界秩序的地缘政治挑战

1. “一带一路”的意义，它能够去让这个世界的经济联系回到欧亚地区，能够带来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欧亚的新的角色，更多的合作，实现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2. 非洲大陆在“一带一路”中有非常有意义的影响，包括贸易合作伙伴和投资等等，在未来会有一些新的金融经济中心，还会看到新的交通能源等方面的投资项目，包括农业等其他方面的项目投资。

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创新无极限

Eileen M. Sullivan-Marx

纽约大学护理学 学院院长 / 教授

基于社区的老年人长期护理

1. 老龄化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这个全球性问题需要在地方、地区和家庭层面得到解决。

2.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创新例子是“老年人独立生活项目”（项目的英文简称为 LIFE），这是一个护士领导的综合照护模式。该项目结合了一系列的服务，包括初级护理与医药、日托中心、家庭服务及交通服务等。

3. 这种综合的护士领导模式成功地延长了老年人的生命，减少了住院时间与费用。

刘建兵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城市运行与管理重点实验室主任 / 副研究员

浅谈政府主导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构建环境下智慧健康养老产业发展的空间与方向

1. 智慧健康养老技术，是以长辈获得健康、喜乐、有活力和尊严生活为目标，以智能硬件、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老年服务专业技术的集合。有助于实现个人、家庭、社区、机构与健康养老资源的有效对接和优化配置，提升服务质量、效率和水平。

2. 政府主导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如北京“三边四级”养老服务体系，通过构建市级指导、区级统筹、街乡落实、社区参与的四级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有利于实现老年人在其周边、身边和床边就近享受居家养老服务。

3. 未来智慧健康养老产业的发展空间与方向，既需要政府平台的参与，也需要体系外创新。需要人工智能的支持，需要极大提升可用性。



走向共同繁荣的中非关系

周超

中非发展基金副主席

中非发展基金助力非洲工业化的十年：合作的经验与指导

1. 在过去的十年中，中非发展基金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在创新流程，尤其是直接投资和金融创新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2. 非洲有巨大的发展前景，中国和非洲之间的投资机遇不可限量，且机遇远大于挑战。非洲国家正在积极寻求更多的机会来提升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工业化水平，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在 PPP 的框架下开展合作，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

3. 中非的投资合作同样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从中国的角度来讲，走出去战略尚未得到充分实施，且许多中国公司对于国际惯例和操作，尤其是当地的法律法规的了解有待加深。对于非洲而言，投资环境有待优化，有些国家的政策缺乏连续性和实践性。此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低下会长期影响当地的商品价格。

4. 从中国的经验来看，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可以通过发展来得以解决。

林毅夫

北京大学教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院长

中国崛起与非洲机遇

1. 过去四十年里，中国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为非洲提供了重要的经验。

2. 技术升级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但并不一定是新发明的技术才能推送增长。中低收入国家往往拥有最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因为他们享有后发优势，可以直接采用现存的技术对自身产业进行升级。

3. 中国的经验：1978 年前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是割裂的，因此得以自力更生地培养起较为全面的工业基础；而 1978 年后通过在劳动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吸引了广大的世界投资者。这种集中利用比较优势的方式值得非洲的借鉴。

4. 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五十六十年代自美国转移至日本，七十年代转移至亚洲四小龙，八十九十年代转移至中国。

5. 今日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在寻找新的转移地，非洲应该抓住机会吸纳这些转移。和前几波转移相比，中国的产业转移最大的不同在于其惊人的规模，因此这对于非洲国家的工业化将会是一个绝好的机会。



2008 年危机后多边开发银行在亚洲和新兴国家中的角色

Luiz Carlos Bresser-Pereira

圣保罗企业管理学院名誉教授，巴西财政部前部长

多边开发银行为何应以本国货币提供金融服务：金融稳健发展的建议

1. 在多边发展银行的经典理论模型中有两个假设：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和外汇，特别是缺乏美元储备

2. 由于缺乏资本，发展中国家需要融资，各国的现金账户赤字融资是西财政部前财政为增加投资提供资金而不是为消费者提供融资。但实际并非如此，大部分赤字融资项目通常用于消费。

3. 由于资本流入量超过了以国家货币作为赤字融资的流出量，所以外国的储蓄替代率很高；当国家增长速度非常快，投资机会增加或者投资边际偏好增加而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时现金账户赤字才会无害。

4. 建议多边发展银行应以本国货币在大量投资中进行融资。

Mmakgoshi Lekhethe

非洲开发银行集团执行董事

对非洲建立多边发展银行的展望

1. 在非洲低水平发展的地区建立多边发展银行更具意义。首先,可以通过非洲发展银行与本地的客户进行磋商;其次,要考虑如何建立一个更具资本厚度的多变银行,目前而言资本仍然是不足的。同时也不可能在不讨论政府参与的情况下讨论建立包括多边发展银行在内的一系列其他经济政策。

2. 需要扩大金融领域的覆盖范围,并更好地利用多边发展银行的能力,应该加强与其他的同类银行的合作,并借鉴其他银行的经验来发展非洲的多边发展银行,并且将更注重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但目前应该首先将注意力集中于农业的投资。为吸引投资,同样也要注重创新发展。

3. 非洲目前面临许多问题,首先是项目融资问题,其次是资源利用问题,非洲应该与其他的多边发展银行进行合作以便借鉴解决目前一系列问题的经验。对于多边合作项目而言,如何解决跨国合作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其他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进行合作来共同解决。



亚欧协同：共筑适应现状与包容的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

丁 纯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金融危机十年后的全球经济格局变化与经济治理

——聚焦中欧美

1. 当下世界经济格局：中国近些年增长迅速，在世界经济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仍保持世界经济霸主地位；欧洲显示出微弱衰退趋势。

2.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需要改革以适应当下趋向多极化的经济发展方向，但下面面临的一大阻力是世界经济在多边发展中逐渐出现向双边甚至单边发展的趋势。

3. 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过去十年逐渐由 G7 主导格局向 G20 主导格局发展。目前 G20 虽然有很多合作平台，但缺乏统一共识是一大问题和挑战。

4. 三大经济巨头——中国，欧盟和美国对世界经济发展方向态度不同。中国和欧盟坚持双边、多边发展，但美国坚持“美国优先”的单边发展态度。

Daniel Gros

欧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亚欧协同：共筑适应现状与包容的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

1.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中欧在货币和金融方面的合作乏善可陈，也没有货币政策方面的合作。

2. 全球经济失衡有新发展：10 年前主要是中国出超和美国入超之间的失衡，但今天美欧、美日之间的失衡也同样严重；看经常账户，美欧失衡更加严重；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经济关系都面临挑战；中国在全球失衡问题中的位置不再突出。

3. IMF 提供了一个衡量成员国在全球贸易中地位的公式。根据 IMF 公式，中国的地位与其在 IMF 中所占份额相差巨大，中国的份额显著小于其应有份额，而欧盟被过度代表了。因此，为使 IMF 代表性更强，必须进行份额改革。



区域“去一体化”：现状、动因和出路

黄建忠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

“去一体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与高质量开放

1. 高质量的发展来自于高质量的改革，高质量的改革源自于高质量的开放的倒逼。过去的开放基本上是基于外需加上国内的要素供给能力的全球化战略，未来高质量的开放应基于内需然后加上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全球化。

2. “进口博览会”是高质量开放的重大实践和典型示范。进口博览会能突出彰显三个比较优势：制造大国、投资大国、互联网大国。

3. 进口博览会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区域的经济活力的增强、国际产能合作，包括双边一体化和区域一体化，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人民币的国际化。

张磊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WTO 研究教育学院院长

WTO 在反“去一体化”中的角色

1. 寻求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佳途径：重点应该是确定如何缓解真正的挑战，并利用区域贸易协定带来的机遇，促进经济一体化和促进可持续发展。

2. 现有方法存在的问题：缺乏政治意愿；资源约束；针对了错误的“问题”。

3.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转换：获取关于区域贸易协定的新信息、数据和分析；谈判和实施区域贸易协定；深化区域一体化；区域贸易协定的聚焦和多边化；发展配套政策。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刘清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党委副书记、研究员

国内外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经验与启示

1. 典型科创中心的表现特征：一是机构和基础设施的卓越性，包括吸引世界一流大学，研究机构，拥有科研基础设施配置；二是原创研发与技术转移能力，包括能够产生原创性的科技突破，深度技术转移，推动创新产业链条；三是产学研协同能力，包括具有跨学科、跨领域、多产业企业部门的科技创新发展规划和产学研协同创新网络；四是区域带动作用包括作为国家或区域科学核心，能够带动区域甚至全国的新兴战略产业和积极发展。

2. 国外案例带来的一些启示如下：一是通过章程与制度来支持和规范科创中心的建设；二是构建友好环境，面向全球吸引优秀人才；三是引导新兴产业发展，形成创新集群辐射效应；四是支持创业，有效推进技术转移和创新商业化；五是设立各方参与的理事会机制，避免政府过度干预。

李万

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副所长

长三角一体化中的上海科创中心

1. 长三角是长江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桥头堡。长三角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将对中国经济格局产生极为重要的深远影响。

2. 上海科创中心的发展历程：国家科学中心、创新功能型平台、科技创新集聚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3. 未来发展的建议：一是建设长三角科学中心联盟，促进形成世界级的大科学装置集群区域；二是建设长三角技术大市场，促进技术要素自由有序流动；三是建设长三角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体，促进新型研发与创新机构蓬勃发展；四是建设长三角知识自由贸易港，形成世界级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中心。



深化绿色金融创新，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马骏

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绿色金融的国内外新进展

1. 2016 年人民银行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意见提出了一系列支持和鼓励绿色投融资的激励措施，包括通过再贷款、专业化担保机制、绿色信贷支持项目财政贴息等措施，此次意见的提出是国内绿色金融研究的里程碑事件。

2. 绿色金融在国际上备受关注，连续三年（2016-2018）成为 G20 峰会的重要议题。今年的三大关注点是绿色可持续资产证券化、PE/VC 的绿色可持续发展、Fintech 科技手段在绿色金融中的应用。

3. 国际领域的新进展目前有三个方向：构建央行与监管机构间的绿色网络，研究气候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推动绿色金融市场发展的方法。

张俊杰

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主任

“一带一路”的绿色投资标尺

1. 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绿色投资需要考虑中国国家形象和降低中国的投资风险，因此项目需要有一个界定。这涉及对绿色投资的定义、评估和评级三个过程。

2. 由于不同国家对绿色投资的关注点不同，对绿色投资的定义只设置一个基准，不同国家考虑不同国家实际情况定义其不同的绿色标准，据此定义不同国家的绿色项目。

3. 绿色投资的评估需要从项目的财务收益维度、环境收益维度、实现成本维度三个方面进行评估。其中环境收益维度需要将国家绿色项目的减排量转化为货币量，而实现成本维度是指项目实现该环境目标的额外成本数。

4. 同时，需要通过对绿色项目降维评级来给金融机构一个明确的综合指标。



欧洲与东亚合作中的跨国问题——跨越双边关系的面碗效应

Nele Noesselt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教授

欧洲与东亚合作中的跨国问题

——走向全球绿色金融治理？

1. 目前欧洲与中国对于全球绿色金融合作有关联性、贸易上的合作需求。

2. 国际组织虽然是跨国界的，但经常会侧重于西方国家。中国的加入 不单会带来中国特色的特征，而且会大幅度的改变一些国际规则制度。

3. 中国的一些机制和国际上虽然可能没有太多的关联，但中国设立的标准可能会比国际标准更高。

4. 在合作的时候，应当要制定一个合理的国际规则，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因地制宜地制定各地的标准。

5. 在全球绿色融资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好的执政，好的治理方式、法治、民主，只有这样我们共同的协议才能实现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全球 融资。

6. 一带一路协议能够进一步促进国际的协调，国际的平衡、国际的合作和国际的一体化，从而使得我们更快实现绿色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Dominik Mierzejewski

波兰罗兹大学教授

中欧关系塑造中的地方政府角色

1. 当下，多层级的参与模式和次国家级的参与者在国际关系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2. 在全球的治理层上，地区性被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从全球的角度上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3. 在贸易、文化、旅游业等的发展上，地区性政府不会专注于政治，而是倾向于这种实际层面的投资、贸易、文化的沟通和互换。

4. 一带一路能够把企业作为一个新的参与者加入多边合作中，且这种推动是自下而上的，即先有了企业之间的合作，才推进了政府的合作。

5. 在中国与欧洲公开的外交和国籍的多边主义中，地方政府将会扮演一个支柱性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中央政府，都应该作为政治的保护伞。当然因为伞尺寸的不同，中国的省份和欧洲的国家会有一些不对称的关系。



子论坛 全球治理

“一带一路”在欧洲——协同与挑战

Katarina Brockova

斯洛伐克布拉斯拉发经济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国—欧盟投资保护新纪元

1. 中国和欧盟双边投资协定多数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达成的一代双边投资协定, 存在投资保护范围有限、相关规定及投资保护标准模糊、三方投资国际仲裁机会有限等问题。

2. 欧盟和中国已出台新欧盟—中国投资全面协定, 为双边投资关系中存在的棘手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规则, 推进公平竞争, 为欧盟和中国投资者优化投资环境, 明确投资权力、无差别原则、透明原则、许可和授权程序。

3. 最终目标是让双方权力和义务更加清晰、透明、公平, 让投资方和被投资方的权力和义务更加平衡。

Nargis Kassenova

KIMEP 大学中国和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超越联通走向更好的治理“一带一路”倡议在欧洲和中亚

1. “一带一路”为欧洲和中亚国家带来重大机遇。“一带一路”对沟通连接和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2. 从长远利益考虑, “一带一路”成员国需要为投资和计划优化治理机制。欧盟接下来对欧亚大陆连通的战略目标是推广透明原则及环境社会标准。

3. 中亚治理机制落后, 阻碍了中国和欧洲的投资, 最终会影响该地区的稳定性。多方应开始应对这些挑战, 否则“一带一路”所带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动力会加强这种不稳定性。



“钻石十年”背景下中国—东盟能源与资源合作

祁怀高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南海沿岸国如何用创新性办法开启南海共同开发

1. 回归相对稳定的南海局势为探讨和推进南海共同开发营造了较好的氛围。成功开展共同开发将促进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

2. 借鉴欧洲煤钢联营的成功经验, 南海沿岸国可以资源合作为主轴推动南海共同开发。

3. 可能的合作路径: 南海资源双边开发协定与多边开发机制并行推进; 重点合作开发油气资源; 未来设立超国家的“南中国海共同开发管理机构”; 着眼于远期的政治经济目标和未来的东亚一体化。

Bouadam Sengkhambhout lavong

老挝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东盟富有成效的合作关系

1. 中国—东盟合作: 通过多样的东盟+1 的机制, 中国和东盟之间增强了政治安全对话和合作; 2009 年以来中国成为了东盟最大的贸易伙伴, 东盟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中国与东盟之间良好发展的机制成功将会进一步推动双方关系的进展。

2. 中国—老挝合作: 能源与采矿合作发展良好, 9 个合作水力发电项目已经进入了商业运行期, 10 个水电项目正在建设之中。中国企业在老挝投资了 52 个涉及勘探、加工的矿业项目, 另有 20 个项目正在进行可行性分析。

3. 总结和建议: 通过区域合作创制加强区域连结; 维持和平稳定的区域环境, 这对该地区的发展很重要; 继续加强中老长期双边互利关系的建设。





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走向双赢的合作道路

Dikambaev Azamat

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战略研究所所长

欧亚空间一体化的社会文化原因

1. 跨文明交流自古以来已经开始了。欧亚区域空间使得不同国家可以彼此建立联系。

2. 文化、地理、历史关联横跨整个地区。除了紧密的贸易关系,还存在着思想、传统、经历及知识上的交流。

3. 欧亚对于发展存在迥然不同的理解,这一理解并非全新的;欧亚地区的发展逻辑提倡和睦相处,纵向性合作。

4. 三种层次的交流:两国之间;区域内合作;跨区域的宏观型合作。每个层次应该形成互补,相互支持的作用而不是具有竞争性和重叠性。

5. 欧亚主要关注的问题:谨防传统和新型安全威胁所带来的问题;促进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影响。

6. 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和其他兴起的一体化项目需要经过协调。

强晓云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的欧亚政策及中俄在欧亚的合作

1. 中国在欧亚的相关利益:政治利益(和平发展、地缘政治利益、制度利益)、安全利益(中国国民在国外的人身安全)、经济利益(能力和天然资源、交通走廊,基础设施需互联互通)、文化利益(人文交流和感情能提高中国形象)。

2. 中国对欧亚的外交政策主要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带一路”的一部分。中国履行了以下基本原则:三不(不追求区域主导权;不建立影响区域;不干涉他国内政);共赢合作;平等共建;包容性原则。

3. 中俄两国在欧亚的合作远远超过纯粹的竞争,双方的共识大于分歧。双方有共同的安全和经济利益,还可以利用现有的区域内机制如 SCO。

剖析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和构建世界经济秩序的新模式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副院长,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

剖析中美贸易摩擦的本质

1. 中美问题是中长期问题,不仅仅是贸易问题。

2. 中美关系发生了巨大的逆转,不同利益集团的立场也发生了改变。过去,美国的企业是中美双方缓冲剂,美专家和官员反对施加于中国的贸易挑衅;现在,美国企业、专家、官员一道指责中国崛起,支持特朗普政策。

3. 中国需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坚持金融服务业的对外开放。

白明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

贸易摩擦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

1. 特朗普对华发起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选票是特朗普发起贸易摩擦最重要原因,推行美国优先策略。特朗普旨在让美国制造业回归。

2. 中美贸易摩擦进入到摩擦激化期。特朗普进行组合拳政策,愿意承受高额成本,中国制造 2025 和贸易逆差是特朗普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3. 不打无准备之战,中国要先下手为强,谈判桌下要积极准备,为贸易谈判争取更多筹码。进一步扩大开放,争取更主动地位。

4. 要权衡摩擦压力和承受反制成本;权衡双方依存度;权衡短期发展和未来长期发展;权衡合作博弈和对抗博弈。



子论坛 社会治理

数字未来与健康创新

Andrew Greenshaw

阿尔伯塔大学精神病学和神经科教授

人工智能应用程序在健康领域的准备和潜力

1. 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可以让影像诊断的速度变得非常的迅捷。此外，肾病还有脑部的疾病方面也应用了人工智能。现在有一些新的诊断新应用可以为病患提供自动的诊断。斯坦福大学也设计了人工智能的应用，主要用来对抗抑郁。

2. 通过收集病患数据，AI 无论是在疾病评估还是健康测定方面都能提供很大的便利。但是目前人工智能专家太少，且 AI 相应的配套设施和政策没有跟上，AI 的全面应用有一定的困难。只有在实现全面数字化、和人们全面的了解 AI 之后才能充分的利用 AI 技术。

3. AI 应用过程中的重要的障碍之一在于隐私，要寻找以人类为导向，标准化高质量的数据。

Matthew Brown Puzzle Rock

Coding Inc. 创始人

人工智能在医疗保健中的应用潜力的最新技术发展

1. 机器学习可代替人工设计，且在许多领域胜过人工设计，但通常不可预测。可应用于自动邮件路由，精准农业，自动化股票教育，信用卡欺诈检测。机器的学习是深度的，需要大量数据。数据的输入可以结合来自许多不同来源的数据。

2. 目前大部分学术研究都集中于在对一个病人组和一个健康组的研究上，下一步需要的则是对更大量数据的研究。

3. 皮肤癌应用程序可以从皮肤病的图像自动诊断，具有较高准确度，且不公开使用者私人信息。



社会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新经济时代的治理 & 社会责任

Burcin Yurtoglu

WHU 金融系主任

企业社会责任的哪些方面预测了企业价值？

1. 研究发现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实践，会带来更高的市场价值。实证表明我们的整体企业社会责任指标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经济上的显著关系。整体企业社会责任评分建立在资产 (Asset 4) 的数据库基础上，由 CSR 的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三个指标构成。

2. 我们还发现，在预测公司价值时，使用特定的 CSR 指标会导致大量的遗漏变量偏差 (OVB)。因此，应该谨慎解读基于单个指标的实证研究结果，因为该研究只捕捉到 CSR 的特定方面，而忽略其余方面。

Shapiro A. Ruth

亚洲慈善与社会中心首席执行官、创始人

在中国和亚洲的社会企业责任创新

1. 过去 15 年来，中国乃至整个亚洲的公司越来越多地参与 CSR(企业社会责任) 活动。

2. 历史上，企业社会责任便是为非营利性组织和政府机构提供现金等支持。近些年来，企业社会责任领域有了很多创新发展。

3. 企业社会责任创新有四种类型：一是，利用公司资源提高非政府组织的能力；二是，共享价值和包容性业务；三是，DIY(自己动手) 慈善事业；四是直接支持社会企业的创建，或着通过建立影响力投资 (Impact investing) 和社会企业生态系统的方式，来为社会企业提供良好的创建环境。

子论坛 科技创新

当保险遇上人工智能——人类社会新未来

王和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裁

无人驾驶：汽车保险的终结者？

1. AI 的最终目的不是实现类人类大脑，而应当包括所有生物智能。
2. 无人驾驶这个定义并不科学，这是一个智能驾驶的概念，只不过是智能驾驶发展的不同过程。
3. 无人驾驶使得汽车保险的风险性质和主体发生变化，财产保险变为责任保险，这给风险责任界定带来挑战。
4. 不同智能程度的车辆长期共存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段相当长的时间中，应当考虑风险识别、风险程度、责任主体差异、法律等现实问题。

Finbarr Murphy
利莫瑞克大学教授

自动驾驶中的网络风险评估

1. 2017 年关于网络责任的理赔数量是前 4 年的总和。在自动驾驶汽车等自动化设备中，存在上百个的计算机系统，每个环节都可能存在漏洞，存在风险。
2. 网络风险的解决方案：首先，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数据不断更新，历史数据的作用非常有限；其次，解决方案要让保险公司与客户有非常好的互动，以了解客户是否需要与网络攻击相关的保险。
3. 蝴蝶结式的网络风险分析框架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网络风险攻击的后果，并通过可视化工具清楚地展示风险。



子论坛 文化文明



民族事务的亚洲经验

李红杰

国家民委巡视员

中印两国民族事务治理比较研究

1. 世界上处理民族事务主要有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类。中国和印度正是这两种治理体系在亚洲的体现。
2. 中国的民族事务治理，具有鲜明的大陆特色，理念先行，实行各民族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的民族政策，保持与时俱进。
3. 印度的民族事务治理是被动而非主动作为形成的，这也就导致了许许多民族问题出现后只能被动应对。
4. 中国和印度在民族事务治理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并最终总结出民族治理的亚洲模式。

姚大力

复旦大学教授

什么是中国边疆的基本特性？

1. 边疆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主要以民族的属性来表达，即边疆都是民族聚居区域。
2. 中国文明是一个美美与共的多文明结合体，被汉文明之外其他民族或族群的文明或文化所覆盖，是中国边疆最主要和最鲜明的属性。
3. 内亚性是中国不容忽略的概念，但实际上内亚的概念与中亚的概念并无大的差别。

跨文化对话 创新伙伴关系： 东亚 - 北欧合作新思维

刘碧伟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中国前驻丹麦大使

中国 - 北欧合作的中国视角

1. 中国为什么要在北欧地区探索次区域合作机制？
 - a. 中国 - 北欧长期的双边合作为新兴的区域合作奠定了基础。中国推动和北欧地区的区域性合作，是建立在扎实的双边关系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合作是中国 - 北欧关系的有机构成和必要的补充，它有利于丰富而非削弱这种双边关系。
 - b. 中国 - 北欧的次区域合作契合并顺应了北欧国家自身协同发展的态势，它能够更加有效地提供区域公共物品，共同建构区域命运共同体。
 - c. 中国 - 北欧的次区域合作作为中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增添了新内容和新动力。它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有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转型，而且能够通过积极的益处效应丰富中国和欧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容。
2. 如何继续推进北欧与中国的创新合作？
 - a. 政治互信和战略远见
 - b. 渐进发展次区域创新
 - c. 人文交流与教育科研合作

Niklas Swanström

安全与发展研究所主任

东亚安全的北欧模式

1. 国与国之间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安全机制的基础是互相的信任。但国家的安全形式是异常复杂的，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多元化的意识。
2.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可以让我们在未来的道路选择方面形成共识的机制。
3. 信任机制的建立应该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人民之间的交流在这之中极其重要。



子论坛 生态治理

全球绿色治理：一带一路的环境挑战与机遇

Shamshad Akhtat

联合国副秘书长兼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

开场演讲

1. 一带一路可以促进国家间的合作，提高各国人民互联互通，市场互通。一带一路的目标是可持续的低碳发展，其中一个关键要素是国家间无缝互联互通，促进国家融合。我们也在整个亚太间促进这个发展。一带一路还可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也是另一个我们努力的方向。其他方面，促进贸易和关税，需要各国政策和政策框架间的合作，还需要我们进一步商榷。
2. 环境方面的变革，也是一带一路考虑的一个重点方面。习总书记强调生态文明建设，建立绿色丝绸之路。2017年，中国提出，促进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和各国一带一路的发展，一定要靠具体的行动、政策等，包括外资投资，包括企业社会责任，保证利益相关人了解到环境。在社会保护方面也需要进一步的推动发展。
3. 此外，建设一带一路，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方式方法发展，必须有法律框架，还有相关政策，还需要绿色金融的支持。中国已投入70多亿新增了很多产能。将金融与环境收益进行联系，将钱与好的环境进行联系，这样也可以支持绿色债券的发展。

Mia Mikic

联合国亚洲及太

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贸易、投资与创新司司长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品应遵从怎样的环境标准？PPM的有关标准是否应该被采用？

1. 现在的贸易很多涉及中间产品。贸易的过程可以应对环境挑战，比如利用国际回收局(BIR)的法规来实现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
2. 一般认为，贸易会带来一定的环境污染。但也有办法通过环保产品，实现生产和效益的最大化。因此我们需要相关政策，保证全球环保产品以公正的价格进行贸易。
3. 可采取的措施包括：贸易和非贸易措施，边境和非边境措施，关税和非关税措施。
4. BIR最好的一点就是能促进亚洲国家的能力建设。中国在一带一路中向外输出对环境有益的项目，同时也有利于中国企业的长期发展。



上海论坛2019圆桌/ 子论坛申办向全球开放

第十四届上海论坛——上海论坛 2019 将于 2019 年 5 月 25 日 -27 日在上海举行，其主题为“全球变局中的亚洲：挑战、发展和新范式”。

为进一步增强上海论坛的开放性，集聚不同领域，不同组织的广泛资源，并将上海论坛的平台分享给更多致力于推动亚洲发展的专家学者，上海论坛面向全球高校、研究机构、智库、企业等组织开放圆桌 / 子论坛申请，与国际知名机构合作或与复旦大学院系研究所等机构合作承办者优先。

有承办意向者可以关注上海论坛官网（www.shanghaiforum.fudan.edu.cn）的通知，或通过邮件洽谈合作事宜。上海论坛期待您的加盟！

联系人：邓梦佳 女士

联系电话：86-21-65642354

电子邮件：shanghaiforum@fudan.edu.cn

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

《中国观》长期征稿启事



为更好地落实新型智库建设，推动科学研究与决策咨询的相互转化，提供更多高质量、高水平的咨询报告与专家建议，复旦发展研究院和上海市高校智库研究与管理中心拟就《中国观》向国内外学者长期征稿。《中国观》以中国当下各领域的热点议题为关注重点，每月选编国内外定建智库最新中国研究成果，同时依托复旦海外访问学者科研优势，针对中国当前热点问题进行政策分析。

征稿要求

1. 政策分析或建议，对前瞻性、综合性问题有深度思考，选题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内政、外交、经济、社会、教育等与中国发展密切相关的领域。
2. 英文版：可推荐国外智库或主流媒体发表的英文稿件（如为其他种类语言，请附上 200 字左右文章概述），亦可投送本人英文研究成果，经编辑部确定用稿后，由荐稿单位或个人组织翻译，或由编辑部统一翻译。
3. 中文版：（1）各单位或个人可向编辑部投送稿件，选题自拟，语言精练、平实，避免学术化，字数 3000 字左右，文末附 100 字以内的作者简介；（2）如稿件涉及重大敏感问题，请勿用电子邮件直接发送，将文稿刻录光盘同纸质文本一并寄送至编辑部。

投稿须知

1. 投稿信箱为：thinktank@fudan.edu.cn，投稿时邮件主题处填写稿件标题，在文末附上以下内容（个人信息十分重要，要求准确无误）：文章标题、作者姓名、荐稿人姓名（或单位名称）、邮寄联系方式、电子邮件、电话号码。
2. 一次一稿，请勿一次多稿或重复投稿。
3. 允许稿件向其他刊物或渠道投送，录用意见一月内给出。一旦录用，编辑部会给予适当奖励。

联系方式

联系人：黄昊、康而力、辛艳艳

联系电话：021-65643764

电子邮件：thinktank@fudan.edu.cn

寄送地址：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智库楼

邮编：200433

复旦发展研究院·博享访问学者项目

复旦发展研究院“博享访问学者项目”长期向海外学者开放申请，以加强学术研究及合作，促进中外学者交流沟通。

申请条件

该项目向以下人士开放：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有正式职务的学者，资深专家或行业精英。申请人应具备良好的研究能力，年龄在 55 岁以下。

- 访问学者应从事政治、社会、经济、金融、环境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
- 从事政策导向研究的人士将优先考虑。

申请材料

- 1、复旦发展研究院“博享访问学者”申请表（<http://fddi.fudan.edu.cn/dongtai/tongzhigonggao/4797.html>）；
- 2、个人简历，包括教育与研究经历、已发表学术成果；
- 3、个人高清照片一张；
- 4、一份访问期间的研究计划（中文不少于 1500 字，英文不少于 2 页）；
- 5、一封由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或所在研究机构负责人撰写的推荐信。

申请流程

该项目长期接受申请，每年 5 月和 11 月进行甄选。访问学者可在每年春季和秋季学期访问，访问时长为 30-90 天。请根据以下时间表确认申请时间：

拟访问时间	申请截止日期
春季学期 (2019 年 3-6 月)	2018 年 11 月 30 日
秋季学期 (2019 年 9-12 月)	2019 年 05 月 30 日

工作条件

- 1、复旦发展研究院一次性为访问学者提供如下补贴：
 - * 交通补贴 5000 元 * 保险费补贴 600 元 * 住宿补贴 300 元 / 天 * 生活补贴 300 元 / 天
- 2、访问学者驻校期间，可使用复旦大学的图书馆和电子资源；
- 3、复旦发展研究院长期向访问学者提供研究室，每周一至周五，8:30-17:00 开放，节假日除外；
- 4、访问学者在校期间可参加所有复旦大学的公开讲座、会议和论坛等活动；
- 5、复旦发展研究院为访问学者提供文章发表平台和机会，包括学术论文发表和媒体评论发表；
- 6、复旦发展研究院将为有意向的访问学者提供一次田野调查机会。

工作职责

- 1、访问学者应就以下两个方向进行选题和研究，并在访问期间独立进行研究工作；
 - 中国发展（申请该选题的学者应具有博士学位）
 - 全球治理
- 2、访问学者应每个月提供一篇工作论文或时事评论，并在访学结束时提供一篇论文作为访学期间研究成果；
- 3、访问学者每周至少两个工作日在研究室工作，并接受复旦大学教研人员及学生的预约见面；
- 4、访问学者应积极参加复旦发展研究院组织的研讨活动，并就其研究进行至少一次讲座；
- 5、访问学者应为复旦发展研究院出版物提供稿源，可以自己撰写，也可以进行推荐。

* 所有访问学者向复旦发展研究院提交的文章，都将被甄选并推荐发表
访问学者须保证其所提交或推荐的文章不会引起任何版权纠纷。

联系方式

联系邮箱：fdifudan@fudan.edu.cn

联系电话：86-21-65642871

联系人：焦露曦 女士

复旦学者

复旦大学依托其深厚的人文、社会学科学术资源，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和交流，鼓励国际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研究、交流和对话。为此，复旦大学设立“复旦学者”项目，邀请海外优秀学者和学生来复旦校园从事文科、社科领域的科研。



申请条件

凡从事人文、社科领域研究的学者和在读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都可申请。本项目不授予学位、不给予学分。在读学生若修读复旦大学课程，可申请课程学分。本项目对申请者不设年龄要求。所有申请者都必须：

1. 拥有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或课题；
2. 使用汉语或英语为工作语言；
3. 拥有外国国籍。

项目形式

“复旦学者”项目有两种形式：

1. “复旦资深学者”：申请者须为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
2. “复旦学者”：申请者须为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或博士后。

访问要求

“复旦学者”项目分为时长两个月或四个月两种。访问期间，每位“复旦学者”每月至少两场讲座，或举办 workshop、seminar 等学术活动。复旦大学鼓励“复旦学者”在项目结束后发表相关论文，并注明“复旦学者”身份，于复旦大学留存一份论文。

资助标准

1. 复旦大学为所有“复旦学者”提供在复旦期间的住宿；
2. 依据“复旦学者”本人的申请，复旦大学提供机票款，金额视具体情况定；
3. 复旦大学支付“复旦学者”每月人民币贰仟肆佰元津贴，支付“复旦资深学者”每月人民币柒仟元津贴。

申请材料

由“复旦学者”项目委员会接收申请书，并组织专家委员确定录取名单。所有申请材料需用英语写成，包括：

1. 申请人自荐信及个人信息；
2. 申请人简历；
3. 在复旦期间计划执行的科研项目简介；
4. 两封相关领域学者的推荐信。

联系方式

地址：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复旦大学外事处

邮编：200433

联系人：唐老师

电子邮件：fudanfellow@fudan.edu.cn

复旦发展研究院招聘博士后研究人员

复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工作站，不定期面向全国招收综合研究中国区域发展和国家整体建设的博士后研究人员。详细招募启事敬请关注官方网站（<http://fddi.fudan.edu.cn>）。

以下信息仅供参考：

招收条件

1. 品学兼优，身体健康，无不良记录；
2. 具有(或即将具有)国内外知名高校经济学、金融学、管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博士学位之一，获得博士学位5年以内、或即将毕业的博士研究生，以及从其他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出站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年龄35岁以下；
3.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4. 具备全日制进站工作条件，原则上不招收在职研究人员；
5. 接受全日制坐班工作，并愿意承担研究院的研究任务。

相关福利待遇

1. 为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优厚的研究条件。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后，薪酬待遇参照国家和复旦大学的相关标准（包括博士后公寓和岗位津贴）；
2. 中心配备舒适的办公环境及良好的发展机会。本站采取“公开招收，严格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公开、公平、公正地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本站对报名材料进行初审，进入初审的候选人将进入下一步考核。

热忱欢迎海内外优秀博士到复旦发展研究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联系方式

地 址：上海市邯郸路220号复旦大学智库楼

邮 编：2004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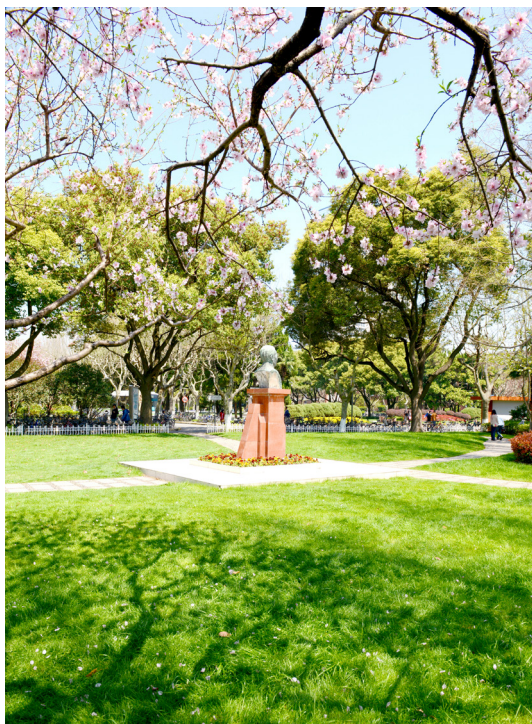
联 系 人：罗老师

联系电话：86-21-65642354

电子邮件：fdifudan@fudan.edu.cn



《复旦人文社会科学论丛》长期征稿启事



《复旦人文社会科学论丛》(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为复旦大学主办的学术刊物。2014 年起, FJHSS 成为世界著名出版社施普林格(Springer) 旗下的全英文的人文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季刊, 由施普林格负责全球市场推广和订阅发行, 并通过其在线数据库向全球发行。《论丛》每期出版人文和社会科学各类专题、学术论文、书评等栏目。旨在为中外学术界提供学术交流平台, 推动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走向世界, 同时为推动我国人文和社会科学学科发展和“创双一流”的历史使命服务。

征稿要求

1. 学术创新, 言之有物的学术研究, 范围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领域前沿性、基础理论性各类学术文章, 尤其欢迎针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法律、文化、历史、外交和国际关系、军事、环境、国家和地方发展政策和治理等重要理论和实践课题进行跨学科或专业性深度研究的英文文章。
2. 投稿必须是英文原创, 不接受从已发表的中文文章翻译而来的英文文章。
3. 投稿字数, 论文在 6000-10000 词左右, 书评在 2000-2500 词左右, 语言流畅, 符合英文行文规范。
4. 其他问题可参加本刊网站的投稿须知。

投稿须知

1. 网络投稿地址为斯普林格 EM 平台 <http://www.editorialmanager.com/fdhs/default.aspx>, 请按照网站要求注册用户名并提供所要求的信息。
2. 请勿一搞多投。
3. 允许稿件向其他刊物或渠道投送, 录用意见一月内给出。

联系方式

联系人: 柏 栋

联系电话: 021-55665220, 13918554299

电子邮件: baili@fudan.edu.cn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

地址：中国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邮编：200433

电话：86-21-65642354 55664590 传真：86-21-55664590

电子邮箱：shanghaiforum@fudan.edu.cn

网址：www.shanghaiforum.fudan.edu.cn www.shanghaiforum.org